

中山
戰爭論

著日浴亭

(增訂本)

行發社學兵界世

種一第書叢學兵

論爭戰山中

著編日浴李



3 0477 3901 0

行發社譯編學兵界世

一個偉大的昭示

~ 自 錄 實 業 計 劃 ~

彼日本之武力派，尙以戰爭爲民族進取之利器，彼參謀本部，當是計劃十年作一戰爭，一八九四年以一最短期之中日戰爭，獲最豐之報酬，於是因之而長其欲。一九〇四年日俄之役，獲大勝利，所得利益亦非較小，最後以一九一四年之大戰爭，復加入聯軍以拒德國，而日本以出力最微，獲財至少，竟獲一領土，大如未戰前之羅馬尼亞，人口衆如法國之山東。由此觀之，在近三十年間，日本於每一戰爭之結局，即獲最厚之報酬，無怪乎日本之軍閥，以戰爭爲最有利益之事業也。

試以此次歐戰最後之結果證之，適得其反，野心之德國，幾盡喪其資本與利益與其他難計算之物，法國雖以戰勝稱，實亦無所得。今日中國已醒覺，日本即欲實行其侵略政策，中國人亦必出而拒絕之。

一個正確的方向

——自錄—— 總裁軍事基本常識—— 軍事訓練要詞——

大家要知道：我們 總理就是一個大軍事家，他的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與軍人精神教育等，就完全是依據軍事學的原理原則創造出來的，到現在就成了我們一切軍事計劃和軍事教育的基本了，這就是由於他能研究軍事，精通軍事，所以他能夠發明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創造本黨，領導國民革命，建立中華民國，使我們今天能夠藉此以與現代世界最強的敵國——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持久的抗戰來求得我國民族的獨立自由與平等，完成我們做大光榮的革命大業。

自序

我們不要害怕戰爭，我們應迎接爲民族國家求生存謀解放的革命戰爭！

我們不要講談戰爭，我們應在紛歧錯雜的戰爭思想界裏，把我們革命的戰爭理論體系建立起來！

中國的開國史，是黃帝嚳逐蚩尤的歷史，亦即中國戰爭史的第一頁，五千年來的中國歷史，大半是戰爭史，我們的祖先大多數過着戰時生活。蔣百里先生說：「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強則強，相離則弱，相反則亡」。真是指出我們民族國家盛衰興亡之所在。

從五千年來的中國歷史看，從五年來的抗戰過程看，現在我們是急需建立一種戰爭理論了，但這個重大問題卻是不容易解決，復古不行，標榜不是，爲兵學而兵學不可，爲侵略而兵學更不可，卻不知它早爲我們的革命導師——國父孫中山先生給我們根本地解決了，他的戰爭理論，是實踐的，從戰爭的實踐中產生出來，是革命的，爲革命而建立戰爭理論。

中國今後的一舉一動是要有真理的指導了，否則，陷於盲從和盲動，固無成功可言，且會招來不良的結果。何況戰爭爲人類生死線上的活動，爲民族國家掙扎於盛衰存亡之道的最高表現，自然更要有真理的指導，國父的戰爭理論，是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真理，所以開揚它來建立中國今後的戰爭理論體系，實爲必然的歸趨，又爲我們當前的急務。

在黃崗山上，放眼遠眺，便是蜿蜒的山岳，聳立於天際。冬天的夜裏，山上野火四作，火燭風煽，正如火海的飛舞。我的四週是一片青紫的松林，風從天上來，松聲作古樂般的彈奏，在這種環境裏，使我常作深思，使我想起應續我的「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商務版）之後，來寫一

部「中山警備論」，但這係整理和開拓的工作，却比「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爲難，何況又屬於創舉，但我相信精神是可以征服一切困難的，於是籌備俗務，着手編纂，經過去年一個夏季的奮鬥，終把初稿寫成，秋涼拂稿長征，由韶赴滬，再事博訪周諮，以爲補充，春初南飛，在黃崗山上，又下數月工夫，方告脫稿，但因參考材料的缺少，及時間的限制，致未免盡量發揮，細爲鑿證，仍猶引玉計，便匆匆地付梓了。在這裏，我應感謝給我匡助的友好，並說懇地就正於海內外的高明！

國父的戰爭理論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產物，在此以前爲「孫武兵學」時代，從今以後，當爲「孫文兵學」時代，從「孫武」到「孫文」，顯名思義，實是中國兵學上一個趣味的奇蹟。今日我們讀他兵學理論，在字裏行間感覺到發著一種無限的生氣和浩氣，這是「民族復興」之氣，中華民族的人們今後應浸淫薰陶於是氣之中。我們再看他歷次指揮作戰的精神，其大仁大勇大智，實可作爲我國軍人的傳統精神。像英國海軍以納爾遜的精神爲傳統精神，法國陸軍以拿破崙的精神爲傳統精神，德國以腓特烈爲傳統精神，這樣才能把我們的軍、軍、國防軍的基礎像鋼鐵般的前建立起來。

中華民族今後是要在「鐵的時代」裏奮鬥來爭取他的生存解放和發展了，數千年來「重文輕武」之風和「文武分離」之習是要澈底地給它除除了，今後應爲文與武的合一，即孫與劍的合一，但劍在戰時應列於第一位。唯有劍才可以制敵一切惡魔，唯有實行國父的戰理戰法才可以使劍獲得光輝的勝利！

李 浴 日

民國卅一年七月廿二日字於
國父兩次醫師北伐的韶關

再版自序

在二千基羅的旅行中，在重慶四月的作客中，使我得抽出若干時間來給予這本書的校正和稍加增補。

因為戰時印刷業的幼稚與不健全，在本書的初版上，實在錯誤得太多了，且有些竟錯誤得莫測其妙。這是應向讀者道歉的。本書自經這次的校正與增補之後，差堪自慰，仍望高明者的指正，並進而建立三民主義的軍事理論體系。

中國在歷史上雖亡過兩次國，如宋之亡於元，明之亡於清，但這些征服者終於被我們推翻了。即這些征服者挾其優勢勢力，乘我內部紛亂之際，長驅直入，南面稱帝之後，便命定的走進腐化與墮落的歧途，當他的腐化與墮落不能統治我們這廣大的土地與衆多的人口時，我們便起來了，革命的烽火熾起於每一角落，便把他推翻丁，甚且又把他同化了。由是而觀，中華民族不獨不會永遠被征服的，且具有一種同化的神祕力量。

這次日本軍閥的侵華，為時快將六年，他征服不了我們一千二百萬公里的土地，征服不了我們四萬五千萬的人口，不待說，這就是他失敗命運的註定。日本軍閥窺視歷史的教訓，又不懂得我們民族精神，數十年來由於國父的發揚，已成爲堅不可破的堡壘，乃輕於掀起這次滔天的戰禍，真是愚蠢不可及呢。

帽子峯頂，七星巖上依然籠罩着國父當年誓師北伐的劍氣，這是啓示我們今日的抗戰是要反守爲攻了。我們爲掃蕩敵人，爲還我「生存空間」，唯有反攻！反攻！反攻！

李浴日

民國卅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於
國父初首誓師北伐的桂林

590.18
291

中山戰爭論

目次

- 一個偉大的昭示
- 一個正確的闡明

自序

再版自序

一·緒言	1
二·戰爭思想	24
三·國防計劃	43
四·軍政興革	71

488986

五·決勝精神力·····	(83)
六·戰爭與政治·····	(112)
七·戰爭與經濟·····	(113)
八·戰爭與宣傳·····	(136)
九·鐵的紀律·····	(149)
十·戰略戰術·····	(155)
十一·縱橫戰論·····	(155)
十二·結語·····	(155)

一·緒言

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中國國民黨的手創者，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建設者——國父孫中山先生，向來一般人都一致推崇他爲中國現代一個大思想家，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却很少認識他也是一個大軍事家，並在遺教中，建立了中國現代的戰爭理論。自然這個關明的任務，有待於我們今日的努力和完成。

國父一生雖然沒有機會進過軍事學校，卻常和軍事專家研究軍事，並自修中外古今的兵書，尤以他卓越的天才，和在醫科學校時代對於科學的修養，這都是打好他成爲一個大軍事家的基礎。可是，國父爲什麼要懂得軍事和會用兵呢？因爲，國父以完成國民革命爲己任，而欲完成國民革命，則必須發動戰爭，戰爭是「政治的手段」，亦即革命的手段。一個健全的革命領袖固要擅長政治，亦須兼長軍事，退一步說，縱不一定要有用兵的天才，起碼亦須懂得軍事，然後才能隨機應變，指揮裕如。

現在我們爲研究 國父的戰爭理論，首先應知道的是 國父研究軍事及指揮軍事的經過實情

，因為這是 國父成為偉大軍事家之所在，亦即 國父戰爭理論的根基。

一、關於 國父的 研究軍 事：

根據我們的考證： 國父的研究軍事應以此時為起源，即太平天國滅亡十年後， 國父在村塾讀書時，村中有一個太平天國的遺兵，常到塾裏為學童講述洪秀全革命的故事， 國父聽得，深慕洪秀全之為人，推翻滿清之志，不禁油然而生，遺兵對 國父特加愛許，一過無事，便和 國父詳談當年時事，如洪秀全怎樣起

義，怎樣從長汀打到湖南，再打到武漢和南京等等。並以洪秀全第二勉 國父， 國父得此徵驗，引為無上榮耀，亦輒以洪秀全第二自居。

國父於一九〇三年（癸卯）夏由安南東渡日本，致力外交活動，結識日野雄之助，日野留英多年，為日本軍務專家，以研究南非洲波亞人（註一）抵抗英軍所採用的散兵戰術，及發明日本式盒子砲，聞名於時。 國父認此種戰術最適用於揭竿起義的中國革命軍，乃和日野研究，除筆記其口述外，並購置英文的英波戰史及圍籬百數十卷，日夕翻摩，孜孜不倦。同時為宣傳同志以軍事訓練，又秘密組織「革命軍事學校」於東京，延聘日野為校長，小室雄次郎大尉為助教，學科除普通步兵及製造盒子砲外，尤注重波亞人散兵戰術的傳授。第一期學生共十四人，訓練之日， 國父親自致訓，聽者大受感動。至於 國父當時為描繪滿清，在粵桂邊境及各地所組織的革命軍或稱「尾軍」，實等今日的游擊隊，戰鬥所用的戰術，即是散兵戰術（亦稱波亞戰術

），正類今日所謂的游擊戰術。往後，國父於民二發表「錢幣革命」一文，曾暗示採用散兵戰術以抵抗帝俄。迄民十一於「軍人精神教育」的演講詞中又主張採用散兵戰術，以與北方軍閥交戰，可見國父對散兵戰術的心得及國民革命軍所受散兵戰術的影響了。

一 現代的軍事學術，是一種專門而複雜的科學，且不斷地向着日新月異的前途邁進。故在現代欲成爲一個大軍事家，除努力自修之外，還要與良師益友切磋砥礪，以匡不逮，而收事半功倍之效。國父有見及此，加以自己的虛懷若谷，故每求益於外國軍事專家。像上述的日野，便是其一。此外還有美國軍事評論家堪馬利（民元在南京臨時大總統府任高等顧問），蘇聯戰將嘉蘭、李歷及英德洋將校多人。

於自修兵學方面，國父對於普通軍事書籍，如典範令及各種教程，莫不一一精通。在社會建設的自序中，曾提及步兵操典說：「兵家之操典，化學之公式，非瀏覽誦讀之書，乃習練演試之書也」。對於外國軍事名著更爲愛讀，據一位老同志最近給我的信說：「總理所讀各國兵書，以德著英譯爲多。據言：軍事學以德著爲第一」。又說：「總理對外人用兵者最崇拜拿破崙，書架上滿置各國名人關於拿破崙之著作。癸卯年（民前九年）曾語人謂：拿破崙略，百年後始大放光明，蓋歐人研究拿破崙戰略之佳本，多出版於百年以後也。總理對拿破崙每次戰役，皆瞭如指掌，有條不紊，據言：諸役以攻奧一役爲最神妙，於戰史上最有價值」。（註二）至於於我國

古代各家兵法，亦有精微的研究，就中以「孫子兵法」爲最。在民權主義上評談書說：「那十三篇兵書，便是解釋當時戰理，由於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又對同志說過：「拿破崙的作戰，深得孫子的蘊奧」。原來拿破崙在歐洲作戰，陣中常披閱法譯「孫子兵法」——譯音係由法來華傳教的教士。當對同志講解太平天國戰史及其他攻守之事，輒引孫子的原則來說明，有時並很精細地指出那原則見於「孫子兵法」中第幾篇第幾頁第幾行。（註三）

此外 國父於各種演講中常喜從軍事上給它說明。如民權主義上說：「譬如練兵打仗，便要用軍事家」。又如黨員之奮鬥同於軍隊之奮鬥演講詞上說：「這次的大會（指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浴日註）好像是一個大軍事會議，定了種種作戰計劃，下了許多攻擊命令，交各將領帶回去實行作戰一樣。又好像是一個大兵工廠，製了許多槍礮，出了很多子彈，諸君在此領了很多槍礮子彈，回到本地地方去，便要分給到各位同志，補充他們，各位同志得了補充，便要他們實行攻擊，不可空耗了這些補充，到了實行攻擊的時候，必須密察敵情，隨機應變，對於敵人要能夠收效，那才算是「不枉費了這補充」。亦足見 國父對於軍事的興趣與研究。

二、關於
國父的
指揮革
命：

國父從事革命運動，認爲欲掃除革命的障礙，決不是採用溫和手段所可奏效，只有假以軍政時期，驟然採取戰爭的手段。在歷史上，像我國的湯武革命，美國的獨立運動，法國和俄國的大革命都是如此的。

國父於一八八五年（西）中法戰爭結束之時，已決志致力於推倒滿清的革

命運動。正如自傳所述：「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以醫術爲入世之媒」，而首先採取事行動，以圖推翻滿清，係肇端於一八九五年（乙未）廣州之役。又如自傳所說：「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則陸皓東、鄧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予則常往來廣州香港之間，慷慨經營，已過半載，籌備甚週，聲勢頗衆，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乃以遲鈍不慎，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機已洩，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之第一人。同時被株連而死者，則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捕者七十餘人，而廣東水師統帥程奎光與焉，後竟病死獄中，其餘之人或囚或釋」。當時 國父在廣州居中指揮，清史懸賞緝拿，急如星火，泰然磨居十餘日，方從間道脫險抵香港。

自此而後， 國父更積極地策劃軍事的進行，由他直接發動同志起義的，有一九〇〇年（庚子）惠州之役，一九〇七年（丁未）潮州黃崗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欽廉之役，饒南關之役，及一九〇八年（戊申）欽廉上思之役，雲南河口之役。就中以欽廉之役， 國父命王和順率二百餘人大破虜兵於王光山，爲最光彩的一頁。當時安南的法文報紙曾論此役說：「此次革命軍，不知用何戰術，能一戰而去清兵四分之三，可稱奇捷」。尤真饒南關之役， 國父親身督戰，以一當十，充分表現了革命領袖的英勇可風。

鎮南關是桂省南部的一個要隘，向有「第二旅順口」之稱，這一役可以稱爲小規模的要隘戰。國父當時欲奪取鎮南關，以壯革命的聲勢，命黃明堂用革命戰術，於十月廿六日率百餘人襲取該關。登時所有鎮中鎮南鎮北三座砲台，盡爲克復。國父在河內接獲捷報，興奮異常，乃率同黃克強、胡漢民、胡毅生、及日本志士池亨吉（新聞記者）、法國退職砲兵上尉（佚名）等，於廿九日從河內搭乘火車直達同登站（此站與鎮南關距離不遠）下車，步行抵關，時已入夜。當即召集軍事會議，決定防禦計劃，並指定何伍坐守鎮南，李裕卿坐守鎮中，自己與明堂、克強等坐守鎮北，檢查所俘獲戰利品，爲數無多，不足以增強我軍的戰鬥力。而清軍陸榮廷等卻擁衆二千餘人浩浩蕩蕩地來圍攻。國父利用居高臨下的地形，沉着指揮守軍抵抗，又親自督率法國砲兵上尉發砲，轟擊敵陣，使敵人不敢仰攻。惜因衆寡懸殊，未能由守勢轉爲攻勢，給敵人以包圍機滅。到第二天，國父爲逃返河內，籌款贖械，以圖大舉，便偕同行者乘黑夜繞道下山。仍令明堂等繼續抵抗，因糧盡彈絕，及活躍於千萬大山的友軍道遠不能來援，一直抵抗至十一月四日，才突圍而出。（註四）

可是，上述各戰役，在軍事上，雖然收效甚微，在政治上，卻得到偉大的成功：震撼羶虜的胸膛，樹立大漢的聲威，造成革命的時勢，促進全國各地的起義。往後，國父雖遠處海外，然愈挫愈奮，再接再厲，仍命國內同志到處發難，於是便有一九一〇年（庚戌）廣州新軍之役，及籌

勳全副的一九一一年（辛亥）三月廿九黃花崗之役，因而促成是年武昌起義，跟着此次起義，各省便紛紛響應。國父在海外聞訊，奔馳回國，各國代表於十一月十日齊集南京，選舉國父爲臨時大總統，國父於民元正月一日宣誓就職。這時清帝溥儀，仍負隅北京，國父毅然主張用武力澈底解決，積極進行北伐軍事，每每召集各軍將領指示機宜，置地圖於桌上，按圖指示，如何進軍，如何攻守，均合用兵原則；並強調革命軍不怕武器的拙劣，只要攻擊精神旺盛，便可以擊擊茶，百戰百勝。起初一般將領以爲國父沒有進過軍事專門學校，不懂軍事，及至領略這一番訓示後，大家都深深地佩服他兵學的深造，尤佩服他那種審慎而虛心的指示態度，這是一位親歷其境的老軍官告訴我的（註五）。至所決定的北伐計劃：「以鄂湘爲第一軍，由京漢鐵道進。寧皖的第二軍，向河南進，與第一軍會於開封鄭州之間。淮揚爲第三軍，煙台爲第四軍，向山東進，會於濰州秦皇島，合關之兵爲第五軍。山陝爲第六軍向北京進，一二三四軍既達第一目的後，與第五六軍直指敵巢」（見魏黎元洪電）。這時由津浦路前進的北伐軍，所向無前，連戰皆捷，初次粵軍姚雨平及蘇軍合敗敵軍張勳於固鎮，敵方增援而來，戰於南宿州，又爲姚軍及淮軍陳幹打得落花流水。於是張勳等只得放棄徐州，各路亦正謀分進合擊，直搗幽燕。清帝見情勢危急，搜羅袁世凱譚和，同時我方主和者亦居多數，遂以清帝退位爲條件，而中止北伐軍事。這是民國成立以來，國父首次指揮軍事的經過。

可是滿清雖告推翻，而緜滿清之後的封建遺孽及反革命勢力，卻又此外彼起，變本加厲。國父目擊心傷，認爲職責所在，只得重整旗鼓，聲討叛逆了。十餘年間，由討袁之役（民國二年及四年兩次），而護法之役（六年聲討馮國璋，段祺瑞），而討莫榮新之役（九年），而討陸榮廷之役（十年），而討陳炯明之役（十一年至十三年）而討沈鴻英之役（十二年）及削平廣州商團之變（十三年）等，就中除討袁之役，避居日本，遙爲指揮各省同志起兵討伐外，其他戰役均以廣州爲根據地，就近指揮。在這個時期中，國父於民六被選爲海陸軍大元帥，民十被選爲非常大總統，每次均統攬黨政軍的大權。民十二由滬重返廣州主持討陳，因各將領之推戴，又留就陸海軍大元帥職。可見在戰時政治與軍事一元化的必要性。國父正像英國克倫威爾，德國腓特烈，法國拿破崙，他們都是一樣統攬着政治指導與軍事指揮的大權。可是國父原以貫徹護法，實現國家統一及完成國民革命爲職志的，自然不能偏促於南方一隅，亟宜與師北向，剷除北洋軍閥。因此國父先後在廣州發動了兩次北伐：第一次在民十一年，國父於民十以兩廣底定，親至桂林，整理軍隊，準備於十一年春督師由桂取道湖南，大舉討伐非法總統徐世昌及直系軍閥。不料，北伐軍於十一年初陸續出發到達湖南邊境時，陳炯明竟在後方勾結直系軍閥吳佩孚，不獨斷絕北伐餉械的接濟，且從而阻撓北伐軍的前進。國父不得已，遂由桂班師返粵，覬免陳炯明贖務，改道江西北伐，於是年五月六日，親臨韶關督師。這次的作戰計劃：第一期奪取贛州，第

三期奪取南昌九江。義師所指，節節勝利，經將贛州克復，北伐軍前到吉安泰和，但又因陳炯明在後方搗亂，曠使部下圍攻總統府，只得回師靖亂了。第二次在民十三年，國父以曹錕、吳佩孚勝比爲奸，毀法禍國。遂於九月率師重蒞韶關，發表宣言，檄告天下，名正言順，聲威大震。旋以曹吳倒塌，及北方國民黨領袖同志紛電入京共商國是，國父應召離粵北上，改用和平方法解決一切糾紛，北伐於焉中止。

國父於討賊各役中，以指揮討伐陳逆之役，其沉着大胆，堅剛果斷及機智，比之中外古今的名將，毫無遜色，洵爲我國今後將校的楷模。卻說國父因陳炯明的阻撓北伐，由桂返粵，乃免其粵軍總司令及省長兼內務總長等職，但念其前勞，冀其悔過自新，仍留陸軍總長之任，旋爲便利北伐起見，復畀以辦理兩廣軍務。而陳卻冥頑不靈，竟愈演愈兇，於民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曠使部下葉舉圍攻總統府，欲置國父於死地，實現其獨霸廣東地盤的陰謀，國父當時接得這個誤害的密報，在叛軍的刀光劍影中，從容不迫避入楚豫艦，轉登永豐艦（後改名中山艦以留紀念），便造成「廣州蒙難」的一幕，這和「倫敦蒙難」的一幕，同樣的悲壯險絕，成爲中國革命史上的兩大奇蹟。

國父登艦後，即召集各艦長商議應變戡亂的策略。這一役就海軍作戰上說：假如海軍力量強大的話，就應使陸戰隊單獨登陸，佔領據點，進擊敵軍；反之海軍力量薄弱，不能單獨登陸作戰的話，就應發揮炮火協同陸上部隊，夾擊敵軍。國父當時因海軍陸戰隊，爲數不多，只得採取

後一策略，一面令衛戍總司令魏邦平率所部集中大沙頭，策應海軍進攻陸上叛軍，一面親率座艦永登及永翊、楚豫、豫章、同安、廣玉、寶璧等艦，於十七日由黃埔出動，經車歪砲台駛至白鵝潭，砲擊大沙頭、白雲山、沙河、觀音山等處叛軍，各彈多中標的，叛軍聞聲落胆，紛紛棄械逃遁，傷於砲火之下者達數百人。惟因陸上部隊，未能如期發動策應，砲擊之後，叛軍仍得散而復聚，其亂未獲平，已足表示「正義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猶在」。（見致本黨同志書）。

國父見情況如此，遂率各艦駛回黃埔鎮守，這時各艦艦長均主張艦隊移往江西。國父卻認爲只有襲取車歪砲台，駛進白鵝潭，等候北伐軍回師夾擊，較爲得計，旋於七月十日又親率座艦及楚豫、豫章、寶玉、寶璧等艦，從海心開駛往三江口，向車歪砲台轟擊，叛軍亦發砲還擊，一時砲聲震天，雙方均有損失，各艦艦長目擊叛軍砲火佔優勢，畏縮不敢前進，國父以身作則，令座艦駛於先頭，一致攻擊前進。而叛軍在該砲台兩岸佈置野炮有二營之多，一見艦隊駛近，便構成交叉火網，實施封鎖射擊，殘波射擊，彈如雨下，各艦均受微傷，座艦連中六彈，官兵死傷十餘人。國父一面指揮各艦作戰，一面觀督船內，雍容鎮定，大有古代儒將之風。正如國父致本黨同志書說：「此役也，以兵艦數艘，處叛軍四集環攻之中，不惟不退，且能進至省河，以播叛軍之胆，而壯義士之氣，中外觀聽，亦爲之聳動」。國父在白鵝潭，一直支持到八月九日，見李烈鈞許崇智等北伐軍回師討逆的失利，認爲孤守省河，於事無濟，方離粵赴滬，再圖討伐。

。于此，值得大書特書的，當座艦寄碇白鵝潭時，陳逆曾運動海軍叛變，以威脅 國父，施放水雷魚雷，以謀害 國父，派遣飛機，盤旋於座艦之上，以恐嚇 國父，又用民船銅板小輪及敢死隊，圍襲 國父座艦。這時全體官兵均驚惶失色， 國父卻屹然不動，這是由於秉持「寧為玉碎，勿為瓦全」，「總統為民國而死，分所應爾」，「我輩既為國犧牲，當置死生於度外，方寸既定，逆軍其如予何」（註六）的偉大精神所致。這種精神，正和英國海將納爾遜於伐拉加的大海戰中，身爲敵彈所傷，尤負傷指揮，直至絕命爲止的精神，先後輝映。

讓我於此補述 國父對於海軍的研究吧： 國父對於往昔水戰上所謂「風沙水線」的知識，無不通曉（註七）。對於英美各國出版之海軍名著，無所不讀。據說：每年定有英國海軍年鑑，常置案上，以供參考，並屢對同志詳論海軍在國防上的重要性（註八）。像在這役中，當肇和，海溪，海圻三大艦爲陣逆運動，駛離黃埔時，叛軍以爲這三大艦他移之後，則 國父所停在黃埔各小艦，均在魚珠砲台監視之下，並爲黃埔後方的海心崗，平日水深只有六尺，各艦必不能通過，那麼，勢不爲魚珠砲台所轟燬，亦必爲其所封鎖，任憑爲所欲爲。卻不知道 國父對於海圖，瞭如指掌，他爲應付這個突變，即派員往測該處河水的深度，一聽得水深達十五呎的報告，私心大喜，嘆爲果不出所料，立即督率各艦從黃埔上游，經海心崗駛出三河口，繞道駛往新造村附近，使叛軍無所售其奸。這一個斷然的處置，使全體海軍將士，爲之心折。就是叛軍方面，也深

驚其神算。至對各艦艦長主張艦隊不可移駐西江，列舉五大理由說：「（一）以西江水淺，如各艦移至西江，僅留三大艦在黃埔，則海軍以勢分而力弱，大艦或爲逆軍所買，則將來更難取勝。（二）以大本營一離黃埔，則長洲要塞必失，廣州附近水陸形勢，盡入逆軍範圍之中，牽制更難，賊隊必張。（三）以總統移駐西江，其地面較廣，活動雖易，然黃埔爲廣州咽喉，且有長洲要塞，其地點重要，非西江可比。且總統駐於黃埔，廣州雖失，猶易恢復，威望仍在。如移西江，地勢偏僻，無以繫中外之望。（四）海軍如往西江，重來省河較難，如北伐軍回粵，不能奏水陸夾攻之效。（五）移駐西江，而棄長洲天然之要塞，另謀陸上根據地，能否佔領，尙不可知。且西江各部陸軍，態度不明，能否爲吾所用，尙未可必。如果陸上毫無根據，陸軍又不奉命，則海軍勢孤，可立而待。有此五害，故動不如靜，堅持北伐軍速來，以備水陸夾攻省城，則賊亡有日也」。又說：「各艦由此出動西江，經道牛山、魚珠之叛軍砲台，又有三大艦已在沙路港口，監視我各艦行動，叛軍砲台或可鼓勇衝過，而沙路港口之三艦，監視嚴密，其妨礙我行動，阻止我通過無疑。故我艦隊此時惟有襲取車坭砲台，駛入省城之一策，其餘皆非計也」（註九）。這真是一個英明的指示及決策。又，于民十三致蔣介石先生的親筆信說：「聞仲愷信說：械船到時，擬在金星門內起卸，以避耳目，我以爲不必如此，若爲避人耳目計，則金星門大大不相宜。因金星門之對面，卽伶仃關，該關有望樓，有緝艇，凡到金星門附近之船無不一目了然，實在不能避，

而反露我欲規避之心，示人以弱，恐反招英艦之干涉，因英艦已視此等海面爲其範圍，此一不可也。且金尾門外，年年淤淺，此時之水路，當較數年前海圖必差數尺，恐致擱淺，此二不可也。又在該處搬運，實花費太多，又恐小艇有遇風雨盜賊之危險，此三不可也。究不如直來黃埔，公然起卸爲妙」。據說依此而行，果得安然起卸，足見 國父的熟悉海上形勢。在民權主義上說：「好像外國的舊兵艦，從前如果是裝了十二門大砲，便分成六個砲台，要瞄準放砲，打什麼敵人，都是由許多砲手去分別執行，做指揮的人，不能直接管理。現在新兵艦，要測量敵人的遠近，在桅頂便有測量機，要瞄準放砲，在指揮官的房中，便有電機直接管理。如果遇到了敵人，不必要許多砲手去瞄準放砲，只要做指揮官的人，坐在房中，就測量機的報告，按距離的遠近，撥動電機。要用那一門砲，打那一方的敵人，或者是要十二門砲，同時放砲，都可以如願，都可以命中，像這種海軍砲的使用，是叫做直接管理」。足見 國父對於海軍砲兵的研究。此外 國父對於古代水戰亦很注意，他在國民要以人格救國的演講詞上說：「從前莊子說：『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爲泚泚爲事，客聞之，請置其方百金，聚族而謀之曰：我世世爲泚泚不過數百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則與越人水戰，大破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泚泚，則所用之異也』。這幾句話的意思，就是保護手在冬天不至破裂的那種藥，宋人用之不適當，世世僅供漂布後塗手之用

，吳人用之適當，便供水兵冬天耐戰之用，而得一國」。

前面說過 國父因討逆未果，乃離粵赴滬。可是 國父於到滬之後，依然籌劃討陳事宜，不數月（十一年底），陳逆便爲滇桂各軍驅出廣州。各將領見粵局稍定，乃電迎 國父於十二年二月重返廣州主持大局，惟此時陳逆仍盤據于惠州， 國父認爲「孔明欲出中原，先擒孟獲，吾欲用長江，非先滅陳不可」（註十）。遂於是年夏季，親自督師東征，其經過情形有如下述：

「國父爲劉餘陳逆炯明以除後患，乃決計親征，設大本營於石龍。於八月廿三日乘大南洋輪船爲座駕，十二時向東江進發，下午九時，抵達石龍。時天氣奇熱，船復激駭，所處之室，僅容一席，而 國父居之泰然，按圖握管，決策定計。晝夜不少息。及至許崇智由博羅來請，請示機宜，並謂逆軍分三路來襲，李易標已抵距此二十里之湯村，敵將接近，不意帥座冒險來此也。時滇桂各軍，已與陳逆激戰數日，迄未得勝。廿五日，博羅方面，又告失敗。林某即率逆軍向石龍進犯。廿六日，博羅飛彌嶺失守，逆軍佔銅鼓嶺等地， 國父乃命飛機出發博羅，使守城者知有援應，並親函許崇智堅守，更命差艦載糧冒彈前進以資接濟。又電廣州促援軍急速來援，羽檄如雪片，而軍行轉緩，蓋廣州滇軍待餉乃發。不聞博羅被圍之急與不急也。因之博羅之圍，終不得解。廿七日，情勢亦惡，及至深夜，尙不見援軍之至， 國父乃遣古應芬回省，催促滇軍福軍與吳鐵城所部開進。李福林即

率所部備朱培德赴前方，同時吳鐵城部亦開抵增城。廿九日，國父由石龍向博羅前進，從禮村至蘇村，沿途風雨急驟，船阻難行，甚至李福林、吳鐵城兩部負偵察任務之騎兵，均不得進。而翼小舟，顛簸動盪，勢頗危險，然國父正襟危坐，策畫軍事，並以民元以前之革命史，昭示同行官佐，而被閱圖籍，未嘗一日輟也。卅一日，國父由鐵岡泊池地抵松村，時博羅被圍已久，守將劉震寰拚死堅持，城下水漲，急軍不得近，僅以砲遠射而已。適譚延闓入湘之軍，由敗轉勝，捷報傳來，國父喜形於色，乃命各軍攻擊前進。九月一日，座船至第七礮，命福軍滇軍登山警戒，並飭副官於山巔燃火為號，使城內知主帥親自來援。次日，國父親登北嶺，舉凡偵查敵情，考察地勢，悉自爲之，於致胡漢民書曾云：「吾今日兼盡一排長之職務矣」。惟其時，滇軍大部份尙未集中，且驕不受命，國父不得已，重返石龍督促，雖許滇軍祿國籍以重賞，而無效果，悍將驕兵，殊可恨也。三日，東路軍所屬師長張民達，與逆軍戰於淡水，大破之。四日。張至石龍據報請調，國父命福軍滇軍分左右兩翼進攻，滇軍第四次要挾軍餉未得，全部引退，止之無效。得南路鄧本殷攻陷北海訊，國父命永豐艦往援。七日，許崇智決突圍，但以援軍不克，早八時，福軍與逆軍大部接觸，滇軍田中毅、粵軍張發奎等部開離難拍翼佈陣。國父親自登山督戰，左翼福軍，初猶小勝，及逆軍大部衝進，福軍退去，逆乃乘勢闖進，沿鐵岡墟而蘇

村，欲斷福軍之歸路。是夜，退至石龍。八日，黃進蘇村，張部等會同福軍，進攻義和
墟之逆。破之。九日，國父由雄雞拍翼至譚公廟，率屬登山督戰，各軍奮勇分途追擊，
鏖戰甚烈，自朝至午，進退數次，雙方均有死傷。十日，博羅守軍楊廷培，突圍至銅鼓嶺
，逆軍死傷枕藉，向派尾雷水退卻，博羅之圍，乃得以解。國父即乘機赴梅湖觀察軍砲
兵陣地，以備進攻惠州。博羅之圍解後，國父會福軍及張部等分途追擊，十一日，克平
山。十二日，命飛機隊往惠州城投彈。十三日，國父入梅湖，親發重砲（由虎門運往之
十五生的要塞砲）五發，轟擊陳逆所盤據之惠州城。次日返廣州，得增城報捷訊。十八日
，國父復至前方。二十日，至飛鵝崗籌攻惠州，上午十一時至砲兵陣地，被逆軍發見，
敵即不斷發砲向國父射擊，彈落身旁，詎不意丈，從者多爲國父危，而國父但諒以無
恐，並謂敵砲射程已止於此，縱密發，必不及。此種大無畏精神，與料敵之準確，軍事專
家嘆爲罕見。旋以事返梅湖，留程潛等襲敵，行至中途，忽聞爆炸聲甚烈，後知白沙壩所
泊電船自炸，飛機隊長楊仙逸，長洲要塞司令蘇從山，魚雷局長謝鐵良均遇難。廿一日，
復至梅湖重砲陣地親發六彈攻惠州。次日復攻，雖不破敵，逆胆已寒。廿三日午，合各軍
並進，作衝鋒之搏擊，戰至廿四日拂曉，以魚雷炸城基，飛機擲炸彈，亦不克。午後，逆
軍反攻死亡過鉅，不支而退。十月卅一日，兩軍相戰，互有勝負，劉震實於是日退出飛鵝

出飛揚嶺。十一月六日，國父恐博羅失守，亟行出發親征，激戰之餘，雖告勝利，而惠城仍然在逆軍之手。八日，逆軍傾巢而出，各軍均受挫。九日，國父愈懸重賞，嚴督反攻，無如各軍各顧地盤，不肯力戰。十一日移大本營於石灘車站。十二日，逆軍迫近石灘，被滇軍擊退，旋聞蕪湖，鐵路方面戰急，討逆軍不支，國父即令新到之李根潔部沿廣九路前進，不移時，聞戰大敗，滇兵沿鐵路紛奔，訛言四起。國父即率古應芬李烈鈞等急下車翻止，以圖反攻。不料滇兵多不從命，尚後紛退，車遂倒行，侍從副官黃惠龍等乃強國父上車，旋改登機車，直開廣州，而李烈鈞等已不及趕上，特另乘車到石灘佈防。時逆軍乘勢尾追，幾及石灘。然而范石生一聞敗耗，不待款舉，急奔赴救，大破之於石灘以東，逐逆軍洪兆麟部於石龍，逆軍之勢乃稍戢，事接各路逆軍復以重兵自廣九路圍逼廣州，廣州形勢危急，不堪言狀，國父仍本其大無畏之精神，堅持一兵一槍之奮鬥，又急電湘軍豫軍馳援，豫軍樊鍾秀即日夜兼程趕到廣州，徒步出擊破之，廣州賴以保全。是役也，國父之危，不減於白鵝潭之役，而堅剛勇邁之氣，視白鵝潭之役殆尤過之，從其後者，諒及此番戰事，莫不神往。（註十一）

以上記載，尙屬簡略。雖說戰鬥以殲滅敵人戰鬥力，迅速獲取勝利為目的，國父在這一役中，以八十餘天的短期間，因陳逆憑據惠州的天險，及我方雜牌軍隊未能用命，致不克將其包圍

機敵，卻給予重大的消耗，並摧毀其鬥志，尤以 國父親臨前線督戰的精神，足以感召我全體革命將士，造成他日東江大捷的因素。就通例說， 國父以大元帥的地位，五十有九的高齡，對於討賊軍事，本應坐鎮後方的廣州，應用電話電報來指揮，但卻不顧一切險阻，毅然挺身到前線去，如設大本營于石龍，親到砲兵陣地發砲擊陣逆，及敵砲對他射擊，彈落身傍，而不退避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實與拿破崙於普法戰爭中——率軍前進的精神，獨出一轍。

于此，尚有兩點，值得特別提出略述如下：

一是按圖圖籍：我們知道，不能判讀地圖，固然不配做指揮官，而地圖又常為指揮官必備的工具，指揮官不能拋棄地圖而指揮作戰，正如航海者不能拋棄羅盤針而航海。否則，在戰場上就變成瞎子，既不辨東西南北，也不辨地形地勢，固不會適切地運用戰略戰術，更無從判斷敵軍的企圖、位置與配權。據說： 國父對於軍用地圖很重視，在這次東征中，常吩咐參謀秘書或親自攜帶地圖，到野外時，平鋪地上，站着用手杖指點判讀，並指示部屬。在軍營中，懸掛壁上，或平置桌上，用紅藍鉛筆劃出記號，以為指揮作戰的根據。登山觀察地形時，用望遠鏡瞭望之後，又對照地圖，判別有否差誤，對於圖上所示路程的遠近，山川的高低廣狹，都能迅速計算出來。對於地圖上很小地點的名稱，亦能記得清清楚楚（註十二）。雖在督戰時，一有餘暇，定必手不釋卷，一種好學的精神，真為常人望塵莫及。考李翁的作戰，他不論自己所擔任職務怎樣的重

大，凡關於豫定戰地，必先在歷史上和地圖上仔細研究，並自行嚴密整理各種地圖，出發時，在雙腳的草袋中常攜帶必要的地圖和書籍。前面說過，國父精通拿翁戰略，那麼於此也許受到拿翁的影響吧！

二是使用空軍助戰：空軍的大量使用於戰場上是開始於上次歐洲大戰。從此，戰爭的形態，便由平面變為立體，空軍在現代戰爭上幾取陸海軍的地位而代之，沒有擁有強大的空軍，而被迫參加現代新型的戰爭，其吃虧將不堪設想。國父對空軍的認識，在中國實為第一人，民元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時，已設立航空隊，民六歐南洋同志書說：「飛機為近世軍用之最大利器」，並獎勵同志學習飛行，派遣同志到外國學習航空，提倡「航空救國」及在廣州大沙頭設置航空局以主其事。他曾說過：「像飛機不是一次做成了便可以飛的，是經過許多次的改良，才完全成功。……像大沙頭的那般青年飛機師，從前不知道怎麼樣飛，但是請外國的技師來教，所以學到現在，便飛得很好」（見國民黨奮鬥之法定宗旨演說詞）。國父在這次東征中，為導致殘局於有利的形勢，曾派空軍到前方助戰，雖說當時所擁有的軍用機連練習機僅有十餘架，未能實行「杜黑主義」，使用強大的空軍，一舉而殲滅逆軍，並且當時機上所裝置的機關槍，係步兵使用的手機關槍，所投擲的炸彈，係改裝的水雷或迫擊砲彈，一切都是很幼稚的（註十三），但卻可以看到，國父已拋棄陳舊的平面戰爭的觀念，踏上嶄新的立體戰爭的大道了。於

此應附帶一說的，國父也從事於現代機械化部隊的建設了。機械化部隊以戰車爲主體，它具有優越的運動力、攻擊力與防禦力。而這號稱爲「地上雄獅」的戰車，係出現於上次歐戰，並在戰場上表演了驚人的奇蹟。自此以後，各國競相建立機械化部隊，加以英國機械化部隊理論家富勒將軍的鼓吹，更使機械化部隊的建設與空軍的擴張，俱成爲今日世界軍事的兩大主流。國父對於上次歐戰很有研究，對於歐美鼓吹建設機械部隊的理論，也必受其洗禮，所以在當時物質條件的限制之下，仍勉力設置一個「甲軍隊」，設計者爲擅長甲車戰術的蘇聯顧問李庚將軍，雖說幾個甲軍隊亦同飛機隊一樣的幼稚，使用於鐵路上的改裝鋼甲火車（據說使用於廣九、廣三、粵漢鐵路收效頗大），使用於公路馬路上的改裝鐵甲汽車，爲數無幾，及所有的坦克車輛正在製造試驗中（註十四），但此舉卻開了中國機械化部隊建設的先河。我們今後的建軍，應澈底地接受國父這兩個偉大的遺規吧！

最後還有：一是國父於同盟會時代的一九〇五年，親自擬定軍事規章有：「軍政府與各處民軍關係條例」，「軍隊之編制」，「將官之等級」，「軍餉」，「戰士賞恤」，「軍律」，「招軍章程」，「略地規則」和「因糧規則」等。於中華革命黨時代的一九一四年，又親自擬定有：「中華革命黨革命方略」，內分「軍政」，「軍政府」，「廠制動配」，「軍律軍法」，「因糧徵發及其他則例」等編，其中大部份亦屬於軍事規章，從這些規章看來，非對於兵學及軍事法

幾業有研究，苟克臻此。其次是 國父鑒於歷次革命的失敗及蘇聯創設紅軍的成績，以爲今後欲掃除國內反革命勢力，尤其爲鞏固中國國防及對外打倒帝國主義，決不是利用烏合之衆的民衆，可以成事，因爲他們沒有經過嚴密的訓練，缺乏戰鬥的能力。也不是利用舊軍閥的武力，所可濟事，因爲舊軍閥以爭權奪利爲目的，不聽命令，不守紀律，隨時可以幹起反革命的勾當來，像陳炯明、陸榮廷、沈鴻英之流，何莫非一度投機參加革命，但終變成與革命爲敵的反動軍閥，所以非從新建設強大的革命武力不可，爲此必須養成大批新革命幹部，這便是 國父設立黃埔軍官學校（原名「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的原因。 國父爲設立這間軍官學校，於民十三年派蔣中正、廖仲凱兩先生負責籌備，旋任蔣氏爲校長，廖氏爲黨代表。開學之日， 國父親臨致訓，勸勉全體學生以「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從此積極訓練，一面授以軍事學術，一面加以政治訓練，果然源源養成無數新的革命幹部，奠定黨軍的基礎，這真是中國現代建軍上的偉績。

西人論將帥的條件：一曰無畏的大勇，二曰創造的智慧，三曰強健的體魄。德國名將魯登道夫也說過：「主帥的地位，應爲第一等艱辛，第一等天才，第一等堅強意志」，（十五） 國父實足以當之而無愧。 國父確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文武合一的大人物，亦是現代一個智仁勇兼全之天才的大軍事家！

（註一）波亞（Boer）人爲荷蘭農民移殖南非，分居於蘭斯亞及阿倫治自由邦， 國父

在「錢幣革命」中所稱「杜爾二國」，即指此。在「軍人精神教育」中所稱「杜國」即指杜蘭斯亞。在民權主義上所說：「波人」，即波亞人。

(註二) 據馮自由先生於民國卅年七月由滬給我的信

(註三) 及(註七)，及(註十二)(註十三) 據李仙根先生口述。

(註四) 據胡毅生先生(是彼參加者)口述。修正坊本記述寫成。

(註五) 據張文先生口述。

(註六) 及(註九) 見蔣介石先生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國父語。

(註八) 據張溥泉先生口述。

(註十) 見鄭海濱先生編著：「中國國民黨史稿」(商務版)，國父語。

(註十一) 參照胡去非先生編纂：「總理事略」第十一章六十節寫成，並承參與是役者兩位老同志校正。因該文經古應芬著：「孫大元帥東征日記」寫成，而古著與事

實略有出入。

(註十四) 據趙超先生口述。

(註十五) 見張君勛先生譯「全民黨戰爭論」(魯登道夫著)，本書所有魯氏譯文係根據

氏譯本。

參考書：胡漢民編：「總理全集」（民智版），獨自由著：「革命逸史」（商務版），陸運節輯：「孫中山先生外集」（中華版），中宣部編：「國父孫中山先生年譜」等。又，本書全文所參考書籍達一百二十種，論文達二百十五篇，因限於篇幅，未能盡錄，合併聲明。

二．戰爭思想

思想是行動的指針。是力量的根源，一種戰爭必有一種戰爭的思想。德國兵學大師克勞塞維說：「戰爭起於戰事爆發時所存在之各種思想觀念等關係，復因此等關係，而使戰爭有種種形態」。

中國過去的歷史是戰爭起伏的歷史，今後的歷史，當然也免不了掉戰爭的發生，但今後的戰爭思想，是不容再有紛歧或錯誤了：分歧則力量分散，難期勝利，錯誤則輕舉妄動，禍國殃民。所以必須建立一種正確的戰爭思想，以爲今後戰爭行動的指針，實爲先知先覺者的重大使命。

過去的戰爭思想，姑且勿提。現在世界的戰爭思想，可以分爲三大體系：一是社會主義的戰爭思想體系，一是民主主義的戰爭思想體系，一是法西斯主義的戰爭思想體系。前者以蘇聯爲代表，次者以英美爲代表，後者以德意日爲代表。現在他們正在本着這種戰爭思想或戰爭哲學，而進行着戰爭。

可是，在我國今後應建立怎樣的戰爭思想呢？關於這個問題的解決，當然我們不能向上逃奔

國去移植，也不能關在房子裏來憑空捏造，更不必在我國古兵書及其他經典裏來兜圈子。我們知道：戰爭思想是政治思想的反映，德國的戰爭思想是德國政治思想的反映，英國的戰爭思想是英國政治思想的反映，蘇聯的戰爭思想是蘇聯政治思想的反映。現在我國的政治思想是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自然我們的戰爭思想，也是三民主義的戰爭思想。所以我們爲建立中國今後的戰爭思想，就要從三民主義中（國父全部遺教俱可歸結于三民主義）去發掘和建立。其實，國父早已爲我們建立了基礎了。

克勞塞維茲氏關於戰爭的定義說：「戰爭的基本要素，是兩人以上之間的鬥爭，即決鬥，戰爭不外是決鬥的擴大」。跟着歸結說：「戰爭是用暴力行爲屈服敵人，實現我方的意志」。國父對於戰爭這個術語，雖然沒有下過一個完整的定義，但在民權主義裏卻說過：「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國內相爭，人民同君主相爭」。克氏又說：「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的行動，實爲一種政治的手段，政治上對外關係的一種延續，而以其他手段（暴力行爲——浴日註）實行之」。國父亦認戰爭屬於政治的形態說：「政治的海陸軍力」，跟着又說：「應用政治力去亡人的國家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一是外交，怎樣說兵力一戰可以亡人國呢？拿歷史來證明：從前宋朝怎樣亡國呢？是由於崖門一戰，便亡於元朝。明朝怎樣亡國呢？是由於揚州一戰，便亡於清朝。拿外國來看：拿破崙第一戰，拿破崙第一之帝國便亡，斯丹一戰，拿破崙第三之

帝國便亡」(民族主義)。所以我想 國父一定讀到克氏「戰爭論」而受其影響的。於此，我可再舉出一些例證來。克氏說：「凡爲指揮一種戰爭或一戰役的重大活動，而取得光榮的勝利，非具有政治上的特別高見不可，所以戰爭與政治是一致，將帥也是政治家」。民權主義裏說：「如果軍人說不干涉政治，還可以聽得通，但說不懂政治，便講不通了。因爲政治的原動力便在軍人，所以軍人當然要懂政治，要明白什麼是政治」。在革命成功個人不能有自由團體要有自由的演說詞上說：「管理衆人的事，就是政治，換言之，管理衆人的事，就是管理國家的事。這個道理，許多軍人多不明白，譬如這次北方發生事變，(指民十三馮玉祥、胡景翼、張作霖等擁戴曹錕和吳佩孚——浴且註)，本是少數軍人的舉動，這件事變，本來就是革命，他們發動了革命，就是發生了政治變動。……現在北京有政治原動力的軍人，已發生了政治變動，而且說不懂政治，這好比是磨打自己發生了電力之後，不知道用處，當然是有極大的危險。至於有大原動力的軍人，日日在政治範圍中活動，而沒有政治意識，那種對於衆人的危險，比磨磨打當然更大，又更厲害。大家現在如果還不明白這個道理，可以讀我的民權主義，便能夠了解」。克氏「戰爭論」是世界軍事名著，也是一種戰爭哲學，不特軍人應該讀它，卽一般思想家亦應人手一卷。它是政治家、外交家、顧問及一切與政務有關者的枕中寶。讀以 國父的「好學」與「博學」，尤以指揮戰爭的鑿鑿，自不會不知道這部名著，又不會不加以深刻研究，難說目前未找到更確鑿的證據。

但在上面言論的對照上已可以推知其究竟了。但 國父與克氏亦有不同之點，就是 國父不是克氏爲戰爭而戰爭的論者，而是爲革命而戰爭的論者，他一面反對「野蠻」與「弱肉強食」的侵略戰爭，另一方面主張「以戰止戰」，「爲人類作干城，爲進化除障礙」的革命戰爭（見 國父爲「戰爭入門」一書所撰的序），文亦即實現三民主義的革命戰爭。可見他戰爭思想比克氏來得更正確和進步。

其次， 國父對於戰爭發生的見解，不是看做偶然的現象，也不是看做經常的現象。他認爲有國家卽有戰爭，戰爭是國家間不可避免的现象。中國存亡問題一文說：「論國家之起源，大槪以侵略人之目的，或以難免人侵略之目的而爲結合，其侵略人固爲戰爭，卽欲避人侵略亦不能難免戰爭」。他又認爲在革命過程中，戰爭亦爲不可避免的现象，誠以革命是最艱鉅的事業，或從事於統治者的推翻，或從事於侵略者的打倒，唯有訴諸流血的戰爭，決不是採取溫和的手段所可奏效。故 國父當革命之始，卽揭櫫「掃除殘廢」的綱領，又確定「軍政時期」，爲革命建設步驟的第一個時期，換言之，就是戰爭時期，建國大綱宣言上說：「夫革命之目的，在於實行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之實行，必有其方法與步驟。三民主義能否影響於人民，俾人民蒙其幸福與否，端在其實行之方法與步驟如何。文有見於此，故於辛亥革命以前，一方面提倡三民主義，一方面規定實行主義之方法與步驟，分革命建設爲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期於循序漸進，以完成革命之工作，——蓋不經軍政時代，則反革命之勢力無由掃蕩，而革命之主義亦無由宣傳於羣衆

，以得其同情與信仰，——前者之大禍，在革命破壞不能澈底」。由此可見 國父並不同法西新主義者以戰爭爲立國之本，或爲擴大「生存空間」而戰爭，或爲滿足「自然願望」而戰爭，乃是爲自衛而戰爭，爲革命而戰爭，即是說如果不是爲自衛和革命，則不可發動戰爭。至於根據 國父最高的理想，戰爭這個東西並不是永遠不會消滅的，卻有待於「大同世界」的實現。

如今我再具體地舉出 國父戰爭思想的特質。他的戰爭思想，既和民主、法西的戰爭思想不同，也和社會主義的戰爭思想有異，此外亦不同於神祕派（Mysticemintal）如法國梅斯特、魯東，德國的菲希特、黑格爾等的戰爭思想，又不同於生物社會學派（Bio-socialist）如英國的達爾文、俄國德拉哥米諾夫、德國尼采、白恩哈地、斯坦美茲等的戰爭思想，又不同於實證主義進化派（Positive Voluntarism）如法國聖西門、孔德、英國斯賓塞等的戰爭思想。更不同於現代日本軍閥謳歌戰爭爲「創造之父，文化之母」。他的戰爭思想是「民主主義的戰爭思想，已如前述，現我再來給它指出下面的五大特質：

一、爲生存而戰
爭：

這可以說是 國父戰爭思想的核心。國父的哲學，是民生哲學，說社會的進化以民生爲重心，亦即以人類求生存爲原動力，在社會和歷史中，一切都可以以人類求生存去說明，自然戰爭亦不能例外。可是 國父民生哲學的論據是怎樣呢？民生主義說：「民生爲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爲歷史的重心」。又說

「社會問題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又以人類生存問題爲重心，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再說：「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爲要求生存，人類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再又說：「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組織的改良和道德進步，都是以什麼爲重心呢？就是以民生爲重心，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誠以戰爭是民族國家的不可避免現象，又是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人類最重要的活動，其發動也當以求生存爲重心，才是最正確的，唯有全民族國家全社會人類皆爲求生存而戰爭，才是革命的戰爭，才是爲「進化除障礙」的戰爭，否則就是掠奪或侵略的戰爭。其次，民權主義說：「人類如能夠生存，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家，第二件是養，保和養兩件大事，是人類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衛，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的能力，才能夠生存。……人類要在競爭中求生存，便要奮鬥」（奮鬥可分爲和平的奮鬥，戰爭的奮鬥——浴日註）。又 國父於民國元年解職後，在香港與西報記者談話說：「惟吾意中國無侵略志，因吾人志尚和平。吾人之所以要水陸大軍者，只爲自保（即求生存——浴日註），而非攻人」。由此可見 國父的戰爭思想是以民族的生存爲核心，更昭然若揭。他發動推翻滿清，是爲求中華民族的生存。他主張抵抗帝俄，也是爲求中華民族的生存，他歷次與師討賊，也是爲求中華民族的生存。至于我們此次對倭抗戰，也是繼承 國父的遺志，爲求中華民

族的生存。本來魯登道夫將軍在「全體戰爭」一書上，也是主張爲生存而戰爭的，他說：「全體性的戰爭之目的，在於民族生存之維持」，實則他僅爲求大日耳曼民族的生存，在大日耳曼民族求生存的大前提之下，他可以犧牲別個民族的生存，即他只要自己民族的生存，不要別個民族的生存。我 國父則比他正確進步得多，既要自己民族的生存，同樣也要別個民族的生存，而且要助扶別個民族的生存，正如民族主義所說的「濟弱扶傾」。

二、爲和平而戰

和平與戰爭是相反的现象，也是相成的現象，主張和平不能反對戰爭，主張戰爭也不能反對和平。今後的戰爭，應爲和平而戰爭，即爲打破一切不平的現象，使歸於平，消除一切不和的原因，使歸於和。這便是 國父爲和平而戰爭的思想。實業計劃上說：「中華民國之創造，其目的爲和平」。這是說爲打破滿清對

我漢族的不和平，才發動推翻滿清的戰爭，依於戰爭的勝利，而創造中華民國，即創造新的和平。尤值得注意的， 國父的發動戰爭都是出於不得已而在和平絕望之後，民元就臨時大總統告各友邦書說：「吾中華民族，和平守法，根於天性，非出於自衛之不得已，決不肯輕啓爭端。故自滿清盜竊中國，於今二百六十有八年，其間虐政，罄竹難書。吾民族唯有隱忍受之，如倒懸之待解。求自由而企進步，亦常爲改革之要求。而終勉強求所以和平解決之道，初不欲見諸流血之慘也。屢起屢滅，卒難達吾人之目的，至於今日，憤忍無能忍。吾人鑒於天賦人權之萬難放棄，

神聖義務之不容不盡，是用訴之武力，棄脫吾人及世世子孫於萬重羈縻」。大亞洲主義演講詞上說：「講歐洲人之在亞洲者，俱以和平方法，退還亞洲人之權利，如果不能達到目的，便當訴諸武力」。且常贊揚中國人素愛和平的天性說：「中國人民本甚和平，現在世界上，立國百有數十，雄強相處，難保不有戰爭發生，惟中國數千年來，即知和平爲世界之真理，人人均抱有此種思想，故數千年來之中國，絳向和平以進行，中華民國有此民數，有此民習，何難登世界舞台之上，與各國交際，共謀世界之和平，此種和平運動，即中華民國國民之天職」（見民一四月二日在南京參議院解職辭）。又說：「中國更有了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民族，只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近來因爲經過許多大戰，殘殺太大，方主張免去戰爭，開了好幾次和平會議，像從前的海牙會議，歐戰之後的華賽爾會議，金那瓦會議，華盛頓會議，最近前洛桑會議，但是這些會議，各國人共同去講和平，是因爲怕戰爭，用於勉強而然的，不是出於一般國民的天性。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超乎外國人，說和平的道德，更是超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好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更從歷史上證明說：「羅馬不過與中國的漢朝同時，那個時

候，中國的政治思想便甚高深，一般大言論家都極力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字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棄珠崖之議，此項文章就是反對中國去擴充領土，不可與南方蠻夷爭地方。由此便可見在漢朝的時候，中國便不主張與外人戰爭，中國的和平思想到漢朝時已經是很充分的了。

到了宋朝，中國不但去侵略外人，反爲外人所侵略，所以宋朝被蒙古所滅。宋亡之後，到明朝才復國，明朝復國之後，更是不侵略外人。當時南洋各小國要來進貢歸化中國，是他們仰慕中國的文化，自己願意來歸順的，不是中國以武力去壓迫他們的。（見民族主義）。到了民十四逝世的時候，自己願意來歸順的，不是中國以武力去壓迫他們的。到了民十四逝世的彌留時對同志說：「余此次放棄兩廣北上，實爲和平統一而來」，又反復斷續的說。「和平！奮鬥！救中國！」益見 國父愛好和平的精神，他這種愛好和平精神，是貫通着整個的戰爭思想。並可見他是反對動輒以干戈相見的顯武主義者，是反對惟恐天下不亂閃擊人國的侵略主義者。至於這次日本軍閥的進攻我國，就是破壞中國的和平，破壞世界的和平。我們發復以全民抗戰。是爲維持中國與世界的和平，同時也是發揚 國父倡導和平的偉大精神。

三、爲剷除障礙而戰爭

國民革命的障礙有三：一曰專制皇帝，一曰封建軍閥，一曰帝國主義，這三大障礙物，如果沒有根本剷除，則國民革命無由成功，三民主義亦無從實現。但欲根本剷除這三大障礙，唯一法門，就是斷諸流血的戰爭。所以 國父實進行推翻滿清之時，無時不倡率起義，採取戰爭手段。見同盟會宣言說：「滿清政府，

窮凶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見北伐宣言說：「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眾利益，辛亥之役，推倒君主專制政體，釐清征服階級，本已得所藉手，以從事於目的之貫徹」。至爲打倒軍閥，使先後實行討袁，護法，討莫，討陸，討陳，討沈及兩次北伐。又見黨員不可存心做官演說詞說：「軍事的奮鬥，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趕走一般軍閥官僚」。見北伐宣言說：「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殲滅曹吳，尤在曹吳殲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以繼續反革命之惡勢力。換言之，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反革命之根柢乃得永絕，中國乃能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之國家也。中國國民黨之最終目的，本於三民主義，本黨之職任，卽爲實行主義而奮鬥，故敢請告於國民及友軍曰：吾人題詞北洋軍閥之後，必將要求現時必需之各種具體條件之實現，以爲實行最終目的三民主義之初步。此次爆發之國內戰爭，本黨因反對軍閥而參加之，其職任首在戰勝之後，以革命政府之權力，掃蕩反革命之勢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謀自治」。同時因帝國主義亦成爲國民革命的障礙物，故亦主張打倒帝國主義，見同宣言說：「國民革命之目的，其內容具如此，三十年來，帝國主義與軍閥互相勾結，以爲其進行之障礙。遂使此等關係民國存亡國民生死之孽孽毒端，無由實現。爲謀目的之達到，不得不從事於障礙之掃除，此北伐之舉所不容已也」。又見爲商團事件對外宣言說：「今將開始一新時期，爲努力推翻帝國主義之干

涉中國，掃除完成革命之歷史之最大障礙」。並在民族主義中極力主張打倒帝國主義，在民族主義中亦極力主張打倒專制皇帝及封建軍閥，因為帝國主義不打倒，則民族主義無由實現，專制皇帝及封建軍閥不倒，則民族主義無由實施，推而至於民生主義亦無由着手，此次我們不惜付最大的犧牲來抵抗日本軍閥的侵略，又加入太平洋戰爭與英、美、荷等同盟國並肩作戰來打倒日本軍閥，其目的就是為掃除我們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的障礙。

一國當外患之來，很明顯的，抵抗就是自衛的生路，屈服就是自殺的死路。

四。為抵抗侵略而戰爭

中國對外向來採取抵抗主義。發軔於開國始祖軒轅黃帝的驅逐蚩尤，發揚於管仲的掃除夷狄，秦始皇的建築長城，漢武帝的驅逐匈奴，晉謝立的大敗苻堅，唐太宗的討伐突厥，南宋岳飛的抵抗金人，明代戚繼光的剿平倭寇，降及 國父，更

把這個主義發揚光大了。

當民國元年，帝俄侵我外蒙古甚急，製造所謂「庫倫獨立」，旋以俄蒙協約，迫我承認，野心勃勃，節節進逼，屢屢乎有囊括我東北各省之勢。這時 國父為打破這個危機，便以在野之身，堅決地提出對俄抗戰的主張，見錢幣革命一文（發表於民二）說：「今者俄人乘我建設未定，金融恐慌，而擾我外蒙古，以常情論之，我萬無能抵抗之理，在俄人固知之素，而審之熟，故甘冒不韙行之。我國人皆知蒙亡國亡，與其不抗俄屈辱而亡，孰若抗俄而為壯烈之亡」。跟着說：「

與其俯首聽人之瓜分，何若發奮一戰，以戰強俄，而固我國基於萬代之爲愈也。況當此民氣正盛，國體方新，戰有必勝之道，不戰爲必亡之階，孰利孰害，不待智者之決也。縱以常理論之，今日戰亦亡，不戰亦亡，與其屈於弱道強權而亡，不如一殉人道公理而亡，一戰不獨不亡，而更可揚國光，衛人道，伸公理於世界也。國父爲糾正當時北京政府和議派的錯誤主張，在談文上又大聲疾呼說：「語曰『能戰而後能和』，惟我今日不能戰，故俄敢公然侵我領土，若徒然與辦交涉，與之言仲裁，悉歸無效」。國父這個偉大的主張，因當時北京軍閥政府採取不抵抗主義，未能實現，致把外蒙古的主權漸送於俄人。可見不抵抗主義的危險！又國父於民元解職後，在香港與西報記者談話說：「若果歐人勢逼吾人，則吾人將以武力還國」。並在民族主義上力主採取抵抗主義說：「中國有些廢心妄想的人，以爲列強對於中國的權利，彼此之間，總是要妒忌的，列強在中國的勢力總是平均，不能統一的，長此以往，中國不必靠自己去抵抗，便不至亡國。像這樣專靠別人，不靠自己，豈不是望天打卦嗎？」又說：「救中國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團體，用三四百個家族的團體來顧國家，便有辦法，無論對那一國，都可以抵抗。抵抗外國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積極的，這種方法，就是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之解決以與外國奮鬥，二是消極的，這種方法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極的抵抗，使外國的帝國主義減少作用，以維持民族的地位，免致滅亡」。再說：「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列強要抵抗他」。此外

在國際大綱上亦規定有：「對於國外侵略強權，政府當拒絕之」的條文。這是更進一步確定以抵抗侵略為國策的，不特說，今日我們的對倭抗戰，就是實踐 國父先前所豫定的抵抗主義和國策。

五、爲人
類打不
平而戰
爭：

二十世紀的世界是一個極端不平等的世界：一面是壓迫者，另一面是被壓迫者，一面是侵略者，另一面是被侵略者，但兩者人數的比較，感於壓迫侵略地位的帝國主義者佔极少数，而陷於被壓迫被侵略地位的弱小民族卻佔大多數，以最大多數人類而被最少數的強者所宰割和蹂躪，天地間不平之事，孰甚於此！故

國父主張於完成民族主義之後，便要發動爲世界弱小民族打不平而戰爭，以期造成大同世界。

民族主義說：「我們四萬萬人和十二萬萬五千萬人聯合起來，我們更能聯合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就要提倡民族主義，自己先聯合起來，推己及人，再把各國小民族都聯合起來，共同去打破二萬萬五千萬人，共同用公理打破強權」。又說：「世界上的十五萬萬人之中，頂強盛的是歐洲和美洲的四萬萬白種人，白種人，以此爲本位，去吞滅別種人種，如美洲的紅番已經消滅，非洲的黑人，不久就要消滅，印度的棕色人已在消滅之中，亞洲黃色人現正受白種人的壓迫，不久或要消滅，但是俄國革命成功，他們一萬萬五千萬人，脫離了白種，不覺成白人的侵略行爲，現在想加入亞洲的弱小民族，去反抗強暴的民族，那麼強暴的民族，只剩得二萬萬五千萬人，還是想用野蠻手段，拿武力去征服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故此後世界人類，要分爲兩方面去決鬥：一方面是十二

萬萬五千萬人，一方面是二萬萬五千萬人。第二方面的人類雖然很少，但是他們佔了世界上頂強盛的地位，他們的政治力和經濟力很大，總是用這兩種力量去侵略弱小的民族，如果政治的海陸軍力所不及，便用經濟力去壓迫。如果經濟力有時而窮，便用政治的海陸軍力去侵略，他們的政治力幫助經濟力，好比左手幫助右手一樣，把多數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民壓迫得很利害。但是大不從人願，忽然生出了斯拉夫民族一萬萬五千萬人，去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爲世界人類打不平。所以我前次說：有一位俄人說，世界上列強所以詆毀列寧的原因，是因爲他敢說世界多數的民族十二萬萬五千萬人，爲少數的民族二萬萬五千萬人所壓迫。列寧不但是說出這種話，並且還提倡被壓迫的民族去自決，爲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打不平，列強之所以攻擊列寧，是要消滅人類中的先知先覺，爲他們自己求安全。但是現在人類卻覺悟了，知道列強所造的謊言都是假的，所以再不被他們欺騙，這就是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進步到光明地位的情況，我們今日要把中國失了的民族主義，恢復起來，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爲世界上的人類打不平，這才算是我們的天職。

一。國父這個崇高偉大的戰爭思想，不獨我們世世子孫應奉爲圭臬，就是全世界弱小民族及帝國主義國家內的被壓迫階級亦應表示熱烈的同情與擁護。到了實現之時，世界一定得到真正的平等。

以上便是 國父三民主義的戰爭思想，本此而論，自然他是反對軍閥戰爭，反對帝國主義戰

爭，關於前者，他說：「軍閥僅知以武力據地盤，以欺詐保權利」（見民十一年獨資實、楊道聲一編）。又說：「事實上，不能容軍閥中之一派不對於他；而施以攻擊，且凡屬軍閥莫不擁有僱傭軍隊，推其結果，不能不出於爭戰，用於搏奪，盡搶奪於隣省，較之搶奪於本省爲尤易也」（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關於後者，他說：「國際戰爭者無他，純然一箇直有組織之大強盜行爲耳，故對此種強盜行爲，凡有心人，莫不深疾痛恨之」（見實業計劃）。又說：「歐洲數年大戰的結果，這是不能消滅帝國主義，因爲當時的戰爭，是一國的帝國主義和別國的帝國主義相衝突的戰爭，不是野蠻和文明的戰爭，不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仍是一個帝國主義打倒一個帝國主義，留下來的還是帝國主義」。關於階級戰爭呢，國父認爲階級戰爭，是歐美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在今日的中國則不能發動此種戰爭，他說：「階級戰爭，即工人與資本家之戰爭也。此種之戰爭，現已發動於各工業國家者，極形劇烈。在工人則自以爲得最後之勝利，在資本家則決意以爲最苦之壓迫，故此種戰爭，何時可以終局，如何可以解決，無入敢預言之者。中國因工業進步之遲緩，故其形式上觀之，尙未流入階級戰爭之中。吾國之所謂工人者，進稱爲苦力。而其生活具以手爲飯碗，不論何資本家，若能成一小工店予他等以工作者將必歡迎之，況資本家之在中國經營農屋，亦僅見於通商口岸耳」（實業計劃）。

此外 國父亦已產生「全民戰爭」的思想了。現代的戰爭，已由過去的「英雄戰」，「軍隊

戰」，「政府戰」，進化爲「全民戰爭」。戰時攻擊的對象，不限於軍隊，而是整個民族，從事戰爭也是整個的民族，民族中的每一個份子都要貢獻着他的全力，然後才足以爭勝負。而全民戰爭的發源，始於上次歐戰，主要的，由於現代新式武器的發明和使用：有了空軍便使戰場無前方與後方之分，國民無與國長與非國員之別，敵方的空軍能夠隨時侵入轟炸對方國內任何地方，獲得極強大的破壞威力。也能夠使人墮下百憂的宣傳品，以動搖對方戰勝的信心。尤以降落傘部隊及空橋步兵的出現，更可以突然侵入對方的後方實行奇襲。此外，無線電之設備，可以用做有力量的宣傳工具，法國空軍又能藉着敵對方的對外交通，而陷整個民族於飢餓線。總而言之，現代的戰爭已變爲「全民戰爭」了。倘若人家對我施行「全民戰爭」，而我僅作局部的抵抗，或僅以軍隊應付，未有不敗的。在「國公的全意遣教中，雖然不見有「全民戰爭」這個名詞，卻常見有性質相類似或相類稱的：「民族戰爭」，「民族革命」，「國民革命」，「全民政治」等名詞，祇以我國今後的對外抗戰，當要發揚全民族的力量（人力，物力，財力）來考慮，亦即要全民族參加革命，全體國民都而革命，方能爭取革命的勝利。正如「國父說：「故舉國一致，誓死靡他也」（《錢語革命》）。又說：「我們這革命事業完全成功，便要大家一致行動……必要大家同心協力，才可以實行。如果不能同心協力，便永遠不能實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再又說：「人人對於國家社會，當竭爲我個人（個人組織而成，且國家社會之事（戰爭亦即國家社會之事）

（浴日註），即我分內事也，有時凡有益於國家社會之事，即犧牲一己之利益爲之而不惜，然後國家社會乃能日臻於進步（地方自治與責任心演講詞）。至於全民政治，當以全民戰爭爲對象，依於全民政治的設施轉移爲全民戰爭的運用。以上便是 國父全民戰爭思想的根本，但它是革命的，不是侵略的，與德魯魯登道夫的言論不同。其次，全民戰爭是以民族精神爲基礎的，團結全國上下成爲一教者，視此精神力，在艱難困苦中支持長期抗戰者，視此精神力，是壯軍民殺敵的意志及爭取國際的同情與援助者，亦視此精神力。所以民族精神，實爲全民戰爭取勝之本。 國父有見及此，故發動推翻滿清之時，即提出（驅除鞑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民元就臨時大總統通告海陸軍將士說：「曠觀世界歷史，其能成改革大業者，皆必有甲冑之士，反戈內應，若士若荀，其前例矣。吾國軍人伏處異族專制之下最久，慷慨激烈之氣，蓄之也深，則其發之也速。同一軍人也，爲漢擊則奮，爲清戰則沒。同一艦也，爲漢用則勇，爲滿用則怯。凡此攻城克敵之豐功，皆吾將士有勇知方之表證。內外視國者，徒致嘆於吾人成功之迅速，爲從來所未有。文猶有以知吾海陸軍將士，皆深明乎民族民種之大義，故能一致進行，萬死不避，以成此偉烈也」。這是指出民族精神在民族戰爭上所發生的效果。其次 國父在民族主義上大聲疾呼，從速恢復民族精神，鞏固民族精神，以抵禦外侮而挽救危亡，說：「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羸弱的國家

「，國際中最低的地位。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爲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亡」。又說：「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我們想要恢復民族的精神，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我們知道現在處於極危險的地位，第二個條件是我們既然知道了處於很危險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國固有的團體，像家族團體和宗族團體，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團體，結成了國族團體，有了四萬萬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奮鬥，無論我民族是處於甚麼地位，都可以恢復起來」。所以在抗戰期間中，「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號，便支配着全國同胞的心靈，所有軍民，雖苦不怨，雖危不投降。不待說，這就是由於秉着民族精神。但是足爲民族精神的障礙，有一種代代相傳所謂「世界主義」，或「世界精神」，因爲這種主義，其流弊必變爲不抵抗主義，投降主義，順民主義，奴隸主義，又如俗語說：「不管誰做皇帝，都是一樣納糧」的思想。民族主義說：「世界主義就是中國二千多年以前所謂天下主義，我們現在研究這個主義，要知道他到底是好不好呢？照理論上講，不能說是不好。從前中國智識階級的人，因爲有了世界主義的思想，所以瀟灑入關，全國就亡。康熙就是講世界主義的人，他說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東西夷狄之人，都可以來中國做皇帝，就是中國不分夷狄華夏，就是世界主義。大凡一種思想，不能說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們用不合

我們用，如果合我們用便是好，不合我們用便是不好，合乎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世界上的國家，拿帝國主義把人家征服了，要想造成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提倡世界主義，要全世界服從他。中國從前也想做全世界的主人翁，總想站在萬國之上，故主張世界主義，因為普通社會，有了這種主義，故滿清入關無人抵抗，以致亡國。當滿清入關的時候，人數是很少的，總數不過十萬人，怎麼能夠征服數萬萬人呢？因為那時候，中國大多數人很提倡世界主義，不講民族主義，無論什麼人來中國做皇帝，都是歡迎的，所以史可法雖然想反對滿人，但是贊成他的人太少，還是不能抵抗滿人，因全國的人都歡迎滿人，所以滿人便得做中國的安穩皇帝，當那個時候，漢人不但不是歡迎滿人，並且要投入旗下，歸化於滿人，所以有所謂「漢軍旗」。因此，在今日，我們就應該掃除這種主義的遺毒，積極發揚民族精神，先完成民族戰爭，民族主義，然後再來講真正的世界主義。

總之 國的前途戰爭思想是進步的，是革命的，是反侵略的，是救國救世的，換言之，就是以「仁」為中心的三民主義之戰爭思想。這個思想能建立，是中國戰爭思想的一大革命，也是世界戰爭思想的一新步驟。我們有此正確戰爭思想為戰爭行動的指針，這是中國的福音，也是世界的福音。

三·國防計劃

倘若人類皆愛和平，戰爭早已消滅的話，那麼我們現在也不必再來談什麼國防建設了。

國防建設係以戰爭為對象，正因為世界戰爭的不斷發生，尤以我國的國際環境，處於列強環伺眈眈席視之中，且我們又應從戰爭上來謀中國的自由解放，更應從事於戰爭的準備——國防建設，亦即「時效戰」的準備。

現在的戰爭是全體戰爭，是綜合戰爭，現代國防的內容，一般學者分為精神國防，與物質國防，或分為政治國防、經濟國防、文化國防、及軍事國防。惟從事於這們新型國防的建設，決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即可了事，須認明對象（假想敵），作有計劃的建設，然後才能建立強大的國防，做到「聽魚戰爭」，或「戰則必克」，——實現國防的目標。

中國是世界一個古國，也是一個大國，氣候溫和，物產豐富，陸有白山、興安嶺、阿爾泰山、天山、崑崙、崑崙山、喜馬拉雅山為天然屏障，海有朝鮮半島、琉球列島、舟山羣島、澎湖列島、台灣、香港、海南島、安南及東西沙羣島為天然屏障，固然這些地理因素有利於我們國防上

的防禦，但亦不過是補助的因素而已，正如孫子說：「地者兵之助也」。所以我們不可專恃這天然屏障來鞏固我們的國防。因為現代交通工具的發達，由於輪船戰艦的使用，便可以打破我們海上的天然屏障。陸上的天然屏障，如天山、阿爾泰山大致多和邊界的方向垂直，亦不足以阻止彼此的交通。白山、興安嶺橫亘於東北的邊境，蔥嶺、崑崙山、喜馬拉雅山橫亘於西南的邊境，彼此亦有相連的道路。何況今後以飛機的進步，可以橫渡海洋，又可以飛越高山峻嶺，又依于降落傘部隊與空中步兵的大量使用，隨時可以侵入我們的內部。其次我們的境內有松遼平原、華北平原（黃河三角洲）、東南平原（長江三角洲）、嶺南平原（珠江三角洲）、兩湖平原（包括洞庭湖流域和鄱陽湖流域），亦便於侵入之敵機械化部隊的活躍。我們再看：在此次中日戰爭中，因為我們沒有強大的海空軍，敵人便得安然在我沿海登陸。反之，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日本為什麼不一鼓作氣侵入美國本部，主要的不是太平洋的障礙，而是因為沒有優勢的海空軍。又看德國自開戰至今，依然未能侵入英倫，主要的不是多維海峽的障礙，而是由於英國海軍的優勢，及擁有相當的空軍，足以控制維多海峽。我們明乎此，就應致力於人為的國防建設了。但在人為的國防體系中，像靜的國防力量亦不足恃的，正如此次歐戰中，列國要隘不足以保障比利時的安全，馬奇諾防禦不足以保障法國的安全，所以我們在人為的國防建設上，必須置重點於動的國防力量的建設，方足以鞏固國防，適應今後戰爭的要求。

在中國國防建設上，孫子兵法十三篇算是一部偉大的國防指導原理。該書劈頭就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是指示我們在未戰之前，就要致力於國防建設，倘若沒有強大的國防力量，而貿然與人家開戰，其危險將不堪設想。跟後又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又說：「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又說：「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再說：「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可惜歷代總提著國防建設大權的君臣們只把它當作一部兵法的書看，沒有把它的原理運用到國防上，即忽略它在國防指導上的價值。何以支配着歷代君臣們的腦筋，又是那些所謂「偃武脩文」、「重文輕武」、「以大事小」、「以德服人」、「佳兵不祥」、「兵兇戰危」等思想，益以內戰的頻仍，國力的空虛，遂使國防建設無從發展。即頂大工程的高里耳城，在歷代的防禦上，亦幾等於零。尤以降及宋明之世，廢除徵兵制度，極端抑武揚文，一則崇尚理學，一則提倡八股，致士林日趨文弱，更造成國防上一個大大的漏洞，所以宋明皆由偏安而至亡國。迄於滿清，以異族入主中華，對於漢人的摧制，無所不用其極，所有兵權不許漢人過問，專事防內，不思防外。泊乎列強帝國主義的侵入，先後遭鴉片（中英戰爭）、丁巳（英法聯軍戰爭）、甲申（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庚子（八國聯軍戰爭）諸役的失敗，割地賠款，舉國騷然。這時清廷自知以一族一姓之力不足

以禦倭國存，漢人從此方稍得抬頭的機會，說到當時對於國防建設的主張，先後有以林則徐爲代表的「海防論」，以曾國藩、左宗棠爲代表的「洋務論」，以李鴻章、張之洞爲代表的「時務論」，以康有爲、梁啟超爲代表的「維新論」，畢竟因爲他們沒有真正了解西洋富強的原因，文化的精神，及中國國情，故所發爲議論和主張，均未能爲起死回生之劑，且因清廷的腐敗過甚，（如慈禧太后移海軍建設經費來修頤和園等），亦多未付諸實施，故終未能把中國的國防力量建設起來。

「沒有國防，便沒有國家」，國父於上次歐戰結束之後，因飽受歐戰的教訓，又自學國防的危機，更感到過去「海防論」，「洋務論」，「時務論」及「維新論」的錯誤與失敗，便決意爲中國國防打開一條新路，撰著「國防計劃」一書以爲宣傳，並作爲今後國防建設的兩針。

國父對於中國國防的言論，可以追溯到李鴻章的「人盡其材，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其實這便是他最初關於國防的主張。此後，民元四月在廣東軍界歡迎會上演講說：「今日要務，在乎擴張軍備，以成完全鞏固之國防，然後可與世界列強並駕齊驅」。民二致陳英士先生的信說：「中國之海軍，合全國之大小戰艦不能過百隻，設不幸有外侮，則中國危矣，何也？我國之兵船不如外國之堅利，槍炮不如外國之精銳也，兵工廠不如外國設備齊全也，故中國今欲富強，非厲行擴張軍備不可。同志請中國國防不有相當武備建設，此中國不富強之原因，誠恐

也。故中國欲動修軍備，然後可保障國家獨立民族生存也。文聞袁同志世凱擬向外國大借外債以爲擴張新軍備建設之需，果此事實行，則中國有相當新軍備建設也。如是則中國富強，可計且爾待也。昔清政府將擴張海軍建設之費以爲建設一大娛樂園（穆頤和園——浴日註）以作私人之娛樂，吾想今日民主政府，必定努力整理新軍備建設，改革中國舊軍備也，而不有昔日滿清政府之腐敗也。現在強隣如虎，各欲吞食我國，若我國不有相當武械自衛，則我國必爲虎所食也。故我須改良武備然後能自衛也，不爲虎所食也。民八爲「精武本紀」撰序說：「我國民族和平之民族也。吾人初不以鬪武善戰策我同胞，然處競爭劇烈之時代，不知求自衛之道（即國防建設之道——浴日註），與不適於生存。且吾輩近代戰爭之起，恆以弱國爲間題。倘以和平之民族，對於自衛，則新世初無弱肉強食之說，而自國之問題不待他人之解決，因以促進世界人類之和平，我民族之責任，不綦大哉？易曰：「設戒誨盜，治容誨淫」。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此皆爲不知自衛者言也」。到民十三演講民族主義時，更把中國國防的危機，說得淋漓盡致：

「因爲我們的海陸軍和各險要地方，沒有預備國防，外國隨時可以侵入，隨時可以亡中國。最近可以亡中國的是日本，他們的陸軍，平常可出一百萬，戰時可加到三百萬，海軍也是很強的，幾幾乎可以和英美爭雄，經過膠州領會證之後，戰鬥力限制到三十萬個

日本的大戰船，像巡洋艦、潛水艇、驅逐艦都是很堅固，戰鬥力都是很大的。譬如日本此次派到白鶴潭來的兩隻驅逐艦，中國便沒有更大的船可以抵抗，像這樣的驅逐艦在日本有百幾十隻，日本如果用這種的戰艦來和我們打仗，隨時都可以破我們的國防，倘我們的死命，而且我們沿海各險要地方，又沒有很大的炮台，可以鞏固國防，所以日本託在東鄰，他們的海陸軍隨時可以長驅直入，日本或者因為時機未至，暫不動手，如果要動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國，從日本動員之日起，開到中國兵變之日止，最多不過十天，所以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此係就民國十三年前的情勢，並為警惕國人而說，後經我政府逐漸充實國防力量，故此對日抗戰得以不亡，且可獲得最後勝利——浴日註）。由日本望太平洋東岸，最強的的是美國。美國軍從前多過日本三倍，近來因為受華盛頓會議的束縛，戰鬥艦減少到五十萬噸，其他潛水艇，驅逐艦種種新戰船，都要比日本多。至於陸軍，美國的教育是很普及的，小學教育是強迫制度，通國無論男女，都要進學校去讀書，全國國民，多數受過中學教育，及大學教育，他們國民在中學大學之間，都受過軍事教育，所以美國政府隨時可加多兵。當參加歐戰的時候，不到一年，便可以出二百萬兵，故美國平時常備軍雖然不多，但是軍隊的潛勢力非常之大，隨時可以出動百萬兵。假若中美絕交，美國自動員之日起到攻擊中國之日止，祇要一個月，故中美絕

交在一個月之後，美國便可以亡中國。再從美國更向東望，位於歐洲大陸與大西洋之間的，便是英倫三島，英國從前是稱海上霸王，他們的海軍是世界上最強的。自從華盛頓會議之後，也限制戰鬥艦不得過五十萬噸，並於普通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都比美國多。

英國到中國，不過四五十天，且在中國已經有根據，好像香港已經經營了幾十年，地方雖然很小，但是商務非常發達，這個地勢，在軍事上掌握中國南方幾省的咽喉，練得有陸軍，駐得有海軍，以香港的海陸軍來攻，我們一時雖然不至亡國，但是沒有力量可以抵抗，除了香港以外，還有接近的印度澳洲，用那些殖民地的海陸軍，一齊來攻，自勤員之日起，不過兩個月，都可以到中國，故中英兩國如果絕交，最多在兩個月以內，英國便可以亡中國。再來到歐洲大陸，現在最強的是法國，他們的陸軍是世界上最強的，現在有了兩三千架飛機，以後戰時還可以增加，他們在離中國最近的地方，有安南的根據地，並且由安南築成了一條鐵路，通到雲南省城，假若中法絕交，法國的兵，也祇要四五十日，便可以來攻擊中國。所以法國也和英國一樣，最多不過兩個月，便可以亡中國。照這樣講來，專就軍事上的壓迫說，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強國，都可亡中國。

以上可以說是「國父擬著『國防計劃』」一書的原因，但這僅限於遺教上的原因，且這些原因，除上李鴻章書外，其餘均屬於軍備的原因，雖說國防不僅限於軍備，但軍備確是國防的主要

部門。至於「國防計劃」一書的內容，根據 國父於民國十年七月八日給廖仲愷先生的手札（註一），那僅是 國父擬著「國防計劃」一書的大綱草案，並非「國防計劃」一書的全豹。三民主義的自序語：「國家建設一書，發前三書爲綱，內涵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劃八冊，而民族主義一冊，已經脫稿，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二冊，亦草就大部，其他各冊，於思想之縝密，研究之門徑，亦大略規畫就緒，俟有餘暇，便可執筆直書，無待思索，方擬全書告竣，乃尙而問世，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六陳炯明叛變，炮聲震青山，竟將故年心血所成之各種草稿，並備參考之西籍數百種，悉被燒去，殊可痛恨！」所以 國父給廖先生的遺封信，可當作他擬著「國防計劃」一書的「大略規畫就緒，俟有餘暇，便可執筆直書，無待思索」。倘若不遵陳逆叛變的形勢，而他又不是近世得那麼早，則這部國防經典，定可完成。

國父給廖先生的手札，原文是：

「當革命破壞告成之際，建設發端之始，余乃不禁興高彩烈，以余生平之抱負，與窮心研究之所得，定爲建國計劃（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國防計劃、革命方略等）舉而行之，以求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強之域焉。不期當時之黨人，以余之理想太高，滋藉而不行，至民國建元，十年於茲，中國猶未富強如列強者，皆以不實行余之建國計劃而已。余近日擬

著一書（十年國防計劃），以爲宣傳，使我國國民了解余之救國計劃也。茲舉國防計劃書之綱目如下：

國 防 計 劃

- 一 國防概論
- 二 國防之方針與國防政策
- 三 國防之原則
- 四 國防建設大綱
- 五 制定永遠國防政策，與永遠之國防軍備，充實建設，爲立國之政策
- 六 國防與憲法
- 七 太平洋國際問題與中國
- 八 國防與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外交政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關係
- 九 國防與實業計劃之關係
- 十 發展國防工業計劃
- 十一 發展國防農業計劃
- 十二 發展國防鑛業計劃
- 十三 發展國防商業計劃

- 十四 發展國防交通計劃
- 十五 發展國防教育計劃
- 十六 財政之整理
- 十七 外交之政策與戰時外交的政策
- 十八 移民於東三省、新疆、西藏、內外蒙古，各邊省計劃
- 十九 保護海外各地華僑之意見書
- 二十 各地軍港、要塞、砲台、航空港新建計劃
- 二十一 都市與鄉村之國防計劃
- 二十二 發展海軍建設計劃
- 二十三 發展航空建設計劃
- 二十四 發展陸軍建設計劃
- 二十五 各重要會議之召集，如開全國國防建設會議，海軍建設會議，軍事教育會議之類，由中央政府，每年舉行一次，以爲整理國防建設
- 二十六 軍事教育之改革與訓練計劃
- 二十七 軍器之改良計劃

- 二八 軍制之改革
- 二九 軍醫之整理及改良軍人衛生之防護計劃
- 三十 國防警察之訓練
- 三一 軍用禽獸之訓練
- 三二 國防本部之進行工作
- 三三 仿效各國之新國防建設計劃
- 三四 舉行全國國防總動員之大演習計劃。與全國海陸空軍隊國防攻守大操演
- 三五 作戰計劃
- 三六 遣派青年軍校學生留學歐美各國，學習於各軍事專門學校，及國防科學、物質工程專門學校之意見書
- 三七 向列強定製各項海陸空新式兵器，如潛水艇、航空機、坦克、戰車、軍用飛機、汽球等，以爲充實我國之精銳兵器與仿製兵器之需
- 三八 獎勵國民關於國防物資科學發明之方略
- 三九 購買各屬軍事書籍、軍用品、軍用科學儀器、軍用交通器具、軍用大小機噐等，以爲整理國防之需

四十 組織考察世界各國軍備建設團之意見書

四一 聘請列強軍事專門人員來華教練我海陸空軍事學生，及教練國防物資技術工程之意見計劃書

四二 收回我國一切喪失疆土，及租借地、租界、割讓地之計劃

四三 我國與各國國防實力比較表

四四 抵禦各國侵略中國計劃之方略

四五 訓練國防基本人才三千萬計劃，訓練國防物質工程技術人才一千萬計劃

四六 完成十年國防重要建設計劃一覽表

四七 新兵器之標準

四八 組織海陸空軍隊之標準

四九 擴張漢陽兵工廠，如德國克魯伯廠之計劃

五十 國民代表大會關於國防計劃之修改，國防委員會意見書

五一 歐戰戰後之經驗

五二 國防與人口問題

五三 國防與國權

五四 指導國民研究軍事學問之研究

五五 實施全國精神政策

五六 軍人精神教育與物質教育之比較

五七 注重國際軍備之狀況

五八 我國之海軍建設計劃，航空建設計劃，陸軍之各種新式機械戰車，及科學兵器機械兵器建設計劃

五九 訓練不敗之海陸空軍計劃

六十 列強之遠東遠征海陸空軍，與我國國防

六一 各國富強之研究

六二 結論

以上各計劃，不過大綱而已，至於詳細之計劃，待本書脫稿，方可闡露。予鑒察世界大勢，及本國國情，而中國欲爲世界第一等大強國，及免重受各國兵力侵略，則需努力實行擴張軍備建設也。若國民與政府，一心一德實行之，則中國富強，如反掌之易也。」

這封手札中所說「國防計劃」一書的六十二項綱目，雖說尚是一個未完整而欠缺條理的簡單初稿，但具有現代化國防計劃的新規模。申言之，它不是十九世紀以前的那種純粹軍事的國防計劃

已進而把國家的整個活動如政治、經濟、文化等部門和軍事并列一起，構成全體性的國防計劃，來配合現代全體性的戰爭。他眼光的遠大，計劃的周詳，實爲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爲、梁啓超輩，望塵莫及。

我們現在研究 國父這個國防計劃大綱，真是感覺到它範圍的龐大，綱目的繁多。首先應研究的，是 國父的「國防方針」。我們知道：國防方針是產生於國防思想，各國各有其國防思想，及因其環境的不同，而各有其國防方針。英國與美國不同，美國與蘇聯不同。推而至於德日蘇亦各相異。三民主義爲我國防思想的根源，國防方針，自當以此種思想爲依據，所以它是自衛的，不是侵略的，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第一步應是「收回一切喪失疆土及租借地、租界、割讓地」(第四十二項)，及「抵禦各國侵略」(大綱第四十四項)，使國家得到完全的自由獨立。「國防政策」爲實現國防方針的手段與方案，它是隨時代環境而變化的，而國防方針則往往成爲一成不變的東西，兩者的關係如此，其不同又如彼，故大綱第二項定有「國防之方針與國防政策」。國防政策，係包括政治政策，經濟政策，文化政策及軍事政策。第二項定有「國防之原則」；本來在國防原則上，是以使敵人一兵一卒，不得侵入國境爲最高原則 英國亞爾夫來多氏說：「真正的國防，在於不使敵人上陸一步」。近代各國軍事家亦多主張：「求戰場必於國境之外」。但還是屬於攻勢作戰的，如果我們的力量尙未能從事於攻勢作戰，則要採取守勢作戰爲國防原則。

接於守勢作優點的發揮，亦可以爭取最後的勝利。十九世紀之初，俄國的擊敗拿破崙，就是採取守勢作戰的結果。此次德蘇之戰，蘇聯的擊退德軍，也是採取守勢作戰的結果，我們觀察我們今後的假想敵國仍是某某強國，那麼我們就應決定守勢作戰為第一期的國防原則。在國防建設上，努力克服我們守勢作戰的弱點，充實守勢作戰的力量。但卻不能永遠如此，因為國防建設，如運水行舟，不進則退，並且「能守未必能攻，能攻則必能守」，故將來仍要採取攻勢（非侵略性）的國防原則，以養成攻勢的國防力量，而轉移敵人於國境之外為最高理想。以下再就其他各項百分為四大部門作簡單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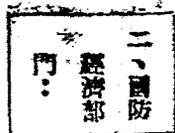
一、國防 政治部 門：

政治要以國防為中心，豫先造成對於未來戰爭的有利形勢，這是現代國防的特質。倘若政治建設不合乎國防的要求，或失敗的話，在平時足以招致國防的不安，到戰時，尤足導致戰爭的失敗。像上次歐戰德國的失敗，及此次歐戰法國的失敗，便是政治失敗為之厲階。所以大綱中對於政治極為重視，定有五十三項：

「國防與國權。國權亦稱主權，從事國防的建設，必須先求國家主權的獨立完整，要能自由行使，不受人家的支配，否則，像今日的朝鮮，安南何能從事國防的建設！第六項：「國防與憲法」，憲法是國家的大本，是說中華民國應建設為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藉得發揮全民的力量來建設國防，並使一切國防計劃的進行，不受政治變動的影響與障礙。第八項：「國防與三民主義、五

權應……：「中央政府之關係」。三民士善與國防的關係，略如上述。五權憲法乃為造成一五權分立之政府——最完全最良善的高能政府，以利國防的建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對於國防建設，應釐定職權，分工合作，且全體人員均要潔己奉公，增進效率。第三十項：「國防警察之訓練」，用以防奸捕謀，維持國家治安，且可作為戰時的預備軍。第二十一項：「都市與鄉村之國防計劃」，是為建設全國市政與鄉政的國防化。第五十二項：「國防與人口問題」，這是關於全國人口的生殖發育問題，在國防上所需要的國民是質優量多，但兩者比較，質重於量，故應提倡國民體育，防止疾病，改進營養。第十八項：「移民東三省、新疆、西藏、內外蒙古各邊省計劃」，用政府力量，移民於西北邊省，以解決本部人口的過剩，並得充實邊疆，開發資源，鞏固國防。第十九項：「保護海外各地華僑之意見書」，華僑為革命之母，向來對於祖國有很大貢獻。故在國防上應盡量設法（或用外交或用海軍）來保護他們，使他們在海外得以自由生存發展，不受人家之侮辱與宰割。還有第十七項：「外交之政策與戰時外交的政策」，平時外交，在能取得各國的援助來鞏固國防，戰時外交在能孤立敵人，爭取與國，來促進戰爭的勝利。為此必須確立有效的外交政策。總之，我們要能極量利用外交來達到我國防上一切的要求為上策，但絕不可忽略外交。

「盾」——國防武力的建設。



經濟爲國防力之一環，現在一國的經濟建設，已由國民經濟發展到國防經濟的階段。關於國防經濟的定義，據國防經濟學者的見解，它是表現於下述的三種形態：第一、平時經濟，作戰爭的準備，其主要目的，仍在滿足一般國民經濟的需要。第二、過渡時期經濟，即在戰爭危機迫切的時候，實行各種準備戰時經濟的手段，如經濟動員。第三、戰時經濟，即經濟戰爭，主要在滿足國防武力，國民經濟的需要，及對敵實施經濟戰。至在國防建設上，如果經濟沒有建設成功，則其他一切建設計劃，將等於紙上具文，而國防經濟的建設，現在完成軍事化的經濟力量。國父在民族主義上說：「大德意志聯邦成立之初，本來是農業國，後來變成工業國，因爲工業發達，所以陸海軍亦隨之發展」。在這個大綱上又定有第五項：「永遠以國防軍備，充實建設，爲立國之政策」，這是指示我們今後經濟建設要以國防軍事爲中心。在此次抗戰中，我政府經已遵照施行。第九項：「國防與實業計劃之關係」，國父的實業計劃，亦屬於國防經濟，平時的國防經濟，自與國防有密切關係。第十項：「發展國防工業計劃」，工業分爲輕工業與重工業，我國初期對於工業的建設，當要側重於重工業，以便新武器的生產，而加強國防軍的戰鬥力。正如倬士麥說：「國防的基幹是深植於工業繁榮的沃土中」。第十一項：「發展國防農業計劃」，實現全國糧食的自給自足，準備支將來日的長期戰爭。第十二項：「發展國防礦業計劃」，在儘量開發各地礦產，如開採金銀鐵產

，以充實財源。開採煤鐵、石油、銅、鋁、錫、鎳、鉛、鋅、銻等礦產以供給工業上所需的原料。第十三項：「發展國防商業計劃」，在使國內和國外的貿易活動，都在政府的管制之下，以利國防力量的養成。例如獎勵大量輸入國防用品及重工業的器材原料，俾一切國防及重工業之基本設施，得以儘速完成，而於奢侈品及非必需品則禁止輸入，以減少外國的支出等等。第十四項：「發展國防交通計劃」，為建設電話電報及陸上水空中各種交通網，以保國防上的通訊和運輸。第十六項：「財政之整理」，這是 國父有感於當時財政的紊亂，不合乎國防的要求，故提出這個主張，在使財源充裕，以供國防建設之需，及儲蓄大基原料與資金，以應戰時之用。

三、國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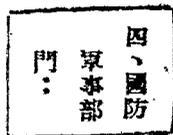
文化部

門：

文化力量在戰爭上亦可以取勝，與武力的比較，武力固可以取勝，但武力為保持其所獲得的勝利，仍須繼以文化的發揚。國父在民族主義上說得對：「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緣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於武力發展，繼之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可為發展文化，充實文化的力量，首在改革教育，使成爲國防教育。昔之勝法，俾士麥歸功於小學教師。日之勝清廢儀，日人歸功於「忠君愛國」教育的實施，便是兩大例證。所以大綱中定有第十五項：「發展國防教育計劃」，這個計劃的範圍，首在實現學校教育的國防化，但亦包括社會教育與家庭教育之國防化，旨在把每一個國民養成「國防人」，以參加國防工作及全副戰爭。第三十六項：「軍事教育之改革與訓練計劃」，我

國軍事教育向落人後，亟應改革，及樹立健全的訓練計劃，以資養成優良的幹部。第五十六項：「軍人精神教育與物質教育之比較」，兩者比較，當以精神教育爲重，尤以物質裝備處於劣勢地位的國軍，更應以精神教育爲重，詳見第五篇「決勝精神力」。第五十九項：「訓練不敗之海陸空軍計劃」，欲訓練陸海空軍成爲戰而不敗的軍隊，確非易事，有待於優良教育的建設，使指揮官對於戰略戰術運用自如，士兵對於戰鬥技能極其嫺熟，及全體官兵均有爲國家爲主義而犧牲奮鬥的決心。第三十六項：「遣派青年軍校學生留學歐美各國，學習於各軍事專門學校、及國防科學、物質工程專門學校之意見書」，爲深造青年學生成爲專家來担当軍事上或經濟上的國防建設等任務。第四十一項：「聘請列強軍事專門人員來華教練我海陸空軍學生，及教授國防物質技術工程之意見書」，這是「選材晉用」的政策，因我國目下缺少此項專才，故應暫時聘請外國，以訓練我青年學生。第四十五項：「訓練國防基本人才三千萬計劃，訓練國防物質工程技術人才一千萬計劃」，這真是一個迫切而偉大的計劃，在常人驟然看來，似乎近於吹牛，誠以現代國防部門之廣，國防業務之繁，非養成有此數目人才莫辦，尤以戰時國防各部門的動員需要人才更多，故不可不預爲準備。第五十四項：「指導國民研究軍事學問之研究」，在增進國民的軍事常識及技能，其實施方式——或用演講，或用通訊，或用圖書儀器，或組織訓練班，或設立各種協會如射擊協會、防空協會等來完成之。還有第三十八項：「獎勵國民關於國防物質科學發明之方略

「我們知道：科學是國防的基礎，沒有現代的科學將建設不現代的國防，今日我國最感落後的還是科學，而欲發展科學，除普及科學教育外，還要獎勵專家分途研究，廣為發明。現在世界各國科學水準最高的國家，首推德國與美國。這兩個國家的科學研究機關，有如林立，而且規模宏大，像美國比魯電話研究所，擁有研究員二千名，每年所用研究費達二千萬金元。德國卡茨柴維羅海羅姆協會是注重於自然科學的研究，包含有三十個研究的大組織，每年所費不貲。又如德國此次在歐戰中勝利的利器，如磁性水雷，噴火坦克，噴擊炸彈，俯衝轟炸機等，亦是科學的產物，其次各國政府對於科學上有特殊貢獻或發明的專家，獎予巨金，已屬常事，且有賜以爵位者，如德國無線電發明家馬可尼的獲得侯爵。有享受國葬之禮者，如德國尼布可式圖版的發明者，又為無線電傳真的功勞者巴羅尼布氏於逝世時，希特勒賜以此種葬禮。且遠在一八八二年陸巴特克福博士遠赴印度，發現了虎疫的病原菌，於回國的時候，威廉第二曾歡迎以凱旋將軍之禮。科學壇上，一時傳為佳話。又像蘇聯礦工斯通哈諾夫，他實驗成功了探礦增加效率的方法，政府獎予「列寧勳章」，全國尊為「勞動英雄」，並享受生活的優先權，全國所推行的生產競賽運動，稱為「斯通哈諾夫運動」。國父在民族主義中說過：「恢復我們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外國的長處，總是科學，十年之後，雖然不能超過外國，一定可以和他們並駕齊驅」。真是真知灼見。



軍事在國防上與政治、經濟、文化本是一體的，又是互相依存的，但卻是較重要的一環。上述政治、經濟、文化諸部門均要與軍事配合而并進。因為國防建設是準備戰爭，而軍事戰爭又是綜合戰爭的主體。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簡直無從鞏固自己的國防，參加現代的戰爭。大綱中的第二十八項：「軍制之改革」，

是主張改革軍隊的建制及保育制度，以適應國防上的要求。第五十五項：「實施全國精兵政策」，是說今後仍建軍，應採取精兵主義，在平時兵額宜少不宜多，以免靡耗國帑。相反的，在戰時卻要求兵愈多愈好，兵多而素質又優良，戰則必勝，這也是國父主張採取「征兵制度」的理由。第四十八項：「組織海陸空軍隊之標準」。這是屬於軍隊的編制問題，而軍隊編制的標準，當視擁有兵員兵器，及戰術要求敵軍情態而定，且應不斷提高標準，第一步應以一大軍團為標準，第二步應以二大軍團為標準。第二十九項：「軍醫之整理及改良軍人衛生之建設計劃」，孫子說過：「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驕而賤險，養生而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故為維持軍人的健康必須講求改良衛生，而改良衛生，首在整理軍醫，及確立改良衛生建設計劃。第三十一項：「軍用禽獸之訓練」，如驢馬、軍用鴿，軍用犬等的訓練。第二十七項：「軍容之改良計劃」，第三十七項：「向列強定製各項海陸空新式兵器，如潛水艇、航空機、坦克砲車、軍用飛機、汽球等，為充實我國之精銳兵器，與仿製兵器之需」。第四十九項：「擴張漢陽兵工廠，如德國克虜

伯砲廠之計劃」。第五十八項：「我國之海軍建艦計劃，航空建機計劃，陸軍之各種新式槍砲戰車及科學兵器機械兵器建造計劃」，這都是關於兵器之改良，購買和製造的計劃，在充實國軍的新銳兵器，加強戰鬥力量。但爲製造兵器，及供其他軍事上之整理，均要有工具的運用，所以又定有第三十九項：「購買各國軍事書籍、軍用品、軍用科學儀器、軍用交通器具、軍用大小機器等，以爲整理之需」。還有第四十七項：「新兵器之標準」，這是說國軍所用的新兵器，如陸軍兵器，空軍兵器、海軍兵器、化學兵器等，均要有一定標準，即新兵器的制式要一律，種類要單純，自製的要有一定標準，外購的亦要有一定的標準，以便戰時的補充。但以未來戰爭的延長，對於一切武器必須能夠自製自給，外購的僅爲過渡時期以供仿造而已。至於擴充濱陽兵工廠，如同德國克虜伯砲廠，不過舉其一例，其他海空軍等廠，亦當要與世界第一等強國並駕齊驅。第二十項：「各地軍港、要塞、砲台、航空港之新建設計劃」，這是軍事建設上一個大規模的計劃，工程浩大，需費亦鉅。軍港爲海軍根據地，航空港爲海軍航空根據地，要塞爲築城之一種，通常區分爲（一）陸地要塞，（二）江岸要塞，（三）海軍要塞，砲台爲設置砲位之所，要塞的一部。至要塞的功用，在節省兵力，阻擊敵人，消耗敵人，疲困敵人，給予自己的軍隊以攻擊敵人的適當機會，但我們則不可過信要塞的功用，如果認爲我們已構築有強固的要塞，從此敵人便不敢來犯，那是錯誤的。世界頂有名的強固要塞，如比國的列日，如法國的馬奇諾，如英國的新加坡，

都先後在這次世界大戰中宣告牠悲慘的命運了，這真是我們一個最寶貴的教訓。並且我們應證明：「要塞之設，在國防體系中，隨時勢和實際情形而變更，若以為要塞設置以後，可保存五十年百年之效用，甚至以為有永久價值，實為愚妄之見。從前腓特烈大王於德嶺山頂，所建的西爾柏堡要塞，到現在已喪失原來的意義和價值了」（註二）。依此而觀，無怪乎我國沿海沿江原有的要塞，在此次抗戰中，都阻擋不住敵人海陸空軍的猛烈進攻而陷落了。在戰後，我們對於要塞的構築，當以假想敵為對象，及跟着科學的進步而從新設計，但於地點方面，我們可以預先指出：像陸地要塞，應着重東北、西北及北正面。江岸要塞，應着重江陰、馬窩等處，於黃河流域，亦應擇要構築。海岸要塞，除旅順、威海衛、青島、連雲港、象山、三都澳、馬尾、滄松港等處外，於大沽、長江、珠江三口，尤應注意。但根據這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固定性的要塞的效用，遠不如流動性的飛機羣、坦克羣，所以我們於戰後，與其花許多金錢去構築要塞較不如先用來建設強大的空軍和機械化部隊，我們分佈於全國的大平原，如果沒有強大的空軍和機械化部隊的使用，決不能阻擋得住敵人的內侵。以上各項皆屬國防軍事建設計劃，亦可分別歸併於第二十二項：「發展海軍建設計劃」，第二十三項：「發展空軍建設計劃」，及第二十四項：「發展陸軍建設計劃」之內，真是無所不包的大軍事建設計劃。於此值得特別一提的，就是現階段的國防建設，應以發展陸軍或海軍或空軍為主體呢？過去有人主張採取「陸主海從」政策，也有人主張採取「

海主陸從」政策，又有人主張應採取「陸海空並重」政策——他說中國有一千二百萬方公里的土地，必須建設有龐大的陸軍，準備擊破敵人於國境之外，有二千八百餘海里的海岸線，亦須以列強海軍為標準，建設強有力的海軍，準備擊破敵艦隊於領海之外。空軍為最新銳的兵種，又為立體戰爭的主者，亦須建設「優良國防」，準備擊滅敵機隊於領空之外，自然，這個主張是我們國防建設的最高理想，但在現階段是否為我們的人力財力物力所能兼顧呢？實際上我們只得先其急，後其難，以陸軍為主；空軍為從，俟國海軍的建設。尤以現階段的對外抗戰，係大陸的戰爭，其爭勝負的戰場在陸地，其對峙而爭勝負的軍隊為陸軍，空軍只有盡其協同作戰及爭取制空權的任務，海軍更談不到有多大的活動。魯登道夫將軍說：「大陸國在國防方面之主力，實為陸軍，此為戰爭之根本」。實有見地。

其次，說到第二十五項：「作戰計劃」。孫子說：「多算勝（算為作戰計劃——落日語）少算不勝」。拿破崙說：「完備的計劃為戰爭勝利之母」。近代各國的作戰計劃通常由參謀本部制定，像有名的「史蒂芬計劃」，便是德國參謀總長史蒂芬主持參謀本部時所擬的對法作戰計劃，德國於上次歐戰未能攻下巴黎，打敗法國，是因小毛奇沒有徹底執行這個計劃的錯誤，這次希特勒的打敗法國，也是根據着「史蒂芬計劃」而變化運用，可見作戰計劃在國防上的重要性。道義所說的「作戰計劃」，雖然可解釋它包括着政治作戰，經濟作戰，文化作戰及軍事作戰等計劃

但我卻寧把它當作軍事的作戰計劃來說，即屬於陸軍作戰計劃，海軍作戰計劃，及陸海空軍聯合作戰計劃。我國今後對於假想敵國應先策定「先立於不敗之地」的作戰計劃才對。還有第三十四項：「舉行全國總動員之大演習計劃，與全國海陸空軍隊國防攻守戰術之大操演」。動員的原意，就是最初步的軍事行動，亦即最末一次的軍事準備，也可說是建軍（裝備）的準備完成與作戰（集中）的行動開始。於此足見動員最初的目的，是限於軍隊的裝備，但自昔法戰爭後，動員範圍已逐漸擴大，直至上次歐洲大戰，其範圍更加擴大，使有全國總動員之說。所謂全國總動員，即包括軍事動員與民事動員兩部，民事動員，日本稱為「國家總動員」，即除軍事外之全國動員。所謂全國總動員演習，係在平時將所編成的動員計劃加以實地演習，錯誤一處即予改正，並求熟則生巧，使到真正動員的時候，得以迅速確實。為時完成全國總動員的準備，以便戰時立刻實現全國的總動員。在此次抗戰中，我政府經已頒布國家總動員法及設置國家總動員會議的機構，在使全國成爲一個戰鬥體，爭取抗戰最後的勝利。這也可以說是「國家這個動員演習計劃的進一步實踐，但卻屬於政治方面的事情。我們陸海空軍缺乏國防攻守戰術之大操演，實爲國防上一大缺陷，今後應多行演習，以爲事前準備（擬定各種不同的方案與想定）。這樣，到了實戰的時候，早已成算在胸，自然可以應付裕如了。

以上各部門的國防計劃，國父原擬假以十年的長期間來完成其重要建設的，故大綱中定有

「完成十年國防重要建設計劃一覽表」的第四十六一項，不過以科學落後，國防基礎薄弱的我國，欲使其變為世界第一等強國，攻必取，守必固，則非十年所可奏效，於十年之後，仍須來無數個十年，正如德皇威廉第二所說：「國防是永遠做不完的怪物，改善和增進，亦同樣的無止境」。雖說威隊的國防是侵略的，但我們為自衛，亦須不斷地建設下去，因為世界各國的國防建設，有進無止，科學的進步，亦一日千里，倘若我們自甘落後，或中着「一勞永逸」之毒，則所建設的國防，必不足以適應將來戰爭的要求，無法逃避亡國滅種的命運。所以 國父在大綱的第五項中定有「擬定永遠國防政策」。在民族主義上說：「所謂國無敵國外患，是自己心理上覺得沒有外患，自以為很安全，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外人不致來侵犯，可以不必籌國防，所以一遇有外患，便至亡國」。這也是說國防是要作永遠的建設的。

此外尚定有第四項：「國防建設大綱」，是為確定國防建設的根據和程序，正朔建國必須編定「建國大綱」一樣，此項應列於上述各部門之前。第三十三項：「仿效各國最新國防建設計劃」，此為取長補短，但須經過消化，應歸併於上述四大部門之內。至關於國防建設的研究和設計的機構， 國父主張設置國防本部（見第三十二項）及召集各種國防會議（第二十五項及第五十項）。

總之，中國為世界的一環，中國不能離世界而關門自守，所以為建設中國的國防，或確立有

救的國防計劃，固然要「知己」，更要「知彼」，即要瞭解國際形勢，列強虛實，及其對我態度，謀我好計。所以大綱中定有第四十：「組織考察世界各國軍備建設國之意見書」，第五十七項：「注重國際軍備之狀態」，第七項：「太平洋國際政治問題與中國」，第六十項：「列強之遠東遠征海陸空軍與我國國防」，第四十三項：「我國與各國國防實力比較表」，第六十一項：「各國富強之研究」，及採取「歐戰以後之經驗」（第五十一項），這一項所謂「歐戰」，係指上次歐戰而言，今日我們要進而接受此次歐戰的經驗，及我們此次抗戰的經驗了。但光是根據今天戰爭的經驗而忽略了未來戰爭的遠景來建設國防，亦是無濟於事，看於此次歐戰，波蘭以上次歐戰的軍備，來抵抗德國此次的新軍備，法國拿破侖的馬奇諾要塞來抵抗希特勒極度活動性的大空軍機械化部隊，而各遭敗頓，自可得到深刻的認識了。

司馬法上說：「故國雖強，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這是昭示我們不可好戰，也不可鬆懈國防的建設。所以我們在戰時更要積極建設國防，就是在平時也一樣要積極建設國防。我們因為過去國防力量的薄弱，所以在這次抗戰之初，未能迎頭擊敗敵人，弄至「半壁河山，淪於夷狄」，尤以我們國家的環境強隣逼處，海疆遼闊，更要積極從事國防建設。從今日起，我們應確認「國防第一」，「國防至上」，根據「國父這個實質的遺教而又斟酌實際的需要來制定詳細的國防計劃，一致起而力行，務使中國成爲一個「全體性的國防國家」，實現三民主義的國防

目標。然而於此要注意的，爲建設「全體性的國防國家」，決非因循苟且可以作成，第一要任用專才，腐才、奴才決不能完成國防建設的任務。第二要選高歸公，如果上下貪賤雜弊，則軍事目標。第三要保守秘密，國防國防建設以秘密而生效，弱點不宜外揚，即是優點亦要隱蔽掩飾，否則一舉一動，一長一短，一成一敗，均爲敵知，那能危殆極了。

(註一) 國父曾自撰遺囑的遺書，其時間與地點，係國父於民十年在廣州桂芳堂講學之時。據最近何香凝女士自述我記：當時墨先生亦在廣州，他亦親自接聽信約寶貴原稿。

(註二) 見黃煥文譯：「大戰學理」(國防版)。本書所引克氏其他言論亦係錄自該譯本。惟文言語句者，係譯自日人馬込健之斯譯本：「戰爭論」。

四·軍政興革

卷

提起孫子兵法便令我們想到軍政的重要，始計篇說：「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還是把軍政列爲勝敗攸關的五事之一。提起漢代三傑，也令我們想到軍政的重要。漢高祖起自亭長，遷匪中聚，戰勝強敵，取得天下，不待說，他最得力于三傑，即張良擔任遊說，韓信指揮作戰，蕭何整理軍政——「補兵饋餉，軍得不隕」。結果論功行賞，何居第一。

軍政是軍事行政之語，現在的內容，較諸過去的實在複雜得多，它包括有：（一）軍營區之劃定，（二）各種勤務令之頒佈，（三）軍隊之編制，（四）關於兵役諸法律，（五）軍事之預算決算，（六）徵兵法，（七）補充，（八）教育，（九）給養，（十）軍需之供給保存，（十一）其他關於理財事項。現代戰爭，對於軍政的要求，全在平時準備充分，且軍政上有許多事項常須很長時間的準備才能完成。所以平時如果沒有充分的準備，即未能使平時與戰時一致。到了戰時，就會叫忙手亂，無從應付。像英法美諸國在這次大戰中，就是因平時對於兵員補給、大砲、坦克、兵艦等準備不充分，致在開戰之初，什麼都感覺不夠用，使吃大虧。德國海軍將軍說：

「一國經常的備戰，特別是後備兵的訓練，以及馬上可以應用的軍用品，在戰爭初發的戰役中，有着決定的重要性，戰爭繼續下去又要擴充生產」。這是辦理軍政的三原則。

段父子推測瀟湘之後，認為目前軍政亟待整理，又信于將來對外戰爭的需要，在國民宣言（民國元年八月十三日發表）上，極力主張整理軍政說：「今日處於武裝和平世界，對外方面，軍備應須擴張，然擴張軍備，當自整理軍備始。擴張軍備之舉，須待諸三四年後，而今日入手方法，則在整理軍政，軍政整理，而後始有擴張可言也」。關於整理軍政的政策，國父探着屬屬至極。

「一日劃分軍區：於行政區域之外，則劃分全國為數大軍區，獨立處理軍事，使軍民分治，易于實行。

「一日統一軍備：今各省軍備之組織，亦至不一，紛歧錯亂，非軍事所宜，故當使全國之軍隊，按一定之組織，俾軍事歸於統一。

「一日裁汰冗兵：軍事雖應擴張，而冗兵則不可不裁。蓋兵備貴精，其精饒不勤，老弱無用者，理宜一律裁汰也。冗兵既裁，然後於強壯者訓練純熟，使之成軍，始可以擴張其備。

「一日興軍事教育：欲擴張軍備，則當求良好之將校。吾國今日之將校人才，異常缺乏，故

此數年中，亟宜振興軍事教育，以養成一般將校人才。

「一曰擴充兵工廠：吾國今日軍備上最大之缺點，則爲軍械不足，兵工廠祇有數所，而製出品，爲數亦微；今日即欲擴張軍備，然無器械，與徒手無異，故宜極力擴充兵工廠，並使器械豐富。此後者皆爲本黨擴充軍備之計劃。」

以上五大政策，我且作如下的簡單研究：

一、劃分

軍區：

現在世界各國，於行政區域之外，另有軍事區域的劃分，而此種軍事區域的劃分，係按兵要地理、行政範圍、居民密度及民性歷史而決定。在平時成爲一種軍事行政教育與準備的戰略單位，到戰時各有其主要的國防任務，各有其作戰的方向，各自成爲整個國防機構的一部份。民國以來，我國主張設立軍區者，大不乏人，兵學家百里先生在「我兵與國防」一文上主張：「全國設立百二十個軍區，爲國防之據點。每區以步兵千二百人爲基幹，而酌酌地勢附以特種兵。其在黃河流域以內，至少須設置七個以上（其餘之特種兵，得另集爲集團教育，如騎兵砲兵及其他技術諸部之類），此軍區之司令，以軍事長爲之，爲地方軍事之最高長官」。又有人主張劃分全國爲十大軍區：一曰東三省軍區，二曰直魯軍區，三曰江浙皖軍區，四曰閩贛軍區，五曰兩廣軍區，六曰西南軍區，七曰川康軍區，八曰內蒙軍區，九曰陝甘軍區，十曰中央軍區（即以漢口爲中心，將河南、湖北、湖南

三省劃為整個的一個軍區)。而提出設立軍區最早的，要算我們 國父。 國父的主張與他們不同，係主張劃分全國為數大軍區，（按現在美國全國劃分為三個軍區，英國本國劃分為六個軍區，四個特別區，德國分為十二個軍區），其區域的劃分，雖尚未明白規定，但作用則在獨立處理軍事，實行軍民分治。這個主張，曾因 國父當時以在野之身，致未實施。洎乎七七事變以後，我政府為適應抗戰的需要，才依各省行政區域，設立各省軍管區，於軍管區之下，設師管區，團管區，專司徵集和訓練等事項，現在雖未盡為 國父所主張的「軍區」，我想必會實現于將來。

二、統

軍制：

國父在這裏所說的軍制，僅限于軍隊的編制，如軍、師、旅、團、營、連、排、班、伍等。軍隊有了一定的編制，就可以將一切兵員組織起來，部勒起來，造成有組織的武力。正如孫子說：「治衆如治寡，分數（編制——浴日註）是也」。編制有平時編制戰時編制之分，前者為後者的基礎，後者依前者而產生。編為本，戰為末，本不善，則不能戰，求其能戰，則必先善其制，欲善其制，尤必先統一其制，以便教育統率及指揮。^(參) 國父日鑒當時各省軍隊編制的紛歧錯亂，便提出「統一編制」的主張，直至此次神聖抗戰以後，才告實現。雖說徐乎其後，但亦足告慰 國父在天之靈了。

其次 國父於民十三致蔣介石先生的信說：「今日開始練兵，猶不能行我所謂編，者謂練成

之機，兵士官遂遂成了習慣而後，再行改制則難矣。此爲我所定之制，則欲練成之後，專思虛妄
方寸之運用也。倘開練之時，已不能行我之制，則練成之後，我亦無心用之矣。今爲應我所用之
故，特將五師將軍將我衛士練至一營，以爲他軍之模範。兄謂我編制規模太大，若果因此何不練
至一營或一團爲單位，以一營等一團，以一團等一旅，有何不可？我想人家不欲行我之制者，則
全爲故習所困也。本其日本士官保定軍官之一知半解，而全不知世界大勢，不知未來之戰陣爲何
物，而以其師承爲一成不易也。因此之故，我更要今日之軍人捨去其故習，而服從我之制度，斯
形來乃能服從我之命令，聽從我指揮也。如果今日欲學生則存一成見，養成之後，何能使之爲革
命軍，負革命之任務？試觀北洋之軍隊，訓練非不精，補充非不備，而作戰則遠不如敗殘之楊化
昭、戚致平，以彼二人曾與南方稍有革命行動之軍隊接觸，有無形中學得一二革命之戰術也。此
固今日所訓練之軍隊，如果將來能聽我指揮，則我必導之去以一攻十或以一攻百也。此等任務，
更非尋常兵法所有，倘今日開練之時，不行我制，待至練成時，謂能聽我指揮，我決不信也！
註一。國公這個改革編制的主張，例如一個步兵師，共有兵數三八、九九二名，官數一、一
六二員，其人員之多，戰鬥力之強，實爲一種大單位的編制。今後我國軍隊的編制，固要充實其
人員，尤要加強其火力，改善其裝備，務使一連一排有一連一排的戰鬥力，一團一營有一團一營
的戰鬥力才可。但是軍隊的編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進化的，即依於兵器的進步，戰術的革

新，和信想國家的利益而犧牲他。所以我們對於軍隊的組織就不可在若一種保守的心理，及敵對的對立的地位。

三、徵兵

元兵：

元兵之採用之兵，亦即普通兵、老弱無能之士兵，這種士兵，固不能完成任務；且處於警備之局，亟應一律裁汰，使悉歸農或為工，以節省國帑，並使「人盡其用」。國父自嘗嘗時各省軍隊多為「強弱參差，良莠並蓄」，何提出「裁汰元兵」的主張，實是對症施藥。於此亦可見 國父主張採取精兵主義，因為元兵裁汰之後，所剩下的強壯者，加以嚴格訓練，就可成為精兵。所以 國父後來發表「國防計劃」一書的綱目中，就列有「實施全國精兵政策」一項。其次為主張實行徵兵制度，因為徵兵本避免元兵的發生，惟有採取徵兵制度，所以他在民權便主張「實行徵兵制度」（見同盟會公開時代總章）。在此之後，又主張「將現陸勇兵制度，須改為徵兵制度」（國民黨總綱）。這是說國家在戰爭的急難中，應與人民相依為命，人民享受國家的權利，亦應盡其對於國家的義務，而且亦應有採取徵兵制度，才能實現「全國皆兵」，消滅現代長期戰爭所要求大量的兵員。現在列強如德、法、意、日等國，均行徵兵制度，又如英美兩國平時雖行志願兵制，一到戰時都改為徵兵制。在這種制度之下，所徵得之兵，均為平素無事，自然沒有元兵的现象。我國在此次抗戰中雖已遵照 國父的主張，實施徵兵制，用徵得無事的兵士，徵得徵兵仍得繼續改善，以杜絕元兵的發

要麼。

於此，我輩所說的，就是關於訓練問題。即論士兵於訓練問題之後，或有訓練的軍隊，應當怎樣訓練他們呢？總長答曰：「軍隊之來，固矣。曰：訓練一事，爲今日根本之圖」。又說道：「新到之武器，皆以訓練一支決死之軍爲第一」（均見 國父給蔣介石將軍的信）。再說道：「創始革命軍，來救中國的危亡」（見黃埔軍校開學訓詞），但現爲訓練兵馬之事，每個士兵都要訓練（戰日教練重於制式教練，請看教練書及戰鬥教練）他們有充當班長，以至充當排長的能力，他們有了較高一點的能力，才會做出更好一點的作。並且要訓練他們有各個獨立作戰的精神，因爲現代武器的進步，在戰場上不能單靠全體而進的士兵，就是一排排長也照顧不了一排士兵，故對他們的訓練固更嚴密，亦須能以相當長時間。國父說道：「當兵的人，必要受過了許多的訓練，然後才能起用，到了陣陣的時候，這有計及危死利害，違反他職守的。最近來文明國的士兵，雖有死受訓練，不計利害的，但其他們的天性純厚，還是不及軍隊。至於中國的士兵，更是比不上。當國語說：『你總不有打，好子不當兵』，要他們做好士兵，必須經過許久的訓練，才勉強有用，如果說虛心一層，和實事比較，更是差得遠。當國語有天牛合體的性質，一羣之中，各司其事，不必加以訓練，是自然而然的。人亦祇有多少天牛合體的性質，但須加訓練，然後合體的性質才有進步，進步到極點，還是不及蜜蜂，蜜蜂實行天賦的責任，勇往直前，毫無顧慮，人每

每因後天的訓練，沒有爛熟，容易喪失先天的特性」(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尤以現代軍隊的高度機械化和摩托化，大大地提高了士兵的技術水準，要使士兵的技術達到合乎要求的熟練程度，亦非經過長時間的訓練不可。

四、興軍

事教育

將校為軍隊的柱石，將校之良否，繫乎戰爭的勝敗至鉅。孫子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即說將校須具備有此五種精神，方合乎標準。古人說：「天下強兵在將，有不可戰之將，無不可戰之兵」。有可勝不可敗之將，無必勝必不勝之兵」。歐羅巴亦有一句名言：「牡羊之牽獅子裘，劣于獅子之牽牡羊裘」，惟欲養成良好的將校，首在興軍軍事教育。

中國的新軍事教育肇于清末，初仿德國，繼學日本，然東海放聲，所派成的將校，實因鮮合乎標準，量亦寥寥無幾，自然未足以適應現代建軍作戰的要求。這是 國父主張振興軍事教育的動機，也可以說是 國父後來創辦黃埔軍校的原因。自黃埔軍校創辦之後，我國軍事教育便以嶄新的姿態出現，日臻發展，惟仍待改進，以達理想的要求。原來教育為作戰的準備，作戰為教育的實踐。今後應如何使教育適應作戰，即如何把講堂、操場和戰場打成一片，以養成優良的將校，實為重大的問題。記得馮熙元帥「研究兵術之方法與態度」一文，評論德國過去的軍事教育說：「普魯士之軍事教育，即能完全超越此兩方面(即由科學的概念到藝術，由機械原理到實行

「軍服」(註)之遠距離者。例如一八六六年普魯士之普魯的指揮官，雖曾初出學校，而處理戰後諸事件，極爲恰當而有生氣，其所作爲，皆當時一般人心目中祇有戰場將帥始能勝任者也」

• 這是說「軍服教育」的效果。普魯士將軍索特說：「欲使將校具有應用理論知識之能力，須教學校以身體力行爲可。若對學員增加涉獵，以爲將來依據推理即可求得真理，當然無對不可，即使對於科學與社會研究，猶不可謂爲已有應用知識而卜決心之能力。科學的觀念與結構，二詞之間，相距甚遠。教育如要做到實踐二字，非使學生經過這道障礙不可。故教育必須注重力行」

• 可是今後中國軍事教育，固應注意「實踐教育」，尤宜注意「精神教育」，這樣才能養成良好而標準的將校。

五、補充
兵工廠

意將尼爾密可氏說：「可以很肯定的說，無論那一個國家，如其在和平時期不注意和不準備現代戰爭所需的各種兵器，戰爭一經爆發之後，祇有受敵人的宰割，因爲這個時候，再無法維持自己的兵力了」，此可見補充兵工廠的眞實性。

德國於上次歐戰失敗之後，因受凡爾賽條約的限制，爲補充軍備計，乃用另一種方法以生產兵器。見於「世界第二次大戰的裝備問題」一書說：「大戰以前德國的工業家，在荷蘭、瑞士、瑞典、和其他國家建立了許多工廠，專門製造凡爾賽約所禁止的兵器。大多數工廠集中在靠近德國的荷蘭邊境，據英國報所載，德、荷交界的地方至少有十間最大的公司受德國的

津貼，聘有德國的工程師，各有自己的廠，專門製造大口徑的炮、炮彈、裝甲軍艦。如在鹿特丹註冊的造船廠實際是製造大炮。機器製造公司專造一切軍需品，名義上製造瓦斯表的工廠實際上專製手槍、機關槍的零件，水雷管和軍艦上的設備。德國用各種工業方法在邊境集中了大批軍火，以及軍隊中技術上的設備，戰爭一旦爆發，可以即時運往德國。這些工廠實際是德國國內工廠的分工廠，工作人員也是德國的工程師，並且直接受德國各工廠的指揮」。至于沒有受到條件限制的國家，更應建立兵工廠策，多設兵工廠，準備將來戰爭上所需要的新兵器了。

兵工廠爲陸軍兵工廠的簡稱，即製造陸軍所用軍械的場所。在歐美多爲私家企業，並受政府的保護和獎勵及監督。像德國的克虜伯砲廠和毛瑟槍廠是。惟我國向爲政府所經營，迄今仍未發達可觀。國父于推翻滿清之後，目擊全國僅有數所兵工廠，分設于金陵、漢陽、廣州、濟南等處，規模既少，出品亦不多，更談不上合乎標準，且所能製造者僅爲普通兵器，不能適應現代建軍的需要，大部卻要仰給於海外，這在平時已是莫大的漏卮，尤其到戰時，以我海軍力量的薄弱，沿海常有被敵封鎖的危險，故發此擴充兵工廠的主張。後來于擬著「國防計劃」一書的綱目中，又定有「擴張漢陽兵工廠，如德國克虜伯砲廠之計劃」，及其他關於兵器的改良和製造等計劃，以爲發展兵工業之資，真是忠于護國！然在今日，談到關於我國兵工廠的訂立，對於經費的撥注，原料的取給，技工的訓練，技師的聘請，固要通盤籌劃，至對於工廠的位置，更宜妥爲

選擇。在此次抗戰中，我們所設在沿海沿江一帶的兵工廠盡作犧牲品了，這個嚴酷的教訓，使我們體認今後對於兵工廠的位置，應選擇內地的安全地帶，各處所有重要部份的建築，尤宜設於防空的山洞，以避免空襲的損失。並宜採取分散主義，以適應出品的環境。又宜注意交通的設備，以便原料的運進，及出品的輸送。

以上是「國父」擴充軍備的計劃」。亦是整軍建軍的基本計劃。記得「國父」說過：「現共和粗建，須以兵力為保障，昔南非洲有某某共和國，以無兵力，卒至被人吞併，可見共和國家，無兵力亦不足以救亡」（見共和須以兵力為保障演講詞）。又說過：「國事未定，則吾人須有不可悔之實力，實言之，即是武力，如何創有組織或駕駛原有之師旅，皆須以敢死得力之同志為本位，然後堅固不搖，戰勝一切」（致鄧澤如同志書）。再說過：「世界中的進化力，不止一種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為力混合而成，人為的力量，可以巧奪天工，所謂人事勝天，這種人為的力最大有兩種：一種是政治力（包括兵力——浴日註），一種是經濟力，這兩類力關係於民族興亡，比較天然力還要大」（民族主義）。于此可見建軍的重要，建國必先建軍，惟今後所建設的軍力，則不能為封建軍閥所利用，以與帝國主義結合來作威作福，禍國殃民，一定要使其成為全體國民的武力，國家的武力，為完成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而存在而奮鬥，正如北伐宣言上說：「今日之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使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之現象永絕於國內，其代之而興之現

象：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國民革命必于此時乃能告厥成功」。至於今後建軍的方針，自要進而從事於現代化軍備的建設，即以建設機械化部隊與強大的空軍為中心，並加緊化學戰備（國父遺毒為「毒藥」——見民族主義）。至於擴充海軍，亦不可忽略。因我國過去的海軍建設，實乏功程，尤其自經此次抗戰損失之後，一切均須從頭做起，雖說建設海軍比陸空軍困難，一來時間要長，二來需費特大，好比一艘主力艦，在戰前的物價約需銀幣一萬萬元，一艘重巡洋艦約需三千萬元，一艘潛水艇約需二百萬元，一個軍港的建築費起碼要數千萬元，以至數萬萬元，海軍下級軍官的養成，總要經過八年的訓練。但我們決不能因此而置之不顧，我們應認清中國是一個海洋國家，若無設備全球性的國家，我們為鞏固海權，爭取海防的安全，及保護華僑的安全，我們將來仍得分期來建設我們強大的海軍。國父於民國四月辭職時大演說後，漫遊各省，途經福建，備受各界歡迎致詞說：「此次到馬江船政局，荷局長沈君若南盛禮歡迎，邀觀製造輪機機器鑄造廠十餘所，乃知從前船政締造之艱，經營之善，成績不少，足為海軍根基。惜乎甲申、甲午兩次挫敗，兵船燬失殆盡，而滿清政府既不能整頓於前，復不能補救於後，一蹶不振，日趨腐敗。今幸民國光復，此任屬之沈君，沈君在歐美學習製造有年，辦理必能稱職。且當時此局係沈君令祖文瀾所創設，從此沈君繩其祖武，勉力而行，興船政以擴海軍，使民國海軍與列強齊驅並駕，在世界稱為一等強國」。固然我們海軍建設的最高目標

是「與列強齊驅並駕」，或所謂「二強主義」。但就我國戰後的人力、財力、物力諸方面而言，在步驟上，我們第一期只得從驅逐艦與潛水艇的建設入手，我們有了強大的驅逐艦（用以對付敵的潛水艇），與潛水艇的力量，並配以優勢空軍，活躍於渤海、黃海、東海、南海之間，便可以擊破境從海上進攻之敵，使其望而生畏。

此外 國父在中國國民黨政綱上（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公佈）規定有：「注意改善下級軍官及士兵之經濟狀況……施行軍隊中之農業教育，及職業教育，嚴定軍官之資格，改革任免軍官之方法」，這也是屬於軍政興革要項，亟待分別實施。又 國父於民十一年自辦軍閥各據一方，擁兵作亂，認爲欲謀中國的和平統一，必須先行裁兵，而安插被裁之兵的政策，便是化兵爲工。曾在上海發表兵工計劃宣言說：「軍興以來，兵額較前增至倍蓰，此等兵士，來自民間，爲不法武力所驅使，非其本意，一旦淘汰，使之驟失所業，亦所未安。宜以次悉改爲工兵，統一編制，一切如舊，收其武器與其工具，每日工作，約六小時至八小時，先修治道路，次及其他工事。工兵月餉，較現時倍加，將弁月餉百元以上者加之，其百元以下者加倍。此外則其工作所生產之純利，以一半歸於國家，以一半歸於工兵，論人數均分，自無差等。如此則一轉移間，易戰事爲工事，兵不失業，無挺而走險之虞，工作日繁，有生產發達之象。然後善收外資，投之實業，以起積年之疲弊，謀社會之繁榮，轉危爲安，悉繫于諸」。并先後發表有「實行裁兵宣言」，及「裁

其之重要處置與方法」，「和平統一化兵爲工」等演說詞，作積極而普遍的主張，雖然這個主張，以當時軍閥的勾心鬥角，各懷鬼胎，未能實行。但是 國父這個政策，實爲解決戰後復員問題的上策，使被裁的官兵不致流離失業，或逃而走險。上次歐戰後，歐美各國就是先驅的實行者，國父說：「這次歐美聯軍一共有幾千萬的兵，不到一二年之後。大半可以裁去的道理，便是用這個安插的方法。本大總統這次國粵化兵爲工，便是利用歐戰各國裁兵的方法」（見和平統一化兵爲工演說詞）。在我國此次抗戰，以兵員數較之多，將來戰爭結束之時，勢必復員，實行縮編，以節省公帑，惟被裁之兵員，除一部份許其「解甲歸田」外，其餘大多數均須採取 國父這個「化兵爲工」政策，使其參加國防建設——或築路，或開墾，或開墾。

（註一）：國父革命軍步兵編製（其餘砲兵重兵（代騎）工兵機要軍，機關槍，甲砲車未定。至於人數定實，官數可酌量再加。）

六八	爲一伍	兵數	六	官	〇
六伍	爲一列	全	三六	全	一
三列	爲一連	全	一〇八	全	四
六連	爲一營	全	六四四	全（附二人）	二一

軍政改革

六營	偽二團	全	三、八八八	全(附二八)	一、二九
三團	偽一旅	全	一一、六六四	全	三八八
三旅	偽一師	全	三八、九九一	全	一、一六二

五·決勝精神力

孫武子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又說：「殺敵者，怒也」。再說：「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拿破崙說：「戰爭成功四分之三，依于精神要素，而依于物質之情況決定者，不過其四分之一」。

克勞塞維茲氏說：「精神力爲軍事最重要因素之一，戰爭全部因素無不受精神力所貫注，而爲其操縱」。

哥爾茲將軍說：「殲滅敵人之戰鬥員，其價值較消滅敵之勇氣爲小，失敗主義者若充斥於敵之全軍，則勝利，即在吾人之眼前矣」。又說：「征服敵人，並不求悉數殲滅之，而求粉碎敵軍各個對於勝利之希望」。

福煦元帥說：「我欲爲勝者，必須保持擊勝敵軍之精神力，指揮官必須將此精神力貫注于自己之軍隊，故指揮官戰者，乃粉碎敵之精神力，以至於最高度之謂也」。又說：「必勝之意志，乃

勝利之第一條件，兵卒應以此為第一要義，同時指揮官亦必須以最高之決心，貫注于每一個兵卒之精神中」。

從以上諸名將的發言者，我們可歸結說：精神重於物質。軍人不明乎此，固不配參加戰爭，更不配參加革命戰爭，這是兵學上「永久不變」的原則，任何人都不能推翻的。

國父是中國現代革命戰爭的指揮者，自然不會忽略了這個重大的原則。當民國十年取道廣西北伐，師次桂林時，為振作全軍的戰鬥情緒，強化全軍的精神力量，於翌年一月集合當時所統率的滇、粵、贛各軍總校給予剴切詳明地演講：「軍人精神教育」，這一部演講詞，為國父重要的寶貴的遺教，在世界兵學上實具有不朽的價值，另成一新體系。精神教育，既包括一般的哲學思想與倫理思想，不特可作為革命軍人的基本教科書，且可作為一般國民身心修養的座右銘。

一、精神 重於物 質：

蔣百里先生說：「在軍事教育上本來有兩種方法：一種叫做「外打進」。一種叫做「裏向外」。「外打進」的方法，就是從外表儀態的整齊嚴肅，行動必須規矩矩矩（孔子教顏淵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為求仁之目的），以浸潤之，使心志和同，養成紀律。至於「裏向外」的方法，這是拿破崙所發明，教育方法是啓發其愛國心，自尊心，使人人樂於為國犧牲，但外表則不甚講求，故君子不妨歪戴

，軍禮不必整齊，然而實際作戰，便能得到非常的成績，當法國在大革命時，人民不替自己對於檢會不肖的故，但是一聽到「祖國危險了」的口號，成千成萬的人便自動的拿起槍桿上陣與敵人作戰。法國有一張圖畫。是紀念革命時代人民愛國的心理，其圖為一家庭，有漂亮的太太，有頑皮整潔的小孩，同男人正在一桌吃飯，忽然門口飛進一張紙條，紙上寫了「祖國危險了」幾個字，於是男人就放下飯碗牽門而出，踴躍赴戰場應敵，那時法國四面都是敵人，而且敵人的軍隊都經過長期的訓練，諸武器亦較普通國民其優良得多。但是法國國民在作戰的精神，卻何勇敢非凡，所以在拿破崙未出世之前，法國一個國家，已經可以抵抗全歐洲的敵軍（詳一）。考 國父研究拿破崙兵術，是有心得，那麼他的指導軍人精神教育，也許受其「精神」的教育方法的影響。原來精神與物質是不可分的，是互相影響的，倘若比較，精神是活的，是可變的，物質（武器裝備）是死的，是不可變的，換言之，精神力是無窮的，不是用數字所得而計算，物質力量是有限的，卻可以用數字正確的計算出來，而且創造物質是人的精神，使用後發射物質也是人的精神，故在戰爭上精神比物質為重，也就是說說明精神教育比物質教育為重，固然一團軍隊其精神力與物質力兩者優劣為上，但德國以物質條件最優良的國家，其野戰命令尚有這樣的指示：「無論物質技術如何優劣，而人的精神力，仍為決戰的要素」。至於物質缺乏的國家，其軍隊更應注重精神，以補物質的不足，自不待說。 國父致力國民革命，他一面統率劣勢裝備的軍隊，以與優勢

軍械的敵人專門，另一面又看到將來對外的抗戰，因為國內產業的落後，勢必同樣以劣勢裝備的軍隊，與優勢裝備的敵人作戰，乃特別注重於軍人精神教育的倡導，誰是看穿戰爭決勝的機微。國父這部遺教，洋洋萬餘言，分爲五輯，第一輯談精神教育，於第一節精神教育之要旨上，開宗明義說：「欲身在非常之事業，則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此非常之教育爲何？即軍人之革命精神教育也。……於革命精神何自來耶？是在精神教育，語君之所以爲軍人，非爲有軍人資格乎？非爲受軍人教育乎？否則鐵路人面目之曰軍人軍人，如何其可！今茲所述之精神教育，即欲諸君灌輸此精神於腦中，須臾莫離，雖至滔天覆海之間，守而勿失，夫然後可以爲軍人，可以言革命，可以卜成功」。第二節精神之定義上說：「人爲萬物之靈……凡非物質者，卽爲精神。……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爲兩物分懸，而不知二者本合爲一。在中國學者，亦恆言有錢有用，何謂錢，卽物質，何謂用，卽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爲錢，屬於物質。其能言動聽作者，卽爲用，由人之精神爲之，二者相輔，不可分離。若游魂喪失精神，官骸雖具，不能言聽，不能動作，用既失，而體亦卽成死物矣」。而在第三節精神與物質力款之比較上，舉例聲明精神力爲感勝之本說：

「精神與物質相輔爲用，既如前述，故車無物質亦不能表現精神，但專恃物質實則不可也。今人心理往往偏重物質方面，若言北伐，非曰槍枝務求一律，且曰子彈必須補充。此

外種種武器，亦宜精良完備，一若不如是，則不能作戰者。自予觀之，武器爲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何以知其然也？試以武昌起義爲例，當日滿清之武器，與革命黨人之武器，以物質能力論，何啻千與一之比較？革命黨人猶不慮以卵敵石，乃敢毅然爲之者，因其時漢口革命機關業已破露，黨人名冊亦被搜獲，兵士之入黨者，均爲查悉，悉數調往四川，僅有砲兵、工兵兩營，留駐武漢，其中同志尙多，有熊秉坤者，新軍中一排長耳，見事機已迫，正在大索黨人，若我不先發制人，終必爲人所制，置於死地而後生，等死耳，不如速發難，因將此意告諸同志，僉以無子彈對。後熊秉坤向其友之已退伍者，借得兩盒子彈，分授同志，革命之武器，所恃者，僅有此數，槍聲一起，砲兵營首先響應，瑞澂、張彪、相繼逃竄，武昌遂入革命黨人之手。彼滿清方面，軍隊非不多也，槍彈非不備也，當革命風聲傳播之時，瑞澂且商諸某國領事，謂若湖北有事，請其撥兵艦相助，布置如此周密，兵力如此雄厚，乃被革命黨人以兩盒子彈打破之。諸君試思，兩盒子彈，至多不過五十顆，即使一命一中，殺人不過五十人，能打破武昌乎？余以爲打破武昌者，革命黨人之精神爲之。兵法云：「先聲奪人」，所謂先聲，即精神也。準是以觀之，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可於武昌一役決之。此第就本國而言，已有此先例。試再言外國：前此意大利人，有加利波利地

「昔，萬一有名之革命家，彼亦非有如何武器能力，當其濠海攻城也，以一千人與三萬敵人，相持四五月，卒由他路抄襲入城。此在戰略上，戰術上，無論如何，均不能取勝，而事實之相懸若此，將謂以少勝衆乎？直乃精神勝於物質耳。又如日俄戰爭，俄國兵力，多於日本數倍，未戰之先，咸以爲日本之對俄國，不啻羶羊豕豕以犒虎吻，必無倖免也。何以戰爭結果，卒至俄敗而日勝？此無他，俄之敗，敗於無精神，日之勝，勝在有精神而已。諸君不觀夫牛與童子乎？牛之力量大於童子，人皆知之，而童子能以一繩引牛，東則東，西則西，牛乃不能奮其一角一蹄，以與童子抗，且甘心俯首。何是聽者，是因何耶？童子有精神，牛無精神，故童子之力量雖不如牛，而能以精神制馭之，此猶顯而易見之例也。

「依上述各例，則知此次北伐，亦僅恃有精神，即能制勝，可勿問敵人手彈多少，我之子彈多少，相問我之精神如何。若無精神，子彈雖多，適以資敵，一旦臨戰，委而棄之，非爲敵人送財賦利品乎？故兩國交戰，能撲滅敵國之戰鬥力者，即在撲滅敵人之精神，而使失去其戰鬥能力。兵法有言：『攻心爲上，攻策次之』。攻心者，務先打破敵人之精神，取得城池，猶其後也。去年粵軍圍粵，既下惠州，桂軍颯風破靡，先自退避，我乃兵不血刃，長歌而入廣州城矣，此是見物質之不可恃。所謂『國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者，其道何在？精神爲之也。」

雖然精神重於物質，但在今日的長期戰中，對於物質也有同時改善的必要。因為物質的長期不足，必使精神上大受打擊，試看今日前線的情形，自可瞭然。所以我們於強調精神之外，還要力求物質的改善，不待說，這是維持精神，振作精神的或實際的方法。最近英國二十五位科學工作者合著「戰爭與科學」一書，曾有下列的說明，可供參考，該書說：「一般說來，有兩個條件是與士氣振作有關的：一個是士兵的物質條件，如食物、營房和軍需供給必須好，否則溺職的事是難免的。第二是士兵自己必須明白他是爲什麼而戰，同時要他相信戰爭的方向是對的（這一點在抗戰的我國，不成問題——浴日註）。前一個條件是基本的，短時期缺乏食糧、休息或彈藥，確可用心理上的因素來對消，但不能維持長久，飢餓疲乏的兵，絕不是以逸待勞的兵的對手，在這一點上說來，士氣的問題變成了給養和組織的問題了。現存民氣也和士氣一樣重要，而食糧對於兩者都是基本的東西。」

二、軍人的精神

其次，第五節軍人之精神話：「現時之中國，前途險象，較前尤甚。南北分立之局，擾攘數年，未能統一。北方內部且復各樹私幟，如張作霖、曹錕、吳佩孚等，割據地盤，擁兵自衛。政治之壞，過於滿清，人民轉徙流離，如在水深火熱之中，待援孔亟。援之之法維何？須用革命之手段。用革命之手段，則須負革命之責任。革命之責任者，救國救民之責任也。……諸君固皆受軍事教育者，當知軍人之職志

，在附屬外患，在保衛國家，今先問中華民國是否爲完全獨立之國家，不受外國之箝制？以予觀之，固猶未完全獨立也。國會雖選出本總統，而內亂尙未戡定，各省之在北方勢力範圍者，尙居多數。北方已喪失對外之資格，而正式政權，又未經各國承認，當此危亡絕續之交，非先平內亂，而以革命救國不可，以革命救國，非有革命精神不可，無革命精神，則爲法屬之安南。終受勢力屈服。有革命精神，則爲英屬之愛爾蘭，終得強起自治。此外再徵諸印度及高麗，益知革命精神之必要，印國久受英國壓迫，近亦引起反動，其革命思想與前不同。跟着又畫龍點眼地指出軍人精神的要素有三：——一曰智，二曰仁，三曰勇。前「欲使之發揚光大，非有決心不能實現。但所謂決心者，須多數人決心，合羣策羣力而爲之，非少數人所能濟事」，用能剷除反革命勢力，改造中國爲「新世界」。不待說，這是全書的骨髓。茲將第二課分析智，第三課所分析仁第四課分析勇，第五課分析決心，摘要列表如下：

定義——有聰明，有見識，又須合乎正義，並隨時進步。

智

來源

由於天生者——與「生而知之」略同。

由於力學者——與「學而知之」略同。

由於經驗者——與「困而知之」略同。

軍人之智

別是非

軍人所以衛民，利於民則為是，不利於民則為非。軍人所以衛國，利於國則為是，不利於國則為非。

明利害——利害與是非相因而至

是則為利，利可為，非則為害，害不可為。

識時務

如猶已熟之果，既至其時，應手而落。如由高山推石，乘勢便利，毫不費力。

知己彼——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仁

定義——博愛——公愛——己飢己溺。

種類

救世之仁——宗教家之仁。

救人之仁——慈善家之仁。

救國之仁——愛國志士之仁。

軍人之仁——實行三民主義，救國救民。

心決

成功——成功則造出莊嚴華麗國家，共享幸福。

成仁——不或功，則同拚一死，以殉吾黨，而為親身成仁之志，士光輝主。

皆為驚天動地之革命事業。

勇

定義——不怕。但軍人之勇，須為有主義，有目的而有膽之勇。

種類

莽猛之勇。

小勇

血氣之勇。

無知之勇。

大勇——成仁取義。

軍人之勇

長技能——膽爛熟游勇戰術

命。中。隱。伏。耐。勞。走。路。吃。路。

明生死

其生也為革命而生。

其死也為革命而死，但軍人不宜畏死，為國家效死，死重於泰山。

我們從以上的表解，已可明瞭智、仁、勇及決心的主要內容，現我可進而研究智、仁、勇及決心的淵源問題，關於國父所說的智、仁、勇，有人說是淵源於兵聖孫子，始計焉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也有人說：淵源於哲人孔子，中庸說：「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考孫子兵法爲軍事哲學的書，中庸爲政治哲學的書，如果說它純粹地淵源於孫子，卻缺了「信」「嚴」兩項，說它直接地淵源於孔子，卻又用在軍事上。其實，國父對這兩部名著都有研究的，故較不如說他是參證他們兩家的學說而立論。此外國父又參照新兵學加上「決心」一項，建立他軍人精神教育理論的新體系，且其內容又是全新的，不同於孫孔及其他兵書上的解釋，這是他的獨創，——站在革命戰爭的立場上獨創的。

智、仁、勇是中國軍人的靈魂，亦即中國軍人的武德，它以仁爲中心，故可使智勇不致陷入歧途。所以缺乏仁之武德的軍人，決不是完全的軍人，如果他擁兵的話，必變爲軍閥，戰爭的話，不是爲爭權奪利，便是爲侵略征服。這都是國父所極端反對的，所以我們中國軍人的武德，不是日本的武士道（軍人精神）所以可擬。因爲日本的武士道僅偏重於智勇，丟了最重要的仁，故日本的軍隊只變變成「海陸」，「流氓」。拿破崙亦談智勇不談仁，他說：「爲大將應具之種種理想的才能，極難具備於一人。實際上爲大將最需者同時最能揚名者，即智勇健全。若有勇而無智，則往往不戰而生意外。若有智而無勇，則愈趨之事，愈往不能作」。所以他在歐洲極

其量亦只盡其臨陣的能事而已。舉世譽爲兵學大師的克勞塞維慈氏，他對於智勇分析得頗爲深入，值得錄出，以供參考，他說：

「戰爭是危險事業，軍人最重要的性質是勇。」

「勇有二：一是對於危險的勇，一是對責任的勇。所謂責任，或指對人而言，或指對自己的良心而言，現在先論第一種對於危險的勇。」

「這種勇又有二：有永久的勇，有一時的勇。永久的勇是不怕危險，這或出於稟賦，或成於習慣，成因自輕其生命而然。要之都屬於恆態的，永久的。一時的勇，則由積極的動因而生，若名譽心，愛國心，或其他種種感奮所激發。這種勇，要不外乎精神迷動，是屬於情之領域，所以是一時的，而非恆態的。」

「這兩種勇的效果不是很容易分別的：恆態的勇，以堅固勝，所謂習慣成自然，無論何時，不離其人的。感情的勇，以猛烈勝，但不拘於時，前者是節操，後者生英氣，所以必須兼有這兩者，其勇方可說是完全的」。這是關於勇的方面。至關於智及智勇的關係，他說：

「若軍人不可不有智力。」

「一切事物可爲軍事動作的基礎，有四分之三，常不確實」

「第一步作完全的要求，則」

「戰爭，是一種揣測的境界，」

。譬如在雲霧之中，或淺或深，惟有智力的人能判斷，從迷離恍惚中求得真相，智力平常之人或可偶然想到真相，非常勇武的人則以勇來補其智力的不及，然綜合全體而論，其平均成績，不智的人終不能掩蔽他的缺點。又，戰爭是一種偶然境界，人生事業中，最易和意外危險相接觸，莫過戰爭。這種偶然的境遇，能使各種狀況不確實的程度增加，而事業之進步，因之越發困難。

「情況不明，預料不確，和意外的事變，常使主將發生所遇到的和所期望的有大不相符的感想，這個即刻影響到他的各種計劃，甚至因此拋棄以前策定的計劃而另擬新的計劃。但一轉瞬間這新計劃也不完全。因為戰爭狀態不是一時出現的，昨日所聞和今日不同，今日所聞又和明日不同，於是主將之心，常惶惶於所聞的不同苦悶之中。

「當此之時，而能鎮定的主將就少不了兩種性質：一是智，所謂「智」，好亂行路於黑暗之中，常係一點光明而知本線在那一方向；一是勇，所謂「勇」，可使人藉這一點微弱的光明而向前邁進。法國人所謂「局面眼」（慧眼），這裏也可以說是果斷，所謂果斷，勇是他的父親，而智是他的母親。

「因為戰爭是以戰鬥為主，而戰鬥又以時間空間兩要素為體。當時騎兵的使用和急劇的決戰，一切都以迅速和適當的決斷為成功的要訣，法人形容這時間空間的目標力稱之為

慧眼。兵學者很多以這個古義來解釋慧眼，也是因為動作迫切時而能下適當的決斷，都是由這慧眼而來。例如發見適當的攻擊點等等，由此可知，所謂慧眼，不只是指肉眼，還兼指心眼。

「由慧眼乃生果斷，這果斷實是責任的勇，也可說是精神的勇，法語稱爲心勇，以其由智所產生。但是這勇雖生於智，而勇之動則不由智而由於情。有智的人不必有勇，多智的人往往臨到難關失卻決斷力，我們是常見的。所以智是不可少的，但必須兼有勇之情，而勇者沒有情也不能維持繼續的。大凡人當危急之秋，與其謂爲智所左右，不如說是爲情所左右。」

「臨事苦於疑慮，又恐陷於猶豫，則果斷最爲必要。世俗常以冒險大膽，暴虎馮河的勇稱爲果斷，吾人斷不同意。凡勇的行爲若不具完全理由，決不許以果斷稱之。這個完全理由是由智力而得。前論果斷生於智而成於勇，固無疑義，然兼有智勇尚不夠，還要兩者能互相融洽才會產生第三者的果斷。有一種人，其心目很能解釋困難問題，而其平生處事也很有勇，但一旦臨到果斷的機會，忽然失卻了能力，這是智力不融洽所致。然無智的人，遇到困難決不會深思熟慮，幸而成功，實是例外。」

塞氏於最後歸結說：「人類精神作用表現在軍事上，要而言之，無一不是智力的作用，無論

那一軍事動作，必須有適合其動作的智力，而後方能勝任。由此觀之，臨戰而能奏功，自下級以至上級，都不可不要智力，都不可不具有特殊的天才，不過，將帥所需的精神和智慧比較多些。但他卻忽略了軍人應具有的最重要的博愛之仁，并且強調「戰爭爲暴力無界限的行爲」，因此便造成德國今日軍人的饕餮無道，弄得全歐爲之烏煙瘴氣，暗無天日，這不能不說是克氏戰爭理論的一大缺陷。至於蕭米尼、威利遜、杜黑、福煦、魯登道夫等兵學家的著作，亦犯有同樣的缺陷，只可做爲侵略者的工具。於此，可見 國父兵學思想的不同凡響，和我國兵學的特色。本來仁的戰爭觀念，在我國古代有一種說法——「不殺人」，叫做仁，其實這是錯誤的，它的出發點，應爲撥亂反正，濟弱扶傾。又如司馬法的仁本篇說：「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可也」。國父的所謂仁，應爲如此，所以他仁的戰爭觀念，決不是「不殺人」之仁，也不是春秋時代宋襄公之仁——「不重傷，不擒二毛」，因爲這是婦人之仁，是小仁，非仁者之仁，更非 國父之仁——救國救世之仁，實行三民主義之仁，站在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立場上，縱是澈底殲滅敵人亦所不惜，這是我們應該澈底認識的。

總之， 國父所講的智仁勇，是三位一體的，缺一不可。尤以仁爲中心，殿之以決心，以爲實行發揚智仁勇的原動力，益見完整而有力。就是說軍人如果缺乏決心，則智仁勇，也是徒然。但決心生於信仰三民主義，爲實現三民主義而犧牲我們自己，就是個人的「成仁」，革命軍人能

鐘個個成仁，則革命事業必「成功」。所以「成仁」與「成功」是一件事情。再就個人而說，決心「成仁」者，往往未「成仁」而先「成功」，決心「成功」者，往往未「成仁」而先「成仁」，成功固偉大，成仁更偉大，遠如唐之張巡、宋之文天祥、明之史可法、近如此次抗戰中之饒子青、張自忠、戴安瀾等，這種轟轟烈烈的「成仁」，簡直成爲民族國家的軍神，千秋萬載而後，猶令人聞風興起。

固然，智仁勇爲每一個將校所必備，就是每一個士兵也要具備，不過在程度上各有差別而已，譬如就一個步兵師說：師長要有師長的智仁勇，旅長要有旅長的智仁勇，團營長要有團營長的智仁勇，推而至於連排長及士兵也各要有其智仁勇，而決心則不分上下彼此，一律皆然。然才後能分別完成自己的任務。至於程度的差別，固與先天有關，尤繫乎後天的學習與修養，所以我們革命軍人決不可自暴自棄，應不斷努力學習與修養，提高自己的智力、仁力、勇力，及鍛鍊自己的決心，這樣就是士兵亦可成爲將校。今後的革命戰爭，所課於我們軍人的精神力太大了，因爲它是戰爭決勝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我們必須經常努力提高我們的精神力，我們有了至高至大的精神力，自可以殺敵制勝，完成革命！

（註一）見蔣軍：「兵學革命與紀律進化」演講詞。

六·戰爭與政治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是克勞塞維慈氏的名言，根據克氏的意見，戰爭為政治的手段，用以達到政治目的之手段，其性質又依於政治的標準而定。但降及今日，因為戰爭的本質變化，政治的本質變化，政治對於戰爭的關係亦因之變化。所以在戰時應以軍事為主體。固然政治在平時居於主導地位，但一到戰時，軍事則轉居於政治之上，即「軍事第一」之謂，正如於國大綱上所規定：「在軍政時期，一切高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所以戰時的政治就要處處配合軍事，為戰爭而服務，以求貫徹戰爭的目的。內政與外交為政治的兩大形態，戰爭的勝利，有仗它的輔助，反之內政與外交對於戰爭不能發生輔助的作用，甚至背道而馳，或互相衝突，勢非導致戰爭於失敗不止。

在這裏，我把 國父關於戰時的政治言論，分為內政與外交兩方面來說：

一、內政方面

戰爭所要求於內政，最緊要的是舉國團結一致。因為舉國上下及各黨各派團結一致，才可以構成強大的力量，協助戰爭，支持戰爭。國父在議建設須掃除

種應有的演說詞上說。「中國現在時勢，尚在危險時代，如各自爲謀，不以國家爲前提，無論外人與敵就說，瓜分之禍，危在旦夕。即使人不我謀，而難心德，亦難有成。是中國欲建鞏固之國家，非萬眾一心，羣策羣力，不足以杜外人之覬覦」。致岑春煊協力討袁電說：「大敵當前，而內紛不息，事甚無謂，文已電同志，俾混精慮，並求事實上之一致。……務嚴約束，勿復生變，庶幾同心戮力，共伸天討」。同樣，在對外戰爭時，更應促成國內的團結一致，能如是，方不致發生無謂的磨擦，以互相抵銷，更不會被敵人挑撥離間，以自互分裂。更應實現 國父向所主張的「全民政治」（見民權主義）以爲「全民戰爭」的後盾。

至於「足食」、「足兵」，亦爲戰時內政的要項，關於足食方面，留待下篇論述。關於足兵方面，尤以在國防工業落後、武器生產未能自給的中國，更見重要。因爲國防工業落後，則軍隊的裝備亦必落後，以這樣的軍隊與優勢裝備的侵略者作戰，則所需要兵員必比敵爲多，其傷亡率亦比敵爲大，自然所需補充的兵員亦因之加多，倘若補充的數量與傷亡的數量不能成爲對比，形成兵員不足的现象，必將使戰爭無從繼續。但爲足兵，就要實行 國父向所主張的「徵兵制度」，爲收獲這個制度的效果，就要建立良好的役政，做到平均、平等、平允的地步。

要之，不管爲謀舉國一致，或足食足兵，在內政上首要樹立「萬能政府」（見民權主義，爲全民政治的核心），以爲領導和推動。又戰爭所需要全國人民的「有力出力」，「有錢出錢」，「

有物出物」，更要有取得人民信仰與擁戴的「萬能政府」。中國過去的政府是低能或無能的，今後非建立萬能的不可，尤以戰時更為迫切。誠以戰時內政的繁重，措施的適宜與否，往往足以影響戰爭的勝敗，國家的興亡。所以一個戰時政府，其中若果充斥着無能之輩，貪污之流，前途如何，可想而知。其次戰時政府又要實行集權的，人民的一切都要受其管制的，國父說：「譬如今次之世界大戰，凡參加此戰爭之國，無論共和君主，皆一律停止憲政，行軍政，向來人民之行動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皆剝奪之，甚且飲食營業皆歸政府支配，而舉國無有異議，且獻其生命為國家犧牲，以其目的在戰勝而國存也」（孫文學說）。所以我們今後為求「戰勝而國存」，大家就應忍耐地在政府的管制之下而生活，只有國家的自由，沒有個人的自由，並爭相獻身為民族國家而奮鬥犧牲，但仍待於「萬能政府」的措施得宜。

二、外交

方面：

外交與軍事本為「難兄難弟」，在戰爭未爆發之前，外交可代替軍事，戰爭一經爆發之後，外交就要協助軍事。上次歐戰方酣之際，海菲斯未資將軍曾說過：「這次戰事不僅是單純的武力角逐，如果我們要把握住最後勝利，我們必須運用外交，如運用其他國力一樣。當我們協約國達到滿意的和平時候，我們最高理想的實現，不僅依賴軍事行動，還須憑藉外交利器」。戰時外交的重要性，於此可見。在普法戰爭中，普之勝法，因勝於色當一役，亦由於俾士麥和英魯奧及對俄調協，使法國陷於孤立，以協

勝軍事。在意大利統一戰爭中，意之勝奧，雖勝於經費立後一役，亦由於加富爾運用外交手段，聯法聯英，及對普親善，得以全力對付奧國。這又是兩大顯著的例證。

國父也是一個大外交家，彼在推翻滿清的革命戰爭中，奔走海外，聯絡友邦，附能博得國際同情，取得國際援助。當在美國開得武昌起義的捷訊，本擬由太平洋潛行返國，親與革命之戰，繼念「吾輩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楛杵之間，所得效力更大也」（自傳）。遂起程赴英，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絕止清廷一切借款，二、歸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處英屬政府之放逐令，以便歸國。三事均得英政府允許，方取道法國東歸。民國以來，於討賊各役中，亦莫不運用外交以佐之，藉孤好賊之勢，並取得國際間的援助。又如民十二收回國餘，以充北伐經費，北京使團竟令外艦集中省河，百端恫嚇，國父從容應付，據理力爭，卒達目的。民十三廣州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利用商團公然叛變，英領且為張目，致國民政府以哀的美敦書，阻止政府戡亂，國父乃向英政府提出抗議，卒使英艦不敢妄動，而英領亦因此去職。還有民十二由於聯俄的成功，因而取得蘇俄的援助，促進北伐初期的發展。

以上是國父外交戰的成功。其次國父欲本其外交知識經驗，著作「外交政策」一書（屬三民主義自序），雖未完成，而關於外交言論，散見遺教中者頗多。民族主義說：「用政治力亡人國家，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兵力是用槍炮，他們用槍炮來，我們還知道抵抗，

如果用外交，祇要一張紙和一枝筆，用一張紙和一枝筆亡了中國，我們便不知抵抗。在籌款領餉的時候，中國雖然派了代表，所議關於中國之事，表面都說爲中國謀利益，但是華盛頓談話不久，各報便有共管之說發生，此共管之說，以後必「日進步一日，各國之慮必積慮，必想一個很完全的方法來亡中國，他們以後的方法，不一定要動陸軍，要開兵船，祇要用一張紙和一枝筆，彼此妥協，便可以亡中國。如果動陸軍開兵船，還要十天或者四五十天，便可以亡中國。至於用妥協的方法，祇要各國外交官，坐在一處，各人簽一個字，便可以亡中國。簽字是一朝，所以用妥協的方法來亡中國，祇要一朝。一朝可以亡入國家，從前不是沒有先例的，譬如從前的波蘭，是俄國德國奧國瓜分了的，他們從前瓜分波蘭的情形，是由於彼此一朝協商訂妥之後，波蘭便亡。照這個先例，如果英法美日幾個強國，一朝妥協之後，中國也要滅亡。這是說軍事與外交關係政治力的手段，而其「不戰而屈」的外交手段，尤爲可驚。次在和平統一化兵爲王的演講詞上，就革命戰爭中的外交說：「革命的成功，歸功於古今中外的歷史看起來，一靠武力，一靠外交力，外交力幫助武力好像左手幫助右手一樣，從前美國獨立，革命國的命，所以成功的原由，一半固然由於全國武力的血戰，但一半可以說是由於法國外交力的幫助，如果靠武力，決是難於成功的。譬如洪秀全革命，由廣西打滿湖南，湖北，以至建都南京，而終不能成功的原因，大半是由於外交失敗，」

「沒有外交力的幫助（教習英國戈登幫助滿清親自帶兵去打蘇州——滄白註），

「能以革命的成功與否，外交的關係是很重大的」。至軍事勝利亦足以給予外交有利的影響。見自美洲致鄧澤如先生的信說：「經羊城一役之後，外交亦易入手，弟曾著人直說美國政府，皆大表同情。今日使人往英，以說彼中樞要，想必能得當。法國政府，則向已有通情者也。如是吾黨今日可決英美法三國政府必樂觀吾黨革命之成事，則再舉之日，必無藉端干涉之舉，且必能防阻他國之干涉也，此又外交之點，因羊城之影響而收效果者也」。國父獨爲外交至上論者，卽他認爲一國對外應先用外交手段，然後用戰爭手段，亦是見維護國際和平的精神。中國存亡問題一文說：「國家既不可以長從事於戰爭，而對外之關係則有且無日減，不能用戰爭以求達其存在發達之目的，則必求其他之手段，所謂外交者由是發生。凡國家之國家已定，必先利用外交手段以求達其目的，外交手段既盡，始可及於戰爭，戰爭既畢，仍當復於外交之序，故國與國遇，用外交手段與用戰爭手段，其政策所不可闕者，然用外交手段之時多，用戰爭手段之時少，外交手段者通常之軌則，戰爭手段者，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而用之，無可如何之謂也」。這個外交思想，正淵源於孫子的「是故可戰而戰者，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者，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於此我們應注意的，不論在平時或戰時，爲求外交的勝利，必以國內的一致團結爲基礎。國父說：「夫欲求外交之勝利，必先謀內政之修明，今內部既分裂如是，何能得國際之承認。故自家政府成立以後，非外人不承

議軍政府，實又鑒於軍政府內部未繼續完全，西南各省又未協同一致，故始終未通告各報。求其承認耳。……：倘西南各省，一致擁戴軍政府，承認大元帥，則國內團結既固，對外發言效力自強，斷不患外交團之否認，及交涉之不勝利也」（六年致貴陽王文華、劉顯世電）。又說：「且人心渙散，政府不願督撫，官吏不顧人民，人民亦不知國家為何物，所以外交失敗。現在中華民國，人民政府官吏，皆皆……：但願……：所以外交不致失敗」（見建議之兩大要務演講詞）。不啻爲我此次抗戰的外交痛下針了。

國父對於外交的本質，是革命的，自然他戰時外交的本質也是革命的，即他爲促進革命戰爭的勝利，而運用外交，並不同帝國主義者的運用外交來實現侵略的目的。但談到運用外交，首先要澈底地改變過去「還交近攻」，「以夷制夷」的下策，另覓上策，卻不知國父於此早已爲我們確立了兩個正大的基本外交方針了：一曰聯絡素日親厚與國（即「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一曰維持列國對我素持之主義。見民元國民黨宣言說：「外交方針，則可約略言之：一曰聯絡素日親厚與國：今國於世界，孤立無助，實爲危象。故必當聯絡素日親厚之與國，或締協約，或結同盟，或一國，或數國，俱爲當時之妙用。一曰維持列國對我素持之主義：吾國現勢，非致力對外之時，故宜維持列國對我素持之主義，使之相承不替，而得專心於內政之整理」。亦即前者爲與利害相關的國家結成同盟，以取得經濟上及軍事上的援助。後者爲維持中

立國家素日對我所採取的公正主義，如尊重我國領土主權之完整，維護我國之反抗侵略運動等，使之相承不替。這兩大方針，固可適用於平時，亦可適用於戰時——削弱敵人，增強自己，促進戰爭的勝利。今日我國在抗戰中所採的外交方針就是繼承 國父這兩大方針。

其次，爲使戰時外交運用得宜：第一、要明瞭情況：國父說：「欲運用外交，非具世界之眼光，不足以盡其用，中國向來外交，無往而不失敗，蓋以不知國際上相互之關係，一遇外人虛聲恫嚇，即惟有讓步之一法，是誠可傷心者也」（民國國民黨宣言）。所以辦理戰時外交，就要洞識當時各國千變萬化的實情，及國際間複雜錯綜的利益關係，爲此，必須建立健全的外交情報網，以求「知己知彼」，才能確立有效的對策。

第二、要爭取自主：一國的外交，不能媚外，也不必畏外，不能退隨人家，也不可附庸人家，它是要獨立自主的，尤以戰時的外交實乎獨立自主，即「致人不致於人」，方能操縱自如，實現豫定的企圖。國父說：「吾國外交本非自主，向落人後，而不能研究其利害與得失之所在，殊可嘆也。今後吾國之外交，對於海軍國，固當注重，然對於歐亞大陸之俄德二國，更不能不特殊留意，不宜盲從他國，致爲人利用也」（註一）。又說：「中國一般人普通人的心理，以爲外國人廢除不平等條約，必須要中國有力量，如果中國一日沒有力量，那些舊約便一日不能廢除。這個道理，殊不盡然。要問外國能不能廢除舊條約，就要問我們有沒有決心去力爭，如果大家決

心去力爭，那些條約便可以廢除。好像最近的華盛頓會議，外國人便主張放緩從前的凱馬契約。外國人也主張實行，我們中國人都是不爭，都是不要，假若全國國民一致要求，這種目的，一定可以達到的」（見國民會議爲解決中國內亂之法演講詞）。我國在此次抗戰中的外交，由於能夠爭取自主，堅持自己的立場，不肯中途妥協，故能造成今日更利於我抗戰的國際形勢。

第三、要把握利害：國與國間的分合，係以利害爲前提，其合由於利害的相顧，其分由於利害的衝突，絕不是感情道義所可維繫，必須有了利害的結合，然後才有感情道義可談，尤以戰時外交爲然。英國人說：「英國無永久之友，亦無永久之敵，只有英國之利益」。孫子說：「屈諸侯者以害，從諸侯者以榮，趨諸侯者以利」，真是道破外交的真形。國父對此亦有深刻的認識。他說：「夫兩國之同盟，非以其條約而有致者也。真正原因，乃在其利害之共同。英國本無急切與德國衝突之必要，蓋如前章所已言。此次交戰，既不能達摧抑最強國之目的，英國爲保其存在，不得不棄其欲得之利益，以保其所已得之利益。而德國苟以英國之功，得其所欲得之利益，即爲利害共同，而聯盟之事自生。譬如意大利，本與法爲連羈，且得法之助以立國，而一旦爭非洲北岸之地，與德遠有共同利害，則加入三國同盟以敵法。及其體土以後，利害與奧衝突，而對法緩和，則又復活其同種之感情，與建國之舊恩。故知國防恩怨要約，兩不可恃，同種云者，亦不過使利害易共同之一條件，其他感情上之事實，隨時而變更，未可規律久遠之政策也。欲兩國

之真正利害相同，必能有割捨之決心，所謂協調者，各有限於永久之計劃，於將來兩國發展所必須者以交讓行之。……世人有疑此者，請視日俄。日俄以傾國之力相搏，事纔十載，日德之實戰，詎獲資牙斯條約，不過八年有餘。當俄德和之際，吾在東京，親見市民狂熱，攻小村議和特使爲賣國，以桂總理爲無能，焚警舍，擊軍人，卒倒內閣，輿論未聞有贊成和議者，曾幾何時，而人人以狂熱歡迎俄之捷報。夫感情隨事而逝，隨時而生，一國當時之外交，必決諸恆久之利害，決不能以暫時之感情制之，以日俄之前事，可以判英德之將來矣」（中國存亡問題）。再說：「大凡立國必須與利害相關之國，攜手進行，方能進步，利害不相關之國，縱彼欲與我相親，但是不可以與之親近者。從前滿清政府……不知利害相關的道理，總是遠交近攻之政策，……一經親俄，天山以西帕米爾高原一帶，已非我有，延至今日，蒙古又將不見了，這就是利害不相關之國相親的害。……今日謀鞏固中華民國，必須注重外交」（見學生須以革命精神努力學問演說詞）。所以我們在現實的外交上，切不可受人家花言巧語所愚弄，必須張着利害之眼，掉着利害之舌，揮着利害之腕，去應付一切，才可以迎刃而解，尤以戰時外交爲然。惟對於「濟弱扶傾」的革命外交，又當別論。

最後，近世以來，世界各國的善用外交者，莫如英德，英國在第一次歐戰中，既把德國的盟友意大利拉過來，又使中立國的美利堅加入戰團，並肩作戰，卒收戰勝之果。但在此次歐戰之初

，因對蘇外交的失敗，使德國得以大膽發動西線之戰，而自己便罹重大的損失，戰禍蔓延至今未止。德國在此次歐戰中，既勝意以割法，又聯蘇以避免東西兩面作戰之苦，而得集中力量解決西線各國，旋轉鋒攻蘇，欲求速戰速決，但因赫斯飛英的失敗，遂使攻蘇之戰陷於長期的苦境，於此，足見戰時外交適用的困難，但根本的原因，實由他們外交方針的矛盾，弄至無法補救。我們今後的對外戰爭是革命的，革命的戰爭必勝，革命的外交也是必成，用外交可以促進戰爭的勝利，用戰爭亦可以促進外交的成功。惟戰時外交，正如 國父說：「外交禮與，有應事發生者，未可預定，亦難說明」（民元國民黨宣言）。那麼我們就要把用兵的原則——「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應用到外交上來了。

（註一）見蔣介石先生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

七·戰爭與經濟

經濟是軍事的基础，足以決定戰爭的持續，亦足以決定戰爭的勝敗。其表現在於現代戰爭上，固十足強烈，就是表現於古代戰爭上，亦相當顯著，「孫子兵法」一書是兩千多年前的著作，其中說：「凡用兵之法：馳車千輛，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惟現代的戰時經濟則非古代局部的動員可比，它是要澈底地由平時經濟體制改編為戰時經濟體制，即整個的動員，才能適應現代戰爭的要求。在 國父遺教中，關於戰時經濟的言論很多，我在這裏略分為四大類：一、財政、工業、糧食、交通，加以論述：

一、財政

方面：

近代戰爭是金錢的大量需要者，也是金錢的大量消耗者，簡直成爲天文學上的數字。像普法戰爭，雙方的戰費共計美金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日俄戰費共計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第一次世界大戰共計二〇八、三〇八、〇〇〇、〇〇〇元。所以近代戰時的支出，尤其是長期戰爭的支出，不是任何

財政學者于事前所夢想得到的，這個原因是由于：一、動員人數的龐大，二、軍需品消耗的增加，三、物價的上漲，及舉辦戰時各種新事業。

德國經濟學家說：「戰爭的決勝，是決定於金，也是決定於金，尤其是金在戰爭的進行中及終結時更表演着不可輕視的作用」。日人中澤三夫在其所著「戰爭」一書曾慨嘆道：「日俄戰爭……日本的正金準備，僅有一億元餘，所以在講和會議上，不能強硬主張我意志的原因，不外籌財政困難所壓迫，真的金錢爲戰爭所不可缺一」。所以一國或一政黨爲求他戰爭的勝利，在財政上就不能不作充分的準備，與臨時的多方籌措了。

國父在倒清的革命戰爭中，對於財政的解決方法，主要的是募捐、借債及發行軍用票，就中以梁士詒的捐助爲大。當時國父奔走海外，或親向華僑勸捐，或命各同志到處勸捐，所謂「多一分經濟，多一分預備」的名言（見致李源水、鄧錫生的勸捐手札），便是發於此時。在財政上有此源源收入，用能支持各同志及革命的活動，爭取革命的成敗。

國父於推翻滿清之後，不久，又逢帝俄虎視眈眈，欲併吞我外蒙古，這時國父極力主張對俄抗戰，並主張「鑄幣革命」，即以「紙幣代金銀」，以解決對俄抗戰的財政困難問題，見於錢幣革命一文說：

「第一，行錢幣革命以解決財政之困難。今日我之不能言戰者，無過於財政困難。自滿

北統一後，謀借外債，以救我金融之恐慌，然至今六國之借款無成，若一有戰事，財政復無望。然則就財政上言之，無論有戰無戰，財政問題之當解決，必不容緩也。文於護革命時，可謂以此，定爲革命首要之圖。乃至武昌起義，各省不約而同，慶而北軍贊和，清帝退位，進行頗適，迨出意外。故所定方略，百未一施，民國大定後，財政難困，以爲可以習慣之常理，以解決之，便不欲以非常之事而驚國人也。不圖借債無成，而俄禍又起，存亡所繫，不能不出非常之策以應之也。錢幣之革命者何？現在金融恐慌，常人皆以爲我國今日必蒙昔日之乏，其實不然，我之財力如故，而出產有加，其所以成此窮困之象者，錢幣之不足也。錢幣爲何？不過交換之中準，而貨財之代表耳。此代表之物，在工商未變遷之國，多以金鑄爲之，其在工商已發達之國，財貨溢於金鑄千百萬倍，則多以紙幣代之矣，然則紙幣者，將必盡奪金鑄之用而爲未來之錢幣，如金鑄之奪往昔之布帛刀貝之用。……由此觀之，紙幣之行用有方，流幣不生既如彼，而利益之大又如此，況值非常之變，非先解決財政問題，不能言戰，乃有熱血之士，徒責政府之無能，而不爲設身代想，殊不共諒當爲人爲難之甚也。當此強鄰迫處，實行瓜分之秋，非徒大言壯語所能抵禦，非有實力之對待不可，是宜政府與人民同心同德，協力進行錢幣革命，以救今日之窮，在政府當速行立法。

本來在歐羅巴各國早已實行幣制革命了，而 國父這個偉大的主張，直至民國二十四年方得

實現，即所謂「法幣政策」的成功，（禁止紙幣兌現，白銀收歸國有，並規定以中交農四行的鈔票爲法幣），此次抗戰所以能夠持久至今，端賴財政支持的力量，而財政之所以能夠支持，要在實行法幣政策的結果，亦即實行「國父素所主張『錢幣革命』」的結果。

其次 國父對於戰時財政的重視，見於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的演講詞說：「廣東財政，向來收入，每年有三千多萬，我們現在的辦法，只要恢復從前的財政狀況，便可養十幾萬兵，現在更有新計劃，可再增加三千萬，但有三千萬，又新加三千萬，合起來便有六千萬。所以廣東這個省份，是很富的，是很有可爲的，這項新財源，弄成了功，甚麼事都不在擱用，專拿來做北伐的軍餉，將來得了江西、湖南、湖北、江蘇，十幾萬兵還不夠用，還要多擴充，如果不能發展，就是這十幾萬兵還不得了，不要三年，便要消滅，所以現在的局面，便是我們生死的關頭。再就廣東局面說，東江殘敵很容易肅清，北江又打勝仗，此後外部，完全不成問題，所有的還是內部問題，這個內部問題，簡單的說，就是財政問題」。見於銀行最高的信用是「現狀」的演講詞說：「大家知道這個政府在廣東，現在有許多軍隊，軍餉都是不足。政府因爲担負這樣多的軍餉，所以是很困難的，在這樣財政困難的時候，政府怎麼樣還能夠發起開辦這個銀行呢？這個銀行之所以能夠開辦，就是因爲借了外國資本一千萬，因爲有了一千萬的外國資本，這個銀行才能夠成立。……我們這個銀行所發行紙幣的信用。……要維持這種紙幣的信用，便要商界工界農界和政

農家界同力合作，來培植這種雞鴨和谷種的發達，便可以生出許多雞蛋和新穀，這種雞鴨和新穀，又可以再做種子，再生出雞鴨來生蛋，再長成新穀來做米，這種雞不生不絕的牛長，是毫無止境的，是毫無限量的，到了那個時候，軍界和政界便不怕窮，工商界和一切人民，便不怕沒有資本，這個銀行更是利益無窮」。

此外 國父對於合理的戰時增稅，亦主張實行，見於民生主義上說：「國家直接徵稅，所取之不爲虐。從前舊稅法，祇是錢糧和關稅兩種，行那種舊稅法，就是國家的財源，完全取之於一般平民，資本家對於國家，只享權利，毫不盡義務，那是很不公平的，德國英國老年發現這種不公平的事實，所以他們老早便行直接征稅的方法。德國政府的歲入，由所得稅和遺產稅而來的，佔全國收入約自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英國政府關於這種收入，在歐戰開始的時候，也祇百分之五十八（按英國在歐戰期間，所得稅收入增加七倍，遺產稅收入增加二倍——浴日註）。美國實行這種稅法，較爲落後，在十年之前，纔有這種法律，自有了這種法律以後，國家的收入，便年年大形增加，在一千九百一十八年，專就所得稅一項的收入而論，便約有美金四十萬萬」。國父這個主張，直至此大全面抗戰爆發之後，我政府方樹立了「直接稅體系」，使租稅重心，由間接稅移於直接稅，使財政的收入，日益增加。惟因沿海沿江各大都市的淪於敵手，影響稅收的損失，真是不可言喻。

據於上述，足見 國父對於戰費的籌措，是以發行、增稅、募債及募捐四項為主，正和現代各國所實施的戰時財政政策，不謀而合，依此而行，實足以解決戰時財政困難，支持長期的抗戰。惟於此應注意的，因為戰時社會的動盪，物價的高漲，生活的困難，每每使財務人員貪私舞弊，貪贓枉法的，故必須澈底厲行 國父向所主張「實行懲戒官吏失職」(「民元國民黨宣言」)的政策以肅清貪污，而使財界明朗化，並做到清濤歸公，這樣便可以提高政府的威信而博得人民的信仰與擁戴了。魯登道夫將軍說：「人民既為國家而犧牲其金錢，則戰時公債一絲一毫，應用之於公，而不應用之於私，應用之於國事，不應以之肥私囊。若有侵吞公款之行爲，無異於政府自爲盜賊，掠奪民財，其應防止之也，自不待論。世界大戰中德人之磨礱公債者，既爲犧牲一己，冀期於維持民族生存，而其結果何如乎？由世界大戰之經驗觀之，惟肅清政治上之弊竇，然後能保國民之一致團結，此在財政上尤爲重要」。

二、工業

方面

工業在現代戰爭上，其重要性並不亞於財政。像上次世界大戰時，德軍所以能屢建奇勳，主要的得力於本國工業的發達，德國的領土雖然狹小，但在很小的領土之內，能建立龐大的軍隊，抵禦協約國的進攻達數年之久，就是賴於工業上能夠供給德軍所需要的步槍、大砲、機關槍、飛機和技術。又像美國在這次世界戰爭中，能夠成爲「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也是由於平時工業的發達，一到戰時，便能大規模動

員，生產大砲、飛機、坦克等精銳武器，來源源接濟各同盟國作爲反攻軸心國家之用。

我們知道：工業與科學有知子母的關係。根據外國科學家對中國的批評，說中國是一個古代科學先進的國家——印刷術的首創者，指南針的發明者，應用火藥的先驅者，後因忽視觀察與實驗的方法，而一般士大夫階級皆趨於利祿，爲科學功名所引誘，遂使科學不能發達，科學既不發達，則機器工業便無從建立，只得長期停留於小手工業的階段。說到中國之有新式工業，不過是百年來的事，即自海禁大開後，纔輸入西方工業的機器與生產方法，惟因受帝國主義的摧殘與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至今尙未臻於繁榮之境，自然談不到獨立應付現代的國際戰爭。國父對於發展中國工業的倡導，早已肇端於上李鴻章書，其中有說：「機器巧則百藝興。製作盛，上而軍國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民國以來，更倡導不遺餘力，看他的三民主義及實業計劃便可知道。國父對於發展中國工業，目擊國內資本、工具及人才的缺乏，認爲應求助於外國。實業計劃上說：「歐美二洲之工業發達，早於中國百年，今欲於甚短時期內普及之，須用其資本，用其機器，若外國資本不可得，至少亦須用其專家發明家，以爲吾國製造機器，無論如何，必須用機器以幫助中國巨大之人工，以發達無限之富源也」。中國實業當如何發展一文說：「吾國既有天然之富源，無量之工人，極大之市場，倘能藉此機會，而利用歐美戰後之機得與人才，則數年之後，吾國實業之發達，必能並駕齊驅矣」。然此非我的創舉，外國亦復如

是。

國父也說過：「俄國之製造廠、兵工廠，皆用英美人爲之，日本意大利兩國，其關於製造事業，亦多由英人主持」（見歡迎外資與門戶開放演講詞）。惟主權要操之於我，方不致受外人的宰割。國父說：「鄙人主張用外人辦理工商事業，及訂立一定之期限，屆期由我收贖，並非利權永遠落於他人之手也」（同上）。又說：「萬眾一心，舉國一致，而歡迎列國之雄厚資本，博大規模，宿學人才，精練技術，爲我籌劃，爲我組織，爲我訓練，則十年之內，我國之大事業必能立於國中，我實業之人才，亦同時並起，十年之後，則外資可以陸續償還，人才可以陸續成就，則我可以獨立經營矣」（孫文學說）。可是欲發展工業，必須同時發展礦業，如煤鐵等，因爲煤鐵同爲近代工業的兩大原料，沒有煤鐵，則陸海空兵器，無從製造，沒有煤炭，則一切軍需工廠的機器亦無從發動。至於石油的開採亦至必要，倘若缺乏石油，則在工業上所生產的兵器如飛機、坦克、兵艦等，均無從活動，變成死物。英國某海軍大臣說過：「英國之生命在海軍，海軍之生命在石油，反對此者非英國人」。福煦元帥亦有一句名言：「一滴石油一滴血」。可見石油的價值。所以國父在實業計劃上，亦計劃大規模發展石油礦業。本來國父這個發展中國工業的計劃，是倡導於上次歐戰方息之時，距今已二十餘年，尙未實現，我却希望能夠實現於此次世界大戰之後。又，這個計劃雖是平時工業建設的計劃，但平時工業，爲戰時工業的基礎，

「即戰時工業的準備，平時工業尤以重工業沒有發達，一遇戰時的動員就要捉襟見肘，無從適應戰爭的需求。現在歐美各國的戰爭工業大半寄托於和平工業之中，因為和平工業是可以改編為戰爭工業的，例如商船廠可以改造兵艦，汽車廠可以改造飛機發動機，火車廠可以改造大炮，普通機器廠可以改造步槍機關槍，造紙廠可以改造拋射藥，顏料廠可以改造炸藥，造幣廠壓片廠可以改造槍炮彈壳等。可見 國父的提倡工業，實具有軍事的眼光。」

其次 國父於民國十一年間在安慶演講道：「軍器一門，我們從前所用是弓箭刀槍，試問現代戰爭，能用不能用？試問現代戰爭，不用外國槍砲，能勝不能勝？」在民權主義上說：「由於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便知道從前的弓箭刀槍，不能夠和外國的槍大砲相抵抗」。又在中國實業如何發展一文說：「此次歐戰，英法二國多輸送金錢於美國以易武器」。又說：「此回歐戰各國以製造械用品而擴張其機器千百倍於平時」。再在民族主義上說：「德意志聯邦，成立之初，本來是農墾國，後來變成工業國，因為工業發達，所以陸海軍也隨之強盛」。這都是說戰爭與兵器的關係，戰爭與工業的關係，真的中國因為工業尚未發達，所以反映於這次抗戰中，就是我軍武器裝備的落後，且所以的新武器，如飛機、戰車、重砲等，竟要全部仰給於外國了。今後一定要急起直追，做到自造自足及原料自有的地步。」

美國海軍將軍在很有名的「戰爭的機械化」一文上，對我國作了這句總結：「在中國也是

這樣，他們對於西方文化的反抗並不是反對工業化，實在是要將工業化與西方的剝削分開，大家都知道中國的煤礦是極富的，到了法律與秩序建立，天然資源發展之後，中國必將工業化，結果他的主要戰鬥力也必會機械化的」。這是很對的，我們爲使國軍的戰鬥力成爲機械化，就應努力完成「國父工業革命的主張，在內地，把我們的工業中心區建設起來。

三、糧食

方面：

中國近代的糧食問題，到了這次抗戰爆發之後，其嚴重性實造成空前未有的紀錄，使我們親歷目睹糧食在戰爭上所佔地位的重要。

本來糧食影響於戰爭的重大，由來已然。唐將張巡孤守睢陽，屢戰屢勝，終因「羅掘俱窮」，爲敵所破。在此以前，像歷史家陳壽所撰諸葛亮傳說：「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糧盡而還。……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據武功五丈原，吳司馬懿對於滑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得申，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尙在此以前，像孫子主張：「因糧於敵」，及強調：「軍無糧食則亡」。至如拿破崙的天才，當作戰的時候，還有提到糧食問題者，必痛斥以「不要談糧食」，因犯有這種疏忽，終不免慘敗於莫斯科的飢寒交迫之中。以上係就軍糧而說，至於民糧亦有同樣的重要，德國在上次歐戰中，因糧食的恐慌，弄得人民個個吃不飽，糧食暴動，遍於全國，便促成德國崩壞了。有人說：「糧食是戰爭的壽命」。又有人說：「糧食是決定戰爭支持力的因素，又是決定戰爭勝敗的因素」，實

非虛語。

中國雖稱地大物博，向來以農立國，對於糧食本可自給自足，可是因為地利未盡，及運輸不便，而人口卻一天一天的增加，故年豐而太平時，尚可自給，一遇歲歉而戰亂時，慮不免發生恐慌。考我國糧食仰給外國由來已久，如唐晉懷仁的「秦兩筆記」，就有洋米輸入的記載。近百年來，因為天災人禍的交煎，尤以帝國主義的侵略，使我糧食愈不能自給，每年仰給於洋米為數甚鉅（如民十九年竟達二千萬石左右），那麼到了戰時，益以敵人的封鎖，災區的擴大，農村勞力的減退，產米之區的淪陷，更不堪設想了。國父早見及此，於上李鴻章書中，就提出「地盡其利」的「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種有器」，為「富強大經，治國大本」。於民生主義上又強調：「民生主義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吃飯問題」。又說：「吃飯問題就是最重要的民生問題，如果吃飯問題不能解決，民生主義便無法解決」。可見他對糧食問題的注意。又在民生主義裏說明糧食與戰爭的關係，曾舉上次歐戰中德英等國為例說：「未遑歐戰以前，各國政治家總沒有在想到吃飯問題，在這十年之中，我們留心歐戰的人，研究到德國為什麼失敗呢？正當歐戰劇烈的時候，德國都是打勝仗，凡是兩軍交鋒，無論是陸軍的步隊、炮隊和騎兵隊，海裏的驅逐艦，潛水艇和一切戰鬥艦，空中的飛機、飛艇，都是德國戰勝，自始至終，竟國都沒有打過敗仗。但是歐戰結果，德國終歸於大敗，這是什麼原因呢？德國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吃飯問題。因為德國

的海口，都被聯軍封鎖，國內糧食，逐漸缺乏，全國人民和士兵都沒有飯吃，甚至於餓死，不能支持到底，所以終歸失敗，可見吃飯問題，是關係國家之生死存亡的。……德國的糧食，在平時已經是不夠，當歐戰時候，許多農民都去當兵士，生產減少，糧食更是不夠。所以大戰四年，歸到結果，便是失敗，由此可見全國的吃飯問題是很重要的」。

國父跟着又指出中國糧食問題的嚴重性說：「像要中國四萬萬人都是足食，提到這個問題，便是很重要的，便不容易解決。到底中國糧食是夠不夠呢？像廣東地方每年進口的糧食要種七千萬元，如果在一個月之內，外面沒有米運進來，廣東便馬上鬧饑荒，可見廣東不夠飯吃的。這就是就廣東一省而言，其他許多省分，都是有和廣東相同的情形。至於中國土地的面積，是比美國大得多，人口比美國多三四倍，如果就吃飯這個問題，用中國和美國來討論：中國自然比不上美國。但是和歐洲各國來比較，德國是不夠飯吃的，故歐戰開始之後兩三年，國內便有饑荒。法國是夠飯吃的，故平時不靠外國運進糧食，還可足食。用中國和法國來比較，法國的人口是四千萬，中國的人口是四萬萬，法國土地的面積，為中國土地的面積的二十分之一，所以中國的人口比法國是多十倍，中國的土地是比法國大二十倍。法國四千萬人口，因為能夠改良農業，所以得中國二十分之一約的土地，還能夠有飯吃。中國土地面積比法國的大二十倍，如果能夠做效法國來經營農業，增加出產，所生產的糧食，至少要比法國多二十倍。法國現在可以養四千萬人，我們中國至

少也應該可以養八萬萬人，全國人口不但不怕飢荒，並且可以得糧食的剩餘，可以供給他國。但是中國現在正是民窮財盡，吃飯問題的情形，到底是怎麼樣呢？全國人口現在都是不夠飯吃，每年餓死的人數，大概過千萬，這還是平時估算的數目，如果遇着水旱天災的時候，餓死的人數更是不祇千萬了」。

可是爲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尤其戰時的糧食問題，其政策不外是增加生產及消費管理，關於糧食的增產，國父於民生主義中指示我們五次應解決的問題，如機器、肥料、換種、除害、防災等，此外如製造運輸等問題，雖不屬於增產的範圍，因同列一起，合併摘要臚列如下：

一、機器問題——用機器耕田，生產可加一倍，費用可輕十倍或百倍。用機器抽水，來灌溉田地，非常便利。（農業機械化的實施，即是機械化部隊的準備——浴日

註）

二、肥料問題——用化學方法來製造肥料，用電來造人工硝，用水力來造便宜的電，農業生產，自然可以增加。

三、換種問題——用交換種子方法，使土壤可以交替休息，生產力可以增加。

四、除害問題——

- (一) 植物的害——用科學方法除去雜草和利用雜草。
- (二) 動物的害——用國家力量，研究除害蟲方法。

五、製造問題

中國製造方法——
(一) 鑄鐵。
(二) 煉鋼。
外國製造方法——將食物煮熟，或烘乾，製成罐頭。

六、運輸問題

運輸不便的損失
中國財富情形中國運輸不便而消耗甚大，過剩的生產成廢棄物，如極重要的糧食，時常因為運輸不通，而使吃飽問題，不能解決。
(一) 水運——恢復運河制度。原有的修法，未有的開闢。海上運輸，更是要用大輪船。
(二) 鐵路——到區聯絡起來，各處人民便有便宜飯可吃。
(三) 車路——窮鄉僻壤，通自動車，以救鐵路之窮。
(四) 挑夫——雖然不經濟，但自動車不能行的地方也可以補救。

七、防災問題

(一) 水災
甲、治標方法——浚河，築堤，大水不至氾濫。
乙、治本方法——多種森林貯蓄大量的水。
(二) 旱災
甲、治標方法——機器抽水，藏於地勢高水源少的地方。
乙、治本方法——種植森林蓄積大量的水。

此外，國父在地方自治開始實行辦法中所規定的第六事：「墾荒地」，即擴大墾地的面積，這也是增加糧食生產的一法。像英國於上次歐戰，得增加國內農業的生產，於一九一七年宣布了一個開拓三百萬英畝耕地的計劃，行之頗收成效。於一九一八年又樹立了一個增加二百六十萬英畝耕地的計劃，政府把土地供給地方自治團體去開墾，連都市周圍的空地、城市裏頭的網球場、草地、高爾夫球場、牧場和公園，也都由人民的團體去開墾做菜園。我國在此次抗戰中，由於奉行「國父」墾荒地」遺教的結果，亦增加了不少糧食。

其次說到糧食消費的管理：國父在實業計劃的糧食工業部門上指示我們，關於食物的貯藏及運輸、分配及運出等，都由「中央機關管理」，於地方自治實行法第二事的「立機關」中，又主張設置「糧食管理局」，實行糧食公賣，其具體辦法是：「糧食一類，當由地方公局買賣，對於人民需要之食物，永遠定廉之價，使自辦自食之外，餘人得按口購糧，不准轉賣圖利，地方餘糧則由公局運送，售賣於外」。於此足證明國父對於糧食的貯藏、運輸、分配運出及價格等問題，主張採取消費管理政策的。這樣，在戰時自可以便有無相濟，節約消耗，杜絕地主奸商的囤積，及流入敵人之手了。現代世界各國對於糧食在戰時都是採取消費管理政策的，上次歐戰中各參戰國是如此，此次歐戰中各參戰國也是這樣。國父關於上次歐戰德國糧食消費管理的效果，在英文學說上曾指出如下：「近代國家之行政政策者，以德國之組織為最進步，而此次歐戰一

開，則德國海面被英封禁，糧食時虞竭乏，社會忽起恐慌，人民飽受種種之痛苦。至兩年以後，乃始任巴特基氏為全國糧食總監，巴氏乃用科學之法，以經理糧食，而竭乏之事，始得無虞，恐慌之事漸息，而人民之痛苦亦漸減，由是德國乃能再支持二年之久，否則早已絕糧而降服矣。

以上兩大糧食政策，實為解決戰時糧食問題的良法，但要獨立基礎於平時，以便戰時的動員。尤以管理政策的推行，更有待於調查統計的完成，即對於人口與糧食的生產消費有全盤的調查統計，及執行人員的潔已奉公，忠於職守，方能作有效的推行。最後關於生產糧食的農村，我應特別提出一說的：在上次歐戰時，英人特奈爾氏上書英國首相路易喬治說：「我們根本的錯誤，就是以爲糧食不是戰爭的軍器，而農村不是兵工廠」。真的在每一次戰爭中，生產糧食的「兵工廠」與製造槍砲的兵工廠是有同等重要。但我們爲使農村發揮「兵工廠」的威力，以協助戰爭，今後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也應有早日實行。國父所昭示於我們的政策了。

四、交通方面

現代交通，可以分爲三大系統：一爲陸上交通，一爲水上交通，一爲空中交通。現代交通的利器用於陸上的是汽車火車，用於水上的是輪船兵艦，用於空中的是飛機飛船。此外用以傳遞音信的，又有電報電話。交通設備爲軍事行動的生命線，在現代戰爭上，如果沒有良好的交通設備，則動員集中及軍需補給，均不能迅速，雖有精多兵質，因關山遠阻，不能應時作戰，就是對於某戰場某戰線的救援，亦不能應時到達。德國

國防科學家班斯氏說：「戰爭本為敵對國家集中武力，變為動作，所以戰爭在最高程度上言之，實為一交通問題」。然為使交通適應戰時的需要，則須實行交通統籌政策，即一面統籌物資的交通，另一面統籌交通工具，使一切都在國家機構的支配管理之下，以使軍事之行動。

中國今後的戰時交通問題，應特別注意國際交通線問題。因為在今日的世界，任何國家都不能如中世紀一樣的經營鎖國經濟，尤其在產業未發達的我國，更要注意國際交通線的開闢與維護，以便戰時輸入為我所無的一切物資。惟當我海岸線被敵封鎖，陸上交通又梗阻時，則以發展空中交通為急務。以下我僅就鐵路公路而論：

自鐵路發明以至第一次歐戰為止的戰爭，叫做「鐵路戰爭」的時代。因為在這個時代軍隊的運輸，是以鐵路為主的。毛奇將軍是運用鐵路的一個大戰略家，他在作戰的時候，常用一張歐洲鐵路地圖為指揮的根據，他所以能夠以六個禮拜解決了普奧問題，兩個月進入巴黎，完成德國速戰速決主義，實得力於鐵路的運用。所以他認為「建造鐵路，比砲台格外重要」。反觀我國此次抗戰得助於鐵路亦不鮮，像粵漢路、湘桂路，迄今仍表演着重大的作用。數年來，當我長沙韶關每瀕於危急的時候，我軍都得鐵路的利用來作適時的救援，便促成每次所謂「湘北大捷」和「粵北大捷」。

在「世界第二次大戰的戰備問題」一書上有說：「在備戰的整個系統中，運輸問題佔了很重」

要的地位，第一是鐵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證明了鐵路在現代戰爭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幾乎每一次的大戰爭無不利用鐵路，不同的僅是程度的差別。顯然的，如路鐵果有沒，像總動員、兵力集中這一類重要的任務，便無從執行，輸送各種軍需品以補足軍隊的需要，在鐵路交通方面也該有相當的準備，使其能夠不間斷的工作，這就是說，當鐵路為敵人破壞了之後，應該很快的恢復工作」。此又可見鐵路在戰時的重要性。

國父自辛亥革命成功之後，目視中國交通的落後，又認為交通上最要緊的是鐵路，所以於辭去臨時大總統之後便專任全國鐵路總辦職務，決致力於全國鐵路網的興築，以發展中國實業。後值歐戰方息，又擬借外資建築十萬英里鐵路，計分（一）中央鐵路系統，（二）東南鐵路系統，（三）東北鐵路系統，（四）擴張西北鐵路系統，（五）高原鐵路系統，及（六）創立機關車、客貨車、製造廠（見實業計劃），這真是一個大規模的鐵路興築計劃。

可是國父的倡導興築鐵路，並非單純為發展中國實業，同時亦為鞏固國防及供軍事上之用。民元國民黨宣言上：「急辦國有鐵道：鐵道建築與實業固有莫大之關係，而於軍事上國際上亦屬重要之應酌量現狀，審其緩急，急辦國有鐵道」，在道路為建設着手之第一端的演講詞上說：「況以國防而言，以政治而言，以文化而言，鐵路皆有極大之關係。現在以國防不固，俄在北滿，蒙古進行，日本在南滿洲進行，英國在西藏進行。我國兵力若能保護邊圍，斷無此等事實。然

環國果無兵乎？則何以籌借外債。遣散軍隊？既遣散軍隊，人人皆知兵少，然用兵之處，則併一兵而無之，此何故哉？此即交通不便之故。又如現在俄國政府建議由恰克圖修至張家口一條鐵路，籌議已久，轉眼即見事實。試問俄國政府向我提議之後，我政府何以應付？將推之乎？抑承認之乎？我若及早自修，俄政府即無所藉口，而可以保全我之領土。且聞我政府提出此意後，法國資本家皆欲附股，將來籌款必易。我國若能趁此自修，法資本家必投資於我，此必然之勢。至慮將來資本家壓制勞動社會，此所不必過慮。鄙人之鐵路計劃，係預定四十年後，由國家贖回，仍爲國有。不過開辦之時，由民間與外國借款。政府每年，仍可得利，鐵路公司，並不能專利壟斷，如美國之有鋼鐵大王，及鐵路大王等名目；至於以保全領土而論此事，尤不可緩。東三省非我之完全領土乎？現在何以入於日入於俄？此無他，即因俄有東清鐵路，日有南滿鐵路故也。在中國之貧弱必自擴充鐵路始的演講詞上說：『至強國一節，譬如中國有二百萬兵，分佈二十餘省，平均每省不過十萬人，以三十萬兵，即可以衛我而有餘，蓋人以三十萬兵敵十萬，非敵二百萬也，其勢可斷言矣。且交通不便，則運兵遲鈍，俱不能速，及其到時，則大事去矣，故名爲有兵二百萬，與無兵同，若助以鐵路交通，有兵百萬已足。蓋運輸便利，不過數日可到，分之雖少，合之則多，以百萬敵三十萬，加以主客異勢，靡不勝矣。故鄙人以爲欲謀強國，亦必自擴充鐵路始也』。

可是，在國父這鐵路計劃未完成前，中日戰爭，便忽然爆發了。在這次抗戰中，我們所有的鐵路，雖比國父當時已增加若干幹線、若干英里，（現有三萬三千英里），但仍感到內地鐵路的不夠應用，如黔桂、黔滇、川黔，又從重慶到成都，從成都到西安，從西安到蘭州等路線，亟待完成。並且根據這次抗戰的經驗與教訓，當我國防力量未充實以前，今後對於鐵路的建築應以內地（豫定的戰時首都）為輻輳點，而向外擴展，切不可把輻輳點置於沿海邊境，（即暫不可發展沿海邊境的路線），以利敵人的內侵。惟足為我戰時之助的國際交通線，而對於敵國進兵的邊疆則應另有建築計劃。至於鐵軌的廣狹，尤宜全國一致，但對於假想敵國的運輸，則須絕對避免廣狹相同，軍用的門窗和車輛的長短寬度，亦須以便利各種兵器的運輸為原則。

其次，國父對於公路的建築，在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上曾規定有「修造路」一事，在實業計劃上亦訂定有「碎石路一百萬英里」的計劃（現有十六萬英里），英人溫特格漢近著「二次大戰新戰術」一書說：「有時候戰爭的變化，與交通上、工業上的變化是平行的。比方有一個時期，軍需的供給以及軍隊的調動，完全是靠陸路或海洋的。其後又有一個時期，便全靠鐵路運兵，這叫做鐵路的戰爭。現在我們更有摩托化的戰爭，那就是無論軍隊裏的任何供給及運輸，都完全依靠摩托機械。不明瞭這樣變化的，便是一種致命傷的錯誤。在一九四〇年五月間，有些法國的軍官判斷：德國不能從色當突破法國的主力線，因為那地區很少鐵路；後來事實證明：德國的軍

除正從此地侵入法國。在色當及麥茲的主力線爲德國突破之後，有些法國人非常奇怪，其實是他們尚未明瞭摩托化戰爭已代替了鐵路戰爭。這是說由於機械化部隊的使用，已使「鐵路戰爭」發展爲「公路戰爭」，亦可見 國父早已着眼於摩托化戰爭了。不過在我機械化部隊未擴張以前，對於公路的需線點，亦應同鐵路一樣的位置於內地，首先在內地完成適於普通軍用的公路網，將來尤要完成適於機械化部隊使用的公路網，那麼對於原有的公路（如寬度、路面、橋樑等多未適於機械化部隊的行動），就要逐步改進，對於應開闢的路線，就要逐步興築。更進一步，完成適於飛機起落的公路——「線的飛機場」，以供空軍利用。

總之，在經濟戰爭上，其勝敗的關鍵，全繫於國內經濟基礎的鞏固與否？故應積極發展本國的財政、工業、農業、交通及其他一切經濟事業，已如上述。此外關於對敵經濟作戰，在「顧炎武」中，我發現他提出三大方式：一爲經濟封鎖，一爲經濟不合作，一爲經濟絕交（均見「民主論」）。臺灣作戰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海軍封鎖，即直接封鎖敵國的海洋交通，以斷絕其對外貿易關係，但須有強大的海軍來執行。上次歐戰開始之後，英國即以海軍主力控置北海，封鎖了斯丹的那種亞半島，使貨物不能經過荷蘭、丹麥與挪威輸入德國，舉凡是否戰時違禁品，只要是戰時必需的，或德國輸出的，都被沒收，使德國經濟起了極度恐慌。同時德國對協約國，尤其是英國，也施以經濟封鎖的報復，但因德國海軍力量不夠，不能同英國一樣的作水上封鎖，只是實行經

水封鎖，即以潛水艇封鎖英國，使英國亦受很大的痛苦。到了這次歐戰，英國對德又以強大的海軍做水洩不通般的封鎖着德國，德國亦用潛水艇襲擊英輪，同時雙方又採用各種方法來破壞敵方的封鎖，例如德國利用西班牙的中立地位轉運由美洲輸入物資，英國實行武裝護航，以防襲擊敵方的襲擊。說到我國此次抗戰，以我海軍力弱，封鎖未能實施經濟封鎖，反被其封鎖我全部海岸，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唯有請求反封鎖的對策了，除開關西北和西南的國際交通線，以供對外貿易外，就是爭取物資，即突破敵人封鎖線，或賄賂敵人以輸入必要的物資，及嚴禁我必要的物資資敵。其次，關於經濟不合作與經濟絕交，根據這次抗戰的經驗，應在敵的佔領區內秘密指導我民衆，作大規模的展開，使敵的開發建設計劃無從進行，即依武力而作經濟的剝削，無法實現。至於組織經濟游擊隊派入敵佔領區內，破壞其掠奪式的經濟實施，以粉碎敵人「以戰養戰」的陰謀，同時又派遣空軍川流不息的轟炸其經濟設施，以至敵國的經濟中心，均爲重要的經濟作戰方式。在今後的革命戰爭中，我們應展開經濟作戰，制敵死命！

參考資料：根據一九三九年美國世界年鑑之調查：歐洲公路共三・四〇〇・〇〇〇英里，其中蘇聯佔一・七〇〇・〇〇〇英里，德國二一七，〇〇〇英里，英國二七八・〇〇〇英里。亞洲方面一・一〇〇・〇〇〇英里，日本佔五九五・〇

〇〇英里，荷印二二五・三〇〇英里，中國（略）。關於鐵路，全世界約達
六〇〇・〇〇〇英里，美國二三八・五三九英里，蘇聯五二・四二五英里，
德國四一・七一八英里，英國二〇・一二一英里，日本一三・五六〇英里。

八·戰爭與宣傳

思想是宣傳與戰爭的合流，像商賈所戰「甘誓」，「湯誓」及「泰誓」，如果不是後人偽造的話，那戰爭便使用文字宣傳，早已開始於數千年之前。本來中國是世界上一個首先發明「攻心奪上」之思想戰術國家，像孫子兵法上所說的「內間」、「反間」，都是思想戰的角色，他們的任務是這箇中心，搖搖離間，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漢高祖包圍項羽於垓下時，令軍皆作楚歌，以發楚軍的鬥志，項羽聞之亦大落失色，遂演成烏江自殺的慘劇。諸葛孔明平南蠻時，探得烏蠻提供的「攻心」戰術，對孟獲七擒而七縱之，使其心服不敢復反，因以造成北伐得無後顧之憂，這都是歷史上思想戰的顯例。此後，像唐駱賓王的討武后檄，石開的討清檄，洪秀全的尋神教及布告天下檄，都是千古名文，字字句句如電如磁，至今讀之，猶足令人震起！

在歐洲方面，關於思想戰的歷史，據彭熙(Burns)氏說：「自有印刷術發明以來，各國爲取得真諦對本國的有利。用印刷的戰爭。是和武力戰爭並行着。腓特烈大王於亞勒西亞之戰，先發宣言。然後開戰。拿破崙對於思想戰更爲注意。曾說過：「一個新聞社的力量，勝於一個師團的兵力」。

自由戰爭，同盟國設置印刷所於戰地，用以印刷發行戰地新聞。

但思想戰的起了刻期的發展，卻是上次歐戰期間的事情。在那次大戰中，協約國與同盟國互相報復以思想戰，尤以協約國方面爲大槓，不斷地針對着德國的弱點作巧妙而猛烈的進攻。於此，我們應知道的：德國上次歐戰的戰爭指導原理，是克勞塞維茲氏的「戰爭論」，這一部書實爲兵學聖典，尤以克氏的學生毛奇將軍運用它的原理原則，一戰勝丹，再戰勝奧，三戰勝法之後，更爲世人所崇拜。但在今日看來，它只是一部武力戰的書，並不是將武力戰、政治戰、經濟戰、思想戰溶於一爐的全體性戰爭的書（按克氏雖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注意到外交的作用，但他卻未提及內政應如何配合戰爭的方式，更未詳言對敵國應如何進行經濟戰，思想戰，他僅是詳論武力戰而已）。德國軍人受了這一書的熏陶，應用於上次歐戰，自開戰後，屢戰屢勝，始終未使協約軍進入德境一步，但因德略於經濟戰，思想戰，遂致人心動搖，革命爆發，終爲協約國所屈服了。魯登道夫將軍接受了這個失敗的教訓，並清算了克氏的理論，於一九三五年發表的「全歐戰爭」，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兵學傑作，成爲德國現代戰爭思想的主流，希特勒受其影響，在這次歐戰中，一變上次歐戰的作風，特設一個大規模的宣傳部，用戈培爾博士爲部長。希氏且放言：「我們的戰略，要從內心摧毀敵人，讓他們自己征服自己，精神的混亂，情緒的衝突，躊躇不決，突如其來，這些都是我們的武器」。雖說他是爲侵略而用思想戰，卻可見思想戰的重要性，不

過我們還要認識的，這個「不用武器」的思想戰，在戰爭的進行中，確有它的重要性，但如果真靠它的優勢，而沒有陸海空軍的維持，亦不能戰勝敵人。即它的本身不是獨立地可以擊退敵人，及保衛自己領土和人民的安全。並且它的對手——反宣傳，還得設法來打破。

國父致力革命運動，自然不會忽了祖傳「攻心爲上」的思想戰，他認爲思想戰與武力戰、政治戰、經濟戰有併用的必要，故自中法戰爭之後，一經決定「傾獨清廷，創建民國」之志，便「以學堂爲鼓吹之地」，此後更以集體的力量，擴大宣傳，其對象是滿清，是國內同胞，海外僑胞及國際人士。在瓦解滿清的內部，喚醒國內同胞海外華僑，及取得國際人士的同情和援助。國父在中國革命史一文上關於宣傳的經過說：「余於乙未舉事廣州，不幸而敗，後數年，始命陳少白創中國報於香港，以鼓吹革命，庚子以後，革命宣傳驟盛，東京則有賤元成、沈軒齋、張溥泉等，發起國民報，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主張革命，鄒容之革命軍，章太炎之驅康有爲書，尤爲傳誦，國內外出版物爲革命之鼓吹者，指不勝屈。人心士氣，於以丕變。及同盟會成立，命胡漢民、汪精衛、陳天華等，撰述民報，章太炎既出獄，復延入焉。民報成立，一方爲同盟會之喉舌，以宣傳正義，一方則力圖當時保皇黨勸告開明專制要求立憲之謬說，使革命主義，如日中天。由是各處支部，以同一目的，發行雜誌日報書籍，且以小冊子秘密輸送於內地，以傳播思想，學校之內，市肆之間，爭相傳寫，清廷雖有嚴禁，未知之何」。至於當時宣

傳的方針，不外是同盟會宣言上所揭櫫的「一、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二、建立民國，三、平均地權」。及民報上所標明的六大主義：「一、顛覆現今惡劣政府，二、建設共和政體，三、維持世界之真正和平，四、土地國有，五、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結合，六、要求世界列強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國父於此次革命成功之後，民元在北平報界歡迎會上演講說：「今日袁報界諸君歡迎，甚幸！此次中國革命（指辛亥革命——浴日註）數日成功，皆報界鼓吹之力」。鄒韜「中國國民黨史稿」上亦說：「其時不特各地本黨報紙，極力為革命宣傳，即非本黨之報紙，亦助之。遂使清廷，岫木皆兵，不百日而民國告成。說者謂革命成功，革命軍隊之力半，報紙宣傳之力半，信不誣也」。

自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國父於每次發動討賊戰爭，亦莫不配合以「名正言順」的思想戰。

尤其受到歐洲大戰及蘇聯革命的思想戰的影響後，更特別注意宣傳工作，三民主義的自序上說：「茲值國民黨改組，同志決心從事攻心的奮鬥，亟需三民主義的奧義，五種憲法的要旨為宣傳之寶，故須每星期演講一次，由黃昌毅君筆記之，由鄒魯君讀校之，今民族主義適已講完，特此印行本，以銷同志。……尙望諸同志讀者，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使成爲一完善之書，以作宣傳之原本，則其造福於吾民族吾國家，誠未可限量也」。在民族主義上又指册：「這次國民黨所用救國方法，是注重宣傳，要對國人做普遍的宣傳」，不特說，本黨的宣傳

經典，就是三民主義，亦即本黨攻心的武器。

國父是一個思想戰家，也是一個天才演說家，他能出口成章，不假預備，連講二三小時，毫無倦容，並能把握對方心理，使聽者深受感動，至於議論精闢，尤其餘事。他在思想戰上發表關於宣傳的言論很多，現分爲三點述之如下：

一、宣傳
的效果

我們知道，一種作戰方式必有它的效果才會成立，而使用此方式者亦必求發揮其最大的效果。思想戰在上次歐戰中，算是發揮最大的效果了，今日我們讀魯登道夫將軍的「全體戰爭」一書，便可見他指出協約國收獲宣傳效果之大，而德國因缺乏一種强有力的宣傳武器，致遭失敗。國父從思想戰的實踐中所得的效

果至大，他對思想戰的效果的認識亦至深，他說：「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宣傳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國民黨奮鬥之法宜衆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又說：「國內外爲爭開國民會議，打內電報有幾千幾萬張，這種和平的爭法，好過用武力的幾千兵幾萬兵（見學生須贊成國民會議演講詞）」。數日前，有北京貴同業某君見訪，於致賀廣州勝利之後，慨然謂筆墨之力，終不如槍礮之靈。實則依鄙人所見，筆墨之力，確實偉大。此次廣東之事，看來似是槍礮之功，實則筆墨之效，大不可沒。纏繞述之，事殊神妙。陳炯明之在廣州，干涉言論，無所不至，廣州報紙在暴力之下，固不敢有所主張，即香港新聞紙亦以許多關礙不克自由發揮。然而香港有畫家歐

人，病心於陳氏之作惡，相約以其擅長之藝術，描摹陳氏之罪惡，繪影繪聲，栩栩若活，市民爭相購買，或用作廣告，或代裝飾，有聚而圍觀者，有相與品題者，數月以來，已成香港之流行品，而討論之觀念，深入人心。雖陳家將到香港者，鑑於街談巷議及家懸戶牖之情形，亦悚然於人心之既去。且滇軍發難，一戰而下廣州，迫陳炯明退惠州，所部猶不下一萬餘眾，乃通電獨立，或宣^其離關係者，即其平日認為心腹手足之士卒，致欲負隅反攻而不解，香港畫報平日之浸潤感化，蓋深有力焉。吾人今日固不能抹殺彼討陳諸將士之功，然筆墨之權威，要亦不可否認。今茲粵中之事，二十日而解決，前十日可謂槍炮之勳勞，後十日實筆墨奮鬥之效果也」（發揮筆墨之權威以與軍閥搏戰演講詞）。再又說：「本黨此次改組，乃以俄國為模範，企圖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黨員協同軍隊來奮鬥。俄國以此能抵抗列強之侵迫。其時正當俄國革命初成功，而俄黨人竟能戰勝之，其原因則由黨員能為主義而奮鬥。吾人由反對俄國各報紙所得之事實，則英兵由北冰洋上陸時，俄兵不加抵抗，自行引退，留下種種印刷品，問其何故來打俄國，列強既與德國和好，何以今日再有征俄之舉，各國兵士，當時以為往俄與德兵戰，不知為與俄民戰也，以此實諸上官，上官無詞以對，兵士遂即行引退，或激成兵變，此全由俄黨員不僅能感化本國人，而且能以主義感化外兵，日本兵隊之開往西伯利亞，亦同被感動，此俄黨人為主義奮鬥的結果」（宣^其傳主義之重要演講詞）。再又說：「廣東以後把四境肅清了，或者要休息兩三個月，在這兩三個

月中，我們必須做宣傳的工夫，讓這幾十萬兵，都明白我們何以要革命的主義，個個明白了主義之後，他們的精神自然同七十二烈士一樣，他們的能力，必定同七十二烈士一樣，出去打仗，便有勝無敗，便可征服吳佩孚，否則吳佩孚的兵，便沒有分別。吳佩孚的錢多彈多，我們怎麼可以征服他呢？兵家說：「攻心爲上，攻城爲下」。能攻敵人之心，就是沒有鐵，沒有彈，也可以打勝仗，也可以統一中國。所以我們要把這些軍隊都做成一種革命軍，翻到處人民都歡迎，像古人所說的：「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仁者無敵於天下」，那才算是冤枉了這幾十萬兵」（見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演講詞）。雖然宣傳的效果是這麼大，但在未實施之前，如果沒有正確的科學診斷和適當的科學試驗法來先試驗一下它的效果，必將宣告它的失敗。即是說像坐在辦公廳裏辦「等因奉此」一樣的辦宣傳，只是敷衍塞責，不問有否效果，那有成功之理。所以我們不可輕視宣傳的效果，但亦不可僥倖取得宣傳的效果。我們要把科學應用於宣傳上才能爭取宣傳的效果。

二、宣傳
的原則

宣傳的原則，是思想戰的根基，有了原則，然後一切宣傳工具，宣傳材料與宣傳技術，都得根據原則而妥爲配合，藉收偉效。義利情實爲最合理最切實的宣傳原則，如果運用得宜，實可以達到「攻心必勝」的目的。國父於此提示我們說：「惟動運之方面，必隨時而變，先當動之以大義，不成矣，必再動之以大利。」

據此兩方法，兄弟必已試之而無疑。然更有一法，則當勸之以猜諷。……用此為遊說之具，或比二者為尤有力也。（致謝等如書）。其次要順從對方的性格，因為每一人有每一人的性格，每一羣人有每一羣人的性格，每一國人有每一國人的性格，不可以主觀為出發點，必須適應對方的性格而措詞而發言，但卻以明瞭對方的性格及思想行動為先決條件。聖父於此提示我們說：「對於毫無智識的，給他一個智識是容易對於號稱有知識的教他判別是非利害，倒是很難。我們在這種時候，既然立了一個主義，要做指導社會的工夫，最要緊的，就是不可先拿我們的知識，整個的放上去，以為這件事，我已經明白了，他為什麼不明白，兩次說不明白，便生了氣，這是不行的。我們要曉得，羣衆的知識是很低的，要教訓羣衆，指導羣衆，或是教訓指導知識很低的人，最要緊要替他們打算，不可一味拿自己做標本。證據的去做工夫，方才有趣味，方才得到研究的樂趣，方才能夠感化多數的人。你看教馬的人，他怎樣能夠把馬教會的？就是他在教馬的時候，他自己的意識已經先變了馬，他不是先要懂得他的意思，他是自己先要懂得馬的意思，教馬的人在馬的面前，是一點也用不得人的智慧的，如果要用人人的智慧，一定要和馬打起架來。你又看那教獅獅的人，他也是要就獅獅的性去教獅獅，不是要就人的性格去教獅獅。因為在我們看來，英國是這樣，俄國是這樣，德國是這樣，拿許多的榜樣做材料，就歸納到中國應該怎樣的本題，成一個主張，但是那多數的人，他卻是不懂的，所以我們要指導多數人，是先要把自己的知識學問

收效較來，處處表顯他的性，來誇超他的自覺，然後得來的結果，方能夠圓滿，然後我們指導社會的目的，方能夠到達」（民八年六月與戴季陶談社會問題）。這些原則，在此次抗戰中，均可用爲對內對外及對敵宣傳的基本原則，惟尙待類類的引伸，妥爲配合。

三、宣傳人員的條件：

宣傳在歐美先進各國，早視爲一種專門學術，尤以戰時的宣傳，更分門別類來作科學的研究，以求能得心應手的運用，從德國現在「宣傳大學」的設立，更見宣傳是需要專才的了。國父對於宣傳人員的培養，向極注意，尤其自十三年本黨改組之後，更設立各種講習班，以爲訓練的機關。他認爲擔負宣傳工作的人員應具備的一般條件：第一要有誠心。國父說：「學問和口才本來是宣傳的方法，如果要能夠感動人，究竟以什麼爲最重要呢？……最要緊的，就是誠。古人說至誠感神，有至誠，就是學問少，口才拙，也能感動人，所以至誠有最大的力量。若是在宣傳的時候，沒有至誠的心思，便不能感化民衆。有至誠的心思，無論什麼人都能夠感動」（語言文字之奮鬥演講詞）。第二要有恆心。國父說：「諸君擔負宣傳的任務，應該有恆心，不可虎頭蛇尾，今日熱心奮鬥，明日便心灰意冷。因爲要人心悅誠服，不能一朝一夕，一言一動，能夠收效果的，必要把我們的主義，漸移默化，深入人心，那才算是效果，我們要能夠收到這種效果，便非諸君對於宣傳，做繼續的工夫不可。如果不能繼續做去，便是不明白革命的道理。假若真明白了革命道理，便有恆心。」

心。因爲革命是有目的的，要達到一定的目的，便不致中途廢止，我們一定要達到這種目的，那就是我們的志氣」（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可專注重軍事）。第三要明白主義及社會狀況；國父說：「黨員欲用其能力，出而感化他人，亦猶之軍人上陣戰爭，必明白其槍炮之效力，及其用法。黨員亦必須明白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內容如何，然後試用之出而宣傳，始生效力，始能感化他人也。槍炮能有效力者，因其能殺人，故大軍一動，敵人即服。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則與之相反，其效力爲生人，革命主義既以生人爲最終之目的，故必須週知敵人之情形，尤須明瞭士農工商之狀況。然對待此類人物，非可殺之也，實須生之。如何方可以生之，則須知其痛苦所在，提出方法，救陳主義，乃能克敵致果，此乃無敵之雄師，無人能抗之者，在乎我黨能善用之否耳。如遇農則說之以解脫痛苦之方法，則農必悅服，遇工遇商遇士各種人物亦然。然用何方法，用何力量，走向道路，則須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非對於已往及將來，乃對於現在造成良好國業者也。建國方法有二：一曰軍隊之力量，二曰主義之力量，……做革命奮鬥工夫，必須有方法，而方法必從訓練而來。古人云：「不教民戰，是爲棄之」。其言甚當也。黨人爲主義奮鬥亦然，然必須自己先受訓練，然後出而感化他人。故我黨人能起而救人，首須明白主義，明白社會狀況，然後人民乃能接受我黨主義也」（黨員須協同軍隊來奮鬥演講詞），此係就諸對內而言，至於對外就要明瞭敵人的弱點，及各種情況分析的標準。第四要懂得宣傳的方法：國父說：

「諸君所用的宣傳方法，就對人而論，應該由近及遠，先對父母兄弟姊妹和一切家人說明，再對親戚朋友和一般普通人說明，就措詞而論，所說的話，應該親切有味，要選擇人人所知道的材料」（見女子須明白三民主義演講詞）。這是宣傳人員必須具備的一般條件，自然尚須具備其他條件，這是依於所擔當的任務而定，例如辦理文字工作則須擅長文字，辦理藝術工作則須擅長藝術，至於此次對倭寇宣傳，就要懂得日語日文了。

再就宣傳材料而說，國父亦有遺囑指示：「搜集材料如軍隊打仗然，打過後必須補充子彈，今黨員用外宣傳，亦當如之，每星期到此補充材料，則宣傳事業自易着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本我之所倡始，所發明，其解釋須一依我之解釋，然後方不致誤解誤講，此處可稱為諸位之兵工廠，我則盡其力，供給材料，為宣傳軍士之武器也。」所以優勝的宣傳，必配合適當之材料，材料如果不適當，不但收效微薄，還要發生不良的反響，所以在材料上就要避免誇大、空疏、頹曲、矛盾等毛病。不特說，我方軍事上的勝利，及國際上的源源接濟，就是宣傳上的最有效的材料。

根據 國父以上的言論，足見宣傳效果的偉大，惟欲收此偉效，達到思想戰的成功，則須有合理的宣傳原則為根據，及優秀人員為之執行，已如上述。此外 國父關於對敵軍的宣傳說：「吾人當努力宣傳於一切軍隊中，使了然其自身之地位，變反動的兵力為革命的兵力」，這點，在現代的國際戰爭中，應視為「化敵國的軍隊為敵國的敵人」的新戰術。在上次歐戰中，德國基爾

運河的兵變，及各部隊的發生譁變與反戰，這也是由於協約國對德軍宣傳的效果。考當時協約國由飛機散發德軍的傳單，最多的時候，每天達百萬份，弄得興登堡將軍徒嘆莫奈何，說：「敵軍的砲彈不足畏，而敵機散發的紙彈則最可怕」。所以我們在此次抗戰中，亟應發揮這個新戰術的效能，其實施的工具，除利用畫報傳單外，尤應利用流動廣播電台與播音機，播音機的使用，係將其置於可能使敵軍聽到的地點，播音員在約五里以外的隱蔽處，對敵廣播，看敵軍的份子屬於日人或韓人，或台灣人，而用各種不同的語言。至流動廣播電台的使用，播音員可在播音射程內任何地點工作，惟播音時，敵軍或無收音機，或有而不許用，故我方須將收音機置於與敵軍接近地點，代敵收聽，使其自然地受到我方的宣傳。

其次說到思想戰與武力戰的作用雖不同，但在過程中，均足以互相影響的，即是說思想戰要有武力戰來撐持，武力戰要有思想戰來導致有利的形勢。國父在黨員不可存心做官發財的演講詞上有幾句話是：「我們國民黨，就是革命黨，革命的方法：有軍事的奮鬥，有宣傳的奮鬥，軍事奮鬥，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趕走一般軍閥官僚。宣傳的奮鬥，是改變不良的社會，感化人羣，要消滅那一般軍閥，軍事的奮鬥，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改造國家，還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羣的奮鬥，更甚重要。因為這個原因，諸君從今以後，便要盡力去宣傳，介紹國人加入本黨，在一年之中，不要做很多的事，祇要一個人感化十個人，介紹十個人入黨，我想

一個人介紹十個人，不是難事，再過一年二年以後，便是以十傳百，百傳千，推廣到全國，那就

是全國的人心，完全被本黨所感化，到了全國的人心，都歸化於本黨，就是本黨的革命大告成功

了。

在這次抗戰中，我們已充分接受 國父思想戰的遺訓了，所以「宣傳重于作戰的口號」，便成爲目下流行的口號，在這個口號之下，展開着大規模的思想戰，對內——提高民族意識，增強必勝必成的信念，對敵——摧毀敵軍的鬥志，助長敵國人民的反戰，對國際——爭取國際人士的同情，促成共同抗戰陣線的建立。惟今後仍要爭取主動和採取攻勢。因爲思想戰在短期戰中，未易發揮其作用，在長期戰中，由於彼此軍民對於戰勝信念的搖動，加以戰禍的蔓延，生活的困苦，及父母兄弟間殘酷的同情與援助，便愈顯得重要了。今日我們的抗戰，已入于長期狀態，這正是「宣傳奮鬥」的一大好機會，我們雖不敢說僅用思想戰便可取得戰爭決定性的勝利，卻確信它有促進戰爭勝利的偉大功能。我們不敢說一定能夠在思想戰史上添上空前絕後的一頁，卻應在思想戰史的園地裏，開出一朵美麗的花兒。

九·鐵的軍紀

「軍紀者，軍隊之命脈也，當戰時負有各種任務之大軍，聚衆廣大之戰場，其境遇所在不同，而上自將帥，下至士兵，猶能脈絡一貫，萬衆一心，從一定之方針，爲一致之行動者，厥爲軍紀是賴。軍紀之要素，則在服從，故全軍將士，當以服從長上，確信命令爲第二天性。」——「戰鬥綱要」第四條。

軍紀就是軍隊的紀律之謂，亦猶社會的規律，國家的「法律」。社會沒有規律則不成爲社會，國家沒有法律不成爲國家，自然軍隊沒有紀律也不成爲軍隊。軍隊是一種特殊的團體，對於國家社會負有莊嚴神聖的使命，惟其使命重大，自然需要極嚴密完備的紀律，來維持其生命，健全其本身。至於平時軍紀爲戰時軍紀的基礎，倘若平時軍紀不良，必致影響於戰時軍紀的維持，戰時軍紀如不能維持，則上下凌亂，各自爲謀，正如烏合之衆——忽聚忽散，亂飛亂墜的禽類之羣，以這樣的軍隊去打仗，縱有良好的命令，必無法執行，縱有必勝的戰略戰術，亦無從達成，唯有戰敗而已。戰敗，就是軍隊的覆滅，團體蕩滅、個人亦必不保，所以軍人的生命、榮譽、功業

是整平有組織的軍隊，惟有軍隊的生命、榮譽、功業能盡揚光大，則個人的亦隨而發揚光大。爲此，首在維持軍紀，則自每個人的遵守紀律始，如果個個軍人都不肯遵守紀律，則軍紀必致蕩然無存，而個人的一切也必隨軍隊的沒落而沒落了。說到紀律的遵守，固不容有口是心非，陽奉陰違，有始無終的行爲，亦無階級之分，彼此之別，及特殊的例外，上自統帥，下至士兵，均要一律遵守，尤其愈高的官長，愈要身體力行，以爲部下表率。法國卓萊氏說：「革命政府對革命軍之官長與兵卒，本真正共和之誠意，爲一視同仁之實情。費厚於兵卒，而首於官長，長官縱而兵卒不平矣，不平則鳴，如是或官兵相攻於部隊中，或軍隊攻政府，而軍紀壞矣，故欲保持軍紀，須賞罰公平也」。

古今中外的名將對於軍紀，莫不重視。尤其是戰時的軍紀，更視爲神聖不可侵犯，像穰苴之擊莊賈，晉文之斬顛頡，劉邦之斬丁公，孔明之斬馬謖，便是明顯的例證。至見於理論上，孫子列「法令執行」爲七計之一，又說：「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騶子，不可用也」。孫特別說：「余戰勝利，皆軍紀之賜也。然戰爭既久，軍紀稍弛緩矣。國家繁榮安靖，皆軍隊有紀律之故，羅馬人及高盧人之剛健，日耳曼民族之狡變，終能征服世界者，軍紀嚴肅之故也」。拿破崙說：「紀律肅嚴，乃從敗畷、殺傷、污辱中，救護軍隊者也。軍隊之污辱者，比死刑尤酷也」。魯登耳避夫說：「戰時軍紀較諸平時尤爲重要。在民族的生存之奮鬥中，對於違反

軍紀者，應用一種特殊法律，加以迅速嚴格之懲罰，否則，綱紀一廢，軍力亦不保矣」。

國父在革命戰爭中，對於軍紀尤爲重視。民權主義上說：「當軍人能夠犧牲自由，就應聽服從命令，忠心鞏固，使國家有自由。如果學生軍人要說自由，便像中國對待名詞，成爲放任放蕩，學校內便沒有校規，在軍隊內便沒有軍紀，在學校內不講校規，在軍隊內不講軍紀，那還能夠成爲學校號稱軍隊嗎？」共和與自由之真諦的演講詞上說：「在戰時爲軍人或官吏時，則非犧牲自由，絕對服從紀律，萬萬不可」。釋自由的演講詞上說：軍人與官吏，不過爲國家一種機關，爲全國人民辦事。所貴夫機關者，全在服從紀律，如機械然，百輪相錯，一絲不亂，而機械之行勳，乃發圓潤」。在黨員之奮鬥而於軍隊之奮鬥的演講詞上說：「軍隊在奮鬥的時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時不對，當士兵的都服從，照原命令去共同前進。若是能前進，或者將錯就錯，也能打勝仗。如果一部的軍隊用了命令不對，便單獨行動，以致牽動全軍，不能一鼓前進，弄到結果，不是首尾不能相顧，自亂陣線，便要被人各個擊破，全軍就要覆滅」。民十二在廣州農林試驗場宴請各軍官演說：「軍人之天職首重服從命令，抱定宗旨而行，幸勿爲朝秦暮楚，致受滅亡，如陳炯明昔爲民黨最輝煌之人物也，不期中途失節，足見反覆無常之人，終歸滅絕，吾人可爲殷鑒」。民十四對於善後會議之主張致段琪瑞的電說：「文則以爲會議之能收效與否？全視實力派能聽命於會議與否爲斷，設以巴黎會議言之，法國福煦將軍戰時統法國之兵不下四百餘

萬，協約國陸軍亦歸指揮，英國海克將軍統兵三百餘萬，美國巴星將軍統兵二百餘萬，其實力在國內洵無倫比，然一日戰爭平息，釋兵歸伍，對於和平會議絕無干與，其權限分明如此，故能大有造於國家」。這是說法美軍人的恪守軍紀，我國軍人亦應如是。其次於民元就任臨時大總統後曾頒布了一個整飭軍紀的命令：「頃據上海太晤士報載兩京之兵士現象，均係實情。該報向表同情於民國，今爲懇切之忠告，若不切實警戒約束，不惟貽笑外人，後患何堪設想！該報所載下級軍官及高級之官，終必同受其危險者，誠非過慮。爲此令仰陸軍部速即頒行軍令，責成各軍司令以下將校，切實奉行，以復各負其責任，並附譯該報所論之文，給與各軍將校傳閱。須知紀律嚴明，訓練有素，然後能保軍人之名譽，壯民國之干城，我僉陸軍隊，不乏愛國健兒，斷不容以少數不規則之行爲，致壞我軍人全體之名譽也，速將此令通知之！」於民十二年所頒的帥令：其一是：「……各部軍隊，着就現駐地點駐紮，自經規定以後，各部軍隊，非奉本大元帥命令，不得擅自行動，致滋紛擾。該總司令等（指楊希閔，劉震寰等——浴日註），務各督率所部申明紀律，保衛地方，以期無負本大元帥撫兵恤民之至意！」其二是：「近日查各師旅部有緝獲奸細，即自行處決，市內乘廣大場之中，而竟然陳屍數日者，殊於文明人道，大相違背，着該總司令嚴行禁止各師旅部自行處決人犯，所獲奸細，務令解至司令官辦理之。又查各處之有無兵而竊用某某司令等名目，以招搖籌募者，着該司令嚴行拿辦」。其三是：「茲有不法之徒，專投入各軍隊，竊

有軍章爲證符，無惡不作，致人民與軍隊日生惡感，此與大元帥，救國愛民之旨，大相違背。今特派大本營偵探長李天德嚴爲偵察，如查得該匪徒之機關所在，即行報告衛戍總司令部總兵司令都並公安局協同緝拿嚴究」：此外定爲條文的有：

一、倒清
時代的
反紀：

計開：

- 一 不聽號令者殺。
- 二 反好者殺。

三 降敵被獲者殺。

四 私通軍情於敵者殺。

五 洩漏軍情者殺。

六 臨陣退縮者殺。

七 臨陣逃潰者殺。

八 造謠者殺。

九 私逃者殺。

十 任意擄掠者殺。

紀 軍 的 錄

- 十一 強姦婦女者殺。
- 十二 突殺良民者殺。
- 十三 殺外國人焚折教堂者殺。
- 十四 勒索強買者，論情抵罪。
- 十五 私鬥受傷者，論情抵罪。
- 十六 遺失軍械資糧者，論情抵罪。
- 十七 竊敵軍資糧軍械，藏匿不報者罰。
- 十八 私入良民家宅者罰。
- 十九 盜竊者罰。
- 二十 賭博者罰。
- 廿一 吃鴉片者罰。
- 廿二 縱酒行兇者罰。

二、倒袁

時代的

軍紀：

亦極嚴肅。計開：

- 一 不聽總令者槍斃。
- 國父在中華革命黨時代爲打倒袁逆世凱，而約束將士，所頒佈的「軍律」，

鐵 的 軍 紀

- 二 隨陣退縮者槍斃。
- 三 洩漏軍情者槍斃。
- 四 私逃者槍斃。
- 五 反奸者槍斃。
- 六 搶掠者槍斃。
- 七 焚殺良民者槍斃。
- 八 強奸或強佔婦女者槍斃。
- 九 收受賄賂，勒索資財者槍斃。
- 十 尋仇報復，捏詞誣陷者槍斃。
- 十一 擅用私刑，擅捕良民者槍斃。
- 十二 結伴持械互鬥者槍斃。
- 十三 捏報名額，虛領餉項者槍斃。
- 十四 殺害外國人，焚拆教堂學校醫院者槍斃。
- 十五 造謠者槍斃。
- 十六 販賣人口，或擄人勒贖者槍斃。

- 十七 強買強賣者禁錮。
- 十八 鬥毆傷殺者禁錮。
- 十九 遺失或浪費軍械彈藥者禁錮。
- 二十 虜獲敵軍資軍械物品，藏匿不報，私行售賣者禁錮。
- 廿一 私人良民家宅者禁錮。
- 廿二 賭博或開設包庇者禁錮。
- 廿三 吸食鴉片煙開設包庇鴉片煙局者禁錮。
- 廿四 縱酒行兇滋事者禁錮。
- 廿五 淫穢娼寮賭館者禁錮。

上述的軍紀真是秋霜一掃的嚴肅，也許 國父是根據孫子所說：「施無政之令」的原則而訂定的吧！亦唯如是才能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武力爲國民之武力」。否則弁髦軍紀，恣意擾民，弄成兵匪不分，那就不是國民的武力，革命的武力，國家的武力，簡直變爲軍閥的武力了。但是嚴肅的軍紀會使官兵的精神，陷於機械呆板，且有時而窮，正如古人說：「徒法不足以自行」。故必須變成全體官兵均能活潑地從內心上自勵遵守紀律，才算是最進步的軍紀，亦即軍紀的真精神。蔣百里先生說：「近代戰爭要人自爲戰，並且每個人都要由內心的自覺來遵守紀律

，這才是近代最進步最高的軍紀」。又說：「現在軍事上由於兵學革命，紀律非出於自動不可，比方現代戰爭，一個連長在戰場上無法可以照顧全連人，所以連長在平時要教導士兵，到了戰場，在戰場上能照他所講的自動去做，這算是一個好連長。空軍的紀律尤其要出於自動，倘使飛行人員不能自動的遵守紀律，司令官要他去担任某種任務，他卻駕了飛機在天空亂飛一陣回來，至於是否達到任務，司令官耳目不能看到，自然不得而知，所以我說空軍的紀律，必要出於自動，才算是一個現代的空軍戰鬥員」。(註一)

但怎樣才能夠養成全體官兵有遵守紀律的自動精神呢？唯一法門就是統一全體官兵的主義信仰，即對於三民主義都有深切的信仰。因為三民主義是軍紀的根源，是軍紀的中心，倘若全體官兵於任何時都決志為三民主義而奮鬥，為三民主義而犧牲，則他們便可以自覺自動的遵守紀律，而紀律也就可以自然地得到維持，戰則必勝。國父在革命軍不可存心升官發財的演講詞上昭示我們說：「要大家為三民主義去奮鬥，變成革命軍，便是要大家為三民主義變成敢死隊。為什麼要大家為三民主義變成敢死隊呢？因為三民主義去奮鬥，就是死了，也是成仁取義，所謂「仁義之師」這種死法，是為主義而死，不是為金錢而死」。又在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的演講詞上說：「如果我們的士兵，都知道革命主義，便變成革命軍，如果變成了革命軍，便可替革命主義去犧牲，以一當百，百當萬，同心協力去定中國。……他們明白了主義之後，他們的精神，自然

同七十二烈士一樣，他們的能力，必同俄國的兵士一樣，出去打仗，便有勝無敗，便可征服吳佩孚。當然這種的軍隊，是自動地恪守紀律的軍隊，也是說明三民主義是軍紀的根源，軍紀的中小心了。

(註二)見蔣百里：「兵學革命與紀律進化」演講詞。

十·戰略戰術

戰略與戰術的關係，正如母子一樣，戰術依存於戰略，又隨戰略所指示的方針而行動，戰術的結果足以影響戰略的成敗；戰略的正確與否亦足以影響戰術的結果。至於戰略戰術的定義，幾乎每一個兵學家都有他的界說：蘇米尼說：「戰略係在地圖上作戰，對戰爭全局打算的方術；戰術係在戰場上直接指揮一部的方術」。克勞塞維茲說：「戰術為一戰鬥間使用戰鬥力的學術，戰路係用多數戰鬥以達到戰爭目的的學術」。毛奇說：「戰略係在地圖上運用理想，決定方針，統率全軍以行作戰的方術；戰術係在實地的戰場，指揮一部份軍隊，以行作戰的方式」。哥爾茲說：「戰略係指揮全軍之術，戰術係指揮一部份軍隊之術」。這都足供我們對於戰略戰術意義的瞭解。以下我且進而述 國父的戰略戰術。

現在我們根據 國父的言行來研究他的戰略戰術，可以說他在國內的革命戰爭中所採取的戰略是攻勢的，即「戰略攻勢」，在對外的革命戰爭上所主張的是守勢，即「戰略守勢」，但決不是永遠採取守勢的，固然這是基於戰略的要求。至於戰術則以採取攻擊為主，即「戰術攻勢」。

我且先論他的戰略。

一、戰略
方面：

國父在對內對軍、對黨中，所採取的戰略，像民元以前的進攻消滅，可以說
是攻勢的，民元的鎮師北伐，是採取攻勢，民十一、十三的兩次北伐以及歷次的
討賊軍事，也是採取攻勢，即以精神力比敵處於優勢的革命軍（自然人以武器比
敵處於劣勢），作連續的進攻，求敵而包圍殲滅之。「雖說敵目上的優勢，寫在
何企圖勝利者所不容忽視的原則，但敵目較少的一方，仍有進攻並擊敗敵人的可能。在這種情形
之下，優勢之所在，或為指揮人力物力較少者之智力，或為將士用命」，（註一）可作為國
父這個戰略的註腳。見於遺教上有：

一、民元佈告全國同胞書說：「凡我各省軍民代表同心戮力，率眾前驅，救垂暮一牛護犢之
行，守呂端大事不糊塗之旨，運籌宜決而統，用兵貴得而速，自能喚平燕雲，復仇報國，直抵黃
龍府，與同胞清飲策勳」。

二、民四發表討袁宣言說：「一旦發難起呼，轟動天地，當以秦楚一軍，出關北指，出楚一
軍，規劃中原，閩粵旌旗橫掃，合齊魯以據京左，三軍既與，我將與諸君子，扼揚子江口，定蘇
浙，斷東北之敵，犁庭掃穴，共製國賊，期可指日待焉」。

三、民六護法之役電慰粵軍總司令暨全體將領說：「若事撥病瘼風地，地絕江漢之形勢

南與滇、黔、川、湘、桂軍互爲擊援，合力並進，以成腹背夾攻之勢，則必勝之算，操自我手。若復東取武漢，斷敵歸路而西南大兵，密擊於前，更使逆軍西馬變輪不返，前此失在姑息，除暴未盡，以致奸人迭出，變亂頻仍，今茲務定澄本清源之策，爲一勞永逸之計。

四、民十一討陳電孫陳護黃說：「分路進兵，以期破賊」。

五、民十三關於討陳及北伐致蔣介石弟在簡信，其一說：「望兄鼓勵各人速出，一由東江擊破逆逆而出羅建，一出江西逼川湘各軍必先而出武漢，而中原可爲我有，否則不論奉直誰勝，西南必亡，際此之時，龍運則存，不運則亡，必然之理也」。其二說：「江西得後，則湖南不成問題，然後再會漢唐、川黔、黔袁會師武漢，以觀中原，曹吳不足平也」。於此可見「國父亦師承了拿破崙「分道合擊」的戰略原則。此外，他亦師承了我國古代兵法所謂「先發制人」的原則，因爲欲採取攻勢，其動作必須先發制人，爭取戰爭最初的勝利，由最初的勝利，而發展爲整個的勝利。見孫文談說上說：「余倡議討袁，借降方志同以持重，不敢先發制人，致遭失敗」。又見陳英士致黃克強的信說：「中山先生在其時，適歸滬上，知袁氏將發尊儲之死灰而負民國之付託也，於誓必去之，所定計劃，厥有兩端。……二曰速戰：中山先生以爲袁氏手握大權，發號施令，調兵遣將，行動極稱自由，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迅雷不及掩耳，先發始足制人。且聞宋案證據既已確鑿，人心激怒，民氣憤張，正可及時利用，否則時一經即逝，後悔終晚無及」。

，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但是戰略攻勢的採取，並不限於革命者或侵略者，革命者爲完成他的革命目的必採取攻勢，侵略者爲完成他的侵略目的，亦必採取攻勢。此次歐戰中，德國的閃擊戰，隨各國是採取攻勢，日本此次的發動太平洋戰爭亦是採取攻勢，因此，他們都是先發制人，施以猛烈的閃擊。於此我要引伸的，攻勢與守勢，並不是尖銳地對立的，反之，它們卻是不斷地互相輪流，雖說「較強的一方恆採取攻勢，較弱的一方恆採取守勢」，但在某種情形之下，攻勢會變成守勢，守勢也會變成攻勢。不過在攻擊的一方未達目標而轉入守勢時，卻會給防守的一方以反攻機會。使防守的一方，於力求保全己方人力物力，和對方實力在攻擊中消耗之後，終獲決勝的機會，而取得勝利。所以我們可以說，攻勢固可以取得勝利，守勢也可以取得勝利，正如毛奇所說：攻勢是「到達目標的直路」，守勢則是「兜着很大的圈子」。

其次，關於對外抗戰的戰略，墨父是主張採取守勢的，亦即持久戰略，消耗戰略。因爲敵人的來倭，施行攻勢作戰，利在包圍殲滅，速戰速決，而我國軍力比敵劣勢，自然要施行守勢作戰以禦之。但墨父的所謂守，決不是絕對的「守」，永遠的「守」，是以反攻爲最後目標的「守」，因爲戰勝是取決於攻擊的。克勞塞維慈說：「凡自備是寡弱的，不得不先與守勢，但守勢的結果，不過歸於消極。若守者之力已漸大，則當轉變爲積極目的，速把守勢棄掉，一至抵抗到相當程度，即自然須變爲攻勢。所以守勢作戰猶自然之進行，必始於守勢而終於攻勢。若因最初

處於守勢環境而限於一般被動的抵抗，始終不行攻勢運動，這是不合理的。若不問事態如何，姑然固守守勢，決不轉爲攻勢的，那是更不合理。因爲守者專靠站在原來的地位來打退敵人而不轉爲攻勢的軍事行動，是而以絕對被動的守勢思想來行會戰一樣的「不合道理」。國父的主張正和克氏相同，即先取守勢，俾取得充分的準備，養其全鋒，俟敵疲憊，然後乘機大舉反攻。當民初帝俄侵略我外蒙古日急，國父主張對俄抗戰；蓋謂在戰略上應先取守勢，俟第五年練兵八百萬至千萬，然後轉而採取攻勢，直搗英俄科，望彼得堡。見於國幣革命一文說：「第二謀不敗之戰略，以抗強隣而保領土。語曰：『能戰而後能和』，惟我今日不能戰，故俄敢公然侵我領土，苦使然無端交涉，與之言仲議，悉歸無效，必也照第一策，先解決財政問題，然後能言戰，而戰必期於不敗，乃能言和，不敗之道若何，必備與戰，而氣卒不竭，乃能求最終之一勝。語有之：『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俄有常備兵百萬，戰時兵至五百萬，我現在練兵五十萬，民兵無量數，就俄之現勢而論，六個月內，必難出五十萬之兵，而我則於此期內，可出五十萬於外蒙北疆，六個月之後又可加新練之兵五十萬，然以敵俄，則在第一年之戰，勝負未可知。惟第二年，我當出兵二百萬，意料中當可逐俄出滿蒙之野，而復我黑龍江沿海州之侵地，然萬一仍敗，則在第三年，當出兵四百萬，若猶不得利，則第四年當可出兵六百萬，則未有不勝者也。在此期內，俄必有財政之恐慌，革命之起義，我可乘之隙者甚多，若彼猶不屈服，則期第五年之大舉，其兵至

八百萬，或至千萬，必直抵莫斯科聖彼得堡而後已。或擬此作戰之計劃，爲萬不能行之事，不知此乃常理而言焉，若出以非常之力，則未有不能行者也。近世戰術之力，每以金錢爲限，吾先既已行錢幣之革命，則不受金錢之壓制矣。而以四萬萬人之人力物力，而供給千萬之兵，五年之餉，實綽綽有餘也。證之以南非杜阿二國，以四五十萬人口之國，能用五六萬以抗英，支持卅年之久，而糧不能出千萬之兵，作五年之戰，有是理耶？又證之以太平天國與清戰，爲期至十五年，而兩者前後，合計共出兵千餘萬，五六十年前，中國之內戰已有三倍之長期，三倍之兵數，而當時人工糧力尙能給之，無待取助於外債，而謂今日則不能乎，無是理也。況今日乃暴國一心，生死與共，豈非往昔惟知自相殘殺者之可比耶。國父這個主張，爲我們弱者對強者，亦即被壓迫民族對帝國主義國家抗戰的最正確有效的戰略，尤以我國的環境情況是利於守禦作戰的：第一人口衆多，擁有無窮的兵員，我軍因敵人砲火的猛烈，犧牲雖重大，但補充卻很容易。又因大多數人民是過着原始似的生活，任何地帶幾乎都可以自給自足，故非敵人的封鎖所可困。第二、領土廣大，在這種環境之下，敵軍愈深入，戰線愈延長，愈要逐個擊破，兵力愈分散，因此敵軍的困難日增，弱點日多，時時處處均予我反擊的機會，且在西南的山岳地帶，以交通線的不良，更不利侵略者機械化部隊的活動。這樣，我們便可以實行長期的抗戰，在這個長期抗戰之中，我以新軍力的源源養成，國際形勢的日益好轉，最後必可以由單獨作戰，變爲聯合作戰。

，實行反攻，戰勝敵人。此次我們對倭抗戰，就是選用 國父昭垂於我們這個偉大的戰略，到了今日，已使我深深地呼吸到最後勝利的快要來臨了。惟從 國父整個的戰爭思想看，他決不是主張永遠取守勢的，爲謀中華民族的絕對安全（不是侵略的），爲在世界上能「濟弱扶傾」，將來還得養成攻勢的軍力，以供及時之用。

二、戰術

方面：

克勞塞維慈說：「戰爭唯一手段，無論爲攻勢，爲守勢，而決定戰鬥者，厥在戰術，所以一切戰略計劃，皆以戰術之結果爲目的者，蓋以戰術之結果，爲勝利根本原因也」。福煦元帥說：「戰略自體不能存在，須賴戰術，始能發揮其價值」。戰術之重要，於此可見。在這裏，當我未說到 國父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所採取的戰術以前，我們首先應知道他對於戰術的解釋：第一關於戰術的發生：國父認爲它是發生於戰鬥的事實。民族主義說：「現在的軍人都是說入學校，研究學術，學成了之後，爲國家去戰鬥。照這樣心理來講，當然先有言論，然後才有事實。但是照世界的進化情形說，最初人同獸鬥，有了幾百萬年，然後那些毒蜂猛獸才消滅。在那個時候，人同獸鬥，到底有沒有戰術呢？當時或者沒有戰術，不過因爲沒有文字去記載，便無可稽考，也未可知。後來人同人相爭，國同國相爭，有了兩萬多年，又經過了多少戰事呢？因爲沒有歷史記載，所以後來也不知道。就中國歷史來考究，二千多年前的兵書，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書，便是解釋當時的戰理，由於那十三篇兵

容，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所以照那十三篇兵書講，是先有戰鬥的事實，然後才成那本兵書。就是現在的戰術，也是本於古人戰鬥的事實，逐漸進步而來。自此來發明了無烟槍之後，我們戰術便發生一個極大的變更。從前打仗，是兵士發見了敵人而且一擁一擁的齊進，近來打仗，如果見了敵人，便趕快伏在地下放槍，到底是不是因爲有了無烟槍，我們才伏地下呢？是不是先有了事實然後才有奇呢？還是先有奇然後才有事實呢？外國從前有這種戰術，是自南非洲英波之戰始。當時英國士兵同波人打仗，也是一排去應戰，波人則伏在地下，所以英國兵士，便受很大損失。伏地戰術是由波人起的，波人本是荷蘭搬到非洲的，當時人數只有三十萬，常常和本地的土人打仗。波人是最初到非洲，和本地的土人打仗，土人總是伏在地下打波人，故波人從前吃虧不少，便學土人的伏地戰術。後來學成了，波人和英國人打仗，英國也吃虧不少，所以英國人又轉學波人的伏地戰術。後來英國兵士回本國轉教全國，更由英國傳到全世界，所以現在各國的戰術學都採用它，由此可見是先有事實才發生言論。

第二關於戰術的革命：拿破崙說過：「沒有十年不變的戰術」。克勞塞維慈也說過：「沒有一成不變的戰法」。從歷史上看：戰術的變化，在專用徒手肉搏的時代，是「一點的戰術」，到了用戈矛弓矢的時代，便變化爲「線的戰術」，再到用槍砲兵艦轉戰陸上海上的時代，又變爲「平面的戰術」，迨乎現代，由於飛機的出現，使空中亦變爲戰場，更進化爲「立體戰術」了。還不

這是就其大概而言。至於戰術的基本原則是不變的，所變的多是方法，這又是不可不知。自然，國父對於戰術的認識，不是永久不變的論者，且受到拿破崙克氏理論的影響，所以他在民權主義上說：「專就兵學講，外國的戰術隨時發明，隨時改良，所謂日新月異。所以拿一百多年以前的外國兵器，今日有沒有人還拿去用呢？那是沒有的。不但是一百年以前的兵器，沒有人拿去用，就是十年以前的兵器，到了今日也是無用。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成一個大變動，換句話講，就是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有一次革命。外國最大的武器，和價值最貴的武器，就是水上所用的戰艦。現在外國的戰鬥艦，每艘價值五千萬元以至一萬萬元，能夠值這些錢的船，才叫做一隻兵艦。外國物質的進步，以武器為最快，武器的進步，又以戰鬥艦為最快，戰鬥艦的變動，最多不過十年，在歐戰以前的戰鬥艦，至今已成廢物。不但是海軍的戰鬥艦有這樣大的變動，就是陸軍的鎗砲也是日日進步，每十年一次變動，每十年一次革命，每十年一次翻新，現在我們所用的鎗在外國已經成了無用的廢物，歐戰時各國所用的大砲，到了今日也是舊式。……不像兵艦換典；過了十年，便成無價值的廢物。由此便知外國的物質科學，每十年一變動，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後大不相同」。軍人精神教育上說：「武器與戰術固有關係者，以中國論，昔用之弓箭，而今用鎗砲，武器不同，戰術亦隨之而異」。可是戰術的進化，固是跟着武器，而武器的進化又跟着什麼呢？當然是科學。民權主義上說：「歐洲之所以霸乎我們之上的，不是政治實

學，完全是物質文明。因爲他們近來的物質文明很發達，所以關於人生日用的衣食住行種種設備，便非常利便，非常迅速。關於海陸軍的種種武器器藥，也非常完全，非常猛烈。所有這些新設武器，都是由於科學昌明而來的。那種科學就是十七八世紀以後，培根祖頓那些大科學家，所主張用觀察和實驗研究萬事萬物的學問」。

國父認爲中國在現代革命戰爭中，是急須建立適用於中國的戰術了，軍人精神教育上說：「自海禁既開之後，與英戰，與法戰，與日戰，與俄軍戰，未有不敗者，非無鎗砲，不諳戰術故也。荷請戰術，則昔日安南之黑旗，法國患之，南非洲杜蘭之農民，英國患之」。但他卻反對國圖吞併，依樣畫葫蘆地抄襲外國的戰術，同書說：「此次歐戰發生，每一日中所用子彈，實不知其幾萬萬也，其在激烈戰鬥時，每日所用，有至十數萬萬者，然以其效力計之，則非萬彈以上，不能中一人也。因彼之戰術，乃以子彈遮攔敵人，使不得前進，故多在二千米達以外用之，若在八千米達以外，至幾萬米達時，則須用重砲，亦如用步鎗然，多在以子彈遮攔敵人之前進，此外空中以飛機戰，水底以潛艇戰，類皆愈出愈奇，尙有露天地洞，與閉天地洞，爲砲彈所不能及者，兩方兵士相遇，則以徒手搏擊，甚至開戰時，圍若無人，不知其戰鬥地點在於何處者，推其所耗子彈極多，以噸數計總在幾千幾百噸以上（每噸合中國一十六担八）。此種戰術，中國決不能學，因彼之製造子彈增加無已，且發彈係以機操，不費人力。現有最新式機關鎗，一分鐘可發一千

五百顆子彈者，以一百顆為一盒，計劃每一分鐘，可獲十五盒，彼因不求一命中，務在多發子彈，堵截敵人而止」。他在革命戰爭中的戰術應採取攻勢或守勢呢？今日我根據這國父的著書志說：「國父的戰術是採取極端攻勢的（註二），並且我們根據他如下的電令亦可以看出来：

其一、電令臧致軍：「親自督許蔣兩軍回來，非全滅此殘敵（指陳炯明逆軍——裕日註）不可」。

其二、電令許汝為：「陳天太部已出四會矣，現戰情已變，江門軍當全數出三水蘆苞，向高新街方面進攻，以速掃滅粵省城之敵（指陳炯明逆軍——裕日註）為先。然後再為第二步進攻」。

其三、電令虎門總司令謝英：「我追擊軍大破殘敵於石灘之東，現已占據河田石觀之線，應敵向邇州潰退，虎門各部着速出發，以掃蕩石觀南東之殘敵為要」。

於此，我們要明白的，戰術攻勢固是配合戰略攻勢，亦可配合戰略守勢，但是在現代戰爭上，倘若被迫而取戰略守勢，如果戰術亦取守勢，始終是呆守陣地的挨打主義，這樣，犧牲固重大，更無從取勝優勢的敵人，勢必反為敵人所迂迴、包圍或中央突破，而招來全軍的覆沒。古兵法說：「以攻為守，乃自保也。以守為守，乃自斃也」。正是此意。故對於迂迴敵人，殲滅敵人，殲滅敵人，必須採取攻擊主義，對敵實行前攻，後攻，左攻，右攻，或襲擊，包圍，誘擊，伏擊，

截擊，側擊，尾擊，追擊，亦即放棄「以靜制動」的戰術原則，改取「以動制動」的戰術原則，纔能導致戰略的成功。

又，國父在戰術上最喜用「奇兵」，這又是繼承我國古代兵家孫子的「以正合，以奇勝」的懸則。民十二東江之役，電朱德傅啟波等指示說：「望顯派玉山抽一動隊抄敵人後路爲要」。電劉震寰指示說：「望兄急調一隊至白沙堆，一以絕敵人後路，二可保我前線，聞敵人急進精重，皆在風門壩附近，若兄能照此行事，可悉奪之，則博園可解，我軍實亦加利莫大也。幸甚願之」。但用奇兵以「神速」和「確實」爲要件，能如是，才可以出奇效，但仍要選擇高度的攻擊精神。

此外 國父在戰術上（亦即以攻擊爲主）尚有兩大貢獻如下：

一是游擊戰術：此種戰術，即現今所謂游擊戰術，惟現今的游擊戰術則比較進步。游擊戰術的原則，早見於我國古代「孫子兵法」中所說的「避實擊虛」，「出奇制勝」。惟此種戰術，在近代爲弱者用以對付強者的戰術，亦即被壓迫者侵略者的戰術，即用以牽制敵人，化敵人的後方爲前方，及協助正規軍作戰而達成消耗戰略。一八一二年拿破崙遠征俄國，即陷於此種戰術而致北。蘇聯在大革命中，亦以此種戰術而擊退英、美、法、德、日等國聯軍的進攻。說到游擊戰術在我國，現正展開於各戰區中，而研究游擊戰術，亦蔚爲風氣。但此學

爲「國父所做播種經濟的基本戰術了。國父對於「安南中之黑旗」及「南非洲杜國之農民」用以對抗英法的游勇戰術，向有研究，當民國十一年與師北伐，駐節桂林，曾召集各軍將校講演「軍人精神教育」，謂「此種戰術頗適用於中國，若以北方交戰，尤爲相宜」。讀者若出此種戰術的五種技能：一曰命中、二曰隱伏、三曰耐勞、四曰走路、五曰喫糧，並作如下的說明：

「何謂能命中？軍隊之有無戰鬥力，以能殺敵與否爲斷，故命中爲第一要件，但以命中論，卽外國軍隊，亦未必擅長。……若游勇戰術，則與之相反，彼視子彈如生命，非必中者，不輕施放，而有五十顆子彈便已十分滿足。以現在軍隊論，每一兵士，至少有二百顆以上子彈，何以一言北伐，猶以爲少，豈命中之技，尙不及游勇耶？諸君須知子彈之接濟與補充，有在後方者，有在前方者，游勇之重視子彈，因其子彈，止有此數，非遇敵人則無補充之機會，故不在後方接濟，而在取諸前方，此不獨游勇爲然，卽如粵軍自雲南以至回粵，其子彈皆取自敵人爲多，而不專恃後方接濟，其明徵也。若在無鎗砲而用弓箭之時代，射箭比較槍更難，而古時有一百步穿楊者，卽在於能命中，否則臨陣之際，最多不過三四十枝箭矢，若無命中能力，卽不管無的而放矢，祇須數分鐘間，矢盡而已亦就擒，又焉能戰？槍砲亦然，不能命中，則子彈之消耗多，而殺敵之效力微，前者北京天壇之戰，段祺瑞軍隊耗去三百萬子彈，而張勳之兵死傷，合計不過二百七十餘人，此則由於不能命中之故。由是觀之，子

彈之有效在能命中，若不能命中，子彈雖多，皆爲廢物，近時兵士往往輕於放槍，不問命中與否，放槍時，甚有高擡兩手，或緊閉眼睛者，此何異於無的而發矢！須知子彈最爲寶貴，中國既無倍大兵工廠，不宜學歐洲戰術以子彈爲遮欄，宜學游勇戰術，視子彈如生命，但平時須學習射擊，務求命中，不使虛發，此爲軍人之勇，有恃無恐之第一要件也。

「何謂能隱伏？即避彈方法，但此種避彈，非如義和團之用符咒，乃係利用地形爲人身之屏蔽，予在安南時，常以此詢諸一般游勇，彼云：人立地上，靶子頗大，敵人一望即知，故須藉地形以爲隱伏之所，或藏在石頭後，僅露其首，以使靶子縮小，敵人無標的可尋，我尙可從容窺探其舉動，即在子彈如雨之際，尤宜深自閉藏，勿庸驚懼，因此時前後左右，必無敵人蹤跡也，游勇之所述者如此，彼盡得諸經驗，而奧操典中所謂利用地形或地物者卻相暗合，故隱伏亦爲技能之一。

「何謂能耐勞？此與隱伏相關聯者，我亦嘗問諸游勇，彼謂隱伏秘訣，祇是「不動」二字，至少須能耐十二小時之勞，直至夜深，始可潛行。因子彈之速度，異常快捷，人雖有追風之絕足，必不能過於子彈，逃避最爲所中，不如耐心隱伏，較爲安全也。此尙有實例可證，前黃克強在欽廉起事時，有一次僅餘四人，逃在山上，敵之圍攻者約六百人，然彼實不知僅有四人也，來攻時，皆用三十人爲前鋒，而此四人者，如何抵禦？據其事後所述：敵人未

來時則隱伏不動，俟彼來襲近，在五十步左右，始行開槍，每開一揀，必死敵二三人，連開三四排，敵人之死者十餘人，卒以脫險，此一役也，即全在存命中、隱伏與耐勞之技能，否則以四人敵六百人，甯有幸事耶！

「何謂能走路？現時中國，尙未有完全鐵道，行軍之際，專恃走路，練習之法，祇須日行一十里，十日以後，每日遞加五里，如此，則不覺勞煩，而腳力自健。彼游勇戰術，亦即以善走稱。尙有實例可徵，北軍一到南方，每以山嶺崎嶇爲苦，南軍則如履平地，快捷異常，爲我之所長，敵之所短，故曰走路一端，每爲技能之必要，不可不注重也。

「何謂能吃糧？游勇所恃之糧食，卽此炒米一種，每人攜帶十斤，可支六七日，不至若飢。遇有作戰時，且無須費造飯時間，此亦爲游勇之特長，勝於正式軍隊者。去年湖南援鄂之役，其始佔據地方不少，卒因後路補充缺乏，乃至於敗，糧食亦爲補充之一。倘能如游勇之吃糧，則於行軍極爲簡便，既免飛錫晚粟之苦，而給養亦不患煩雜也。

以上五種技能。是 國父在廿年前所指示的，較之今日游擊戰上所用的技能，雖是簡略得多，仍可作爲基本的技能。再以與此次抗戰中正規軍的技能來比較，更見落後，然仍可作爲基本的技能，惟要增加各種新技能，如僱裝、駕駛、測繪、游泳、馬術及防空防毒等。這些技能都是達成戰術目的最主要的條件。然必須使其運用得精巧靈活才可。

二是非常戰術：這種戰術，亦稱革命戰術，係主張「用我軍一千人，可以打破敵人一萬人，用我軍的一萬人，可以去打破敵軍十萬人」，甚至「用一個人打百個人，用一百個人打一萬人」。本來尋常戰術，都是主張以優勢的軍隊對劣勢的軍隊，或以相等的軍隊對戰，至低限度亦不過以二對三的軍隊相戰。像兵學天才家克勞塞維慈在他「戰爭論」上，亦是強調「兵數的優勢為戰略上第一原則」，戰略如此，戰術亦如是。並論拿破崙的作戰說：「拿破崙常以大會戰制勝，他是近代絕無僅有的名將，除一二會戰未能以多兵制敵，不得不用超越智力而取勝之外，他都以集中較敵優勢的兵力或稍稍劣勢兵力為常法」。可見國父的戰術思想，實是超越古今，為拿破崙氏所不及。他說：「如果我們的士兵，都知道革命主義，便變成革命軍，如果變成革命軍，便可替革命主義去犧牲，以一當百，百當萬。……他們如果明白了主義之後，他們的精神自然同七十二烈士一樣，他們的兵士必同俄國的兵士一樣，出去打仗，便有勝無敗」（見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演講詞）。又說：「甚麼是叫做革命軍呢？革命軍和尋常軍有甚麼不同呢？不同的地方，小而言之：革命軍的一個人，常常能夠打一百個人，至少也能夠打十個人。大而言之，用我軍一千人，可以打破敵人一萬人，用我軍的一萬人，可以打破敵軍十萬人。像這樣以少數常常能夠打破多數，訓練很純熟，武器很精良的軍人，才叫做革命軍。……現在廣東有十多萬兵，都不能說是革命軍。因為他們都是一個去打一個人的，如果我軍一萬人遇到敵人一萬人，才敢去鏖陣。

若是遇到了兩萬敵人，便不敢前進，像這樣的軍隊，有甚麼用呢？怎可以說是革命軍呢？至於本大元帥今天所講的革命軍，是一千人能夠敵一萬人，像有這樣大力量的軍隊，在諸位軍事家一看起來，或者以為不可能的事。大槪照尋常的軍事經驗講，我軍無論練得如何精良，總要用幾倍去打擊敵人，才可以操勝算。譬如用三萬人去打一萬人，才可以說是有把握。如果敵人有三萬人，我軍祇有二萬人，便不能說有把握，至於敵人有一萬人，我軍也祇有一萬人，更不能說是有把握。像這樣的軍隊，是尋常軍，不是非常的革命軍。世界上有非常的時機，能夠做非常的事業，便有非常的革命軍，才可以做成功。諸位將士不信，祇考察十三年以前的革命歷史，革命黨和清兵奮鬥，沒有那一次不是以一敵百。用一個革命黨，打一百個清兵，是很平常的事，如果不然，便不能算是革命黨。諸位將士是湘軍，是從湖南來的，湖南老革命黨，最著名的有黃克強，他有一次，自安南入欽廉起義，當時到欽廉來抵抗革命黨的清兵，有兩萬多人，黃克強帶的「革命軍」不過兩百人，所有的武器不過兩百枝槍，用那樣少的人，和那樣多的清兵打兩個多月仗，到後來彈盡而援不至，還可安全退出，照這一次戰爭說：革命軍就是用一個人去打一百人，像這樣的戰鬥，是非常的戰鬥，不可以常理論，像這件不可以常理論的事，還是你們湖南人做出來的，所以本大元帥要大家以後能夠打勝仗，做非常的事，便要變成非常的革命軍。像黃克強那次在欽廉打仗一樣，如果不然，就是槍好彈多，還是透把敵人，自己沒有用處」（見救國救民之責任在

革命軍演講詞)。再說：「革命軍能用一個能打得十個，一百個能打一千個，一千個打一萬個，一萬打十萬。像這樣用一倍去打十倍軍隊才叫做革命軍。你們東路討賊軍打的仗本多，但是仔細考察起來，是不是用一千人去打一萬人呢？打勝仗的時候，或者用五百人去打一千人，或者是一千人去打一千人。好像在福廷水口打仗，東路討賊軍用一千人去打北兵兩千人，但是總沒有一千人去打一萬人的，我提倡革命是革命黨領袖很想造成一種革命軍，現在的軍隊都不革命軍，祇有辛亥年三月廿九日在廣州討賊軍，才可以說是革命軍，當他們討賊的時候，在廣州討賊軍，有滿洲國駐防軍，有李準的水師，張鳴岐的陸師，總計算起來，不下五六萬人，革命軍的人數，不過二三百人，那那有今日這樣多的軍隊呢？當時的武器，不過是手槍炸彈，那裏有今日這樣好的長槍大炮呢？那樣少的人數，只用手槍炸彈，一經發動，便逃以各師行台利督衙門，後來因為約定的外援，沒有趕到便完全失敗，死了七十二人，葬在黃花園，所以黃花園所葬的七十二人，就是那一天打死了的革命軍，就是舍身成仁的烈士。所以黃花園的七十二烈士，才不愧稱為革命軍！假如當時我們的革命軍有三千人，或者敵人祇有三千人，那一次革命，便可以成功。但是當時廣州討賊兵不只有三千人，有了五六萬人，我們的革命軍，又沒有三千人，只有二三百人，衆寡太相懸殊，所以結果歸於失敗。至於以戰論戰，當時城內之戰，可算是成功。那次革命祇有手槍炸彈，使用一個人去打兩百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軍，所以我們今天更紀念他。我

現在所希望的，不能說是用一個人去打兩百人的軍隊，總要着望革命黨的下，有革命的精神，最少的程度，要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如果不能，便不能當革命軍的名義。……革命軍打仗，不能一個人去打一個人，必要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一個人怎麼能夠打十個人呢？有胆量；便能夠打十個人，有胆量又有槍，更能夠打十個人」（見革命軍不可想升官發財白話詞），再說：「革命先烈的行爲，沒有肩的長處，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的爲國來奮鬥。從前的奮鬥是甚以情形呢？大多數都是憑着赤手空拳，有了手槍炸彈，便以爲是很好武器。每次起義，總用很少的這種武器，去和清兵奮鬥，革命的易識，都是取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的，此刻在這地聽話的，多是軍事教員同軍官學生。試問諸位教員，研究軍事學，在戰術中有沒有這個道理呢？有沒有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的成例呢？依我看起來，無論古今中外，都沒有這種戰術。普通的戰術，用一個人去打一個人，便以爲了不得。古時的兵法，都說是十圍圍之，倍則攻之。近時的兵法用一個人打一個人非守不固，像這樣的兵法，古今才叫做正當戰術。……辛亥革命的，在廣州起義之後，又有武昌起義，武昌起義，結果是成功。推測當時的情形，是怎樣呢？當在武昌漢口的革命黨，總共還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不過幾十人，所有的槍，都沒有子彈，臨時到市搜索，只得封鎖盒子彈，一共不過五十顆，革命黨分到五十顆子彈，便在城內的工程營訓練，城外炮營，立時響應，便拉兩門炮進城，包圍總督衙門，趕走瑞澂，佔領武昌。至於當時駐在武昌的清兵

，有第八鎮的新兵，有長江的海軍，又有巡防營的舊陸師，總共不下兩萬多人。革命黨祇用幾十個人，去打幾萬多人，可以說是用一個人打五百個人。廣州起義，用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結果是失敗。武昌起義，用一個人打五百人，結果是成功。都是以極少數的人，打極多數的人。廣州是失敗，在武昌便成功。所以革命的奮鬥，不能一概而論。這種奮鬥，是古今中外各國兵法中所沒有的。祇有革命歷史中才有這種創例。我們繼續來革命，按部就班，便不能說用少數不能勝多數。：：軍隊之能不能夠革命？是在乎各位將士之有沒有革命志氣，不是在乎武器精良不精良。如果沒有革命志氣，不研究革命的道理，像滿清末年所練的新軍陸軍，都有很精良的長槍大炮，海軍有很堅固的戰艦和魚雷艇，總不能發揚革命事業。非常的事業，不可以常理論。從前留學日本和歐美各國的海陸軍學生，我們總是設法運動，要他加入革命黨，但是有許多學生，總是不肯加入，始終反對革命。他們那些反對革命的有智識軍人，是甚麼心理呢？仔細考查，就是他們都有一種成見，自以為是軍事專家。在我們革命黨主張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用一百個人打一萬人，在他們受過軍事教育的人看起來，以為這是古今中外戰術中沒有的道理，如何可以成功呢？這個道理，我們不必深辯，只要看後來中國革命，推翻滿清，是誰造成呢？成功的時候，固然是有許多軍事家的贊助。但是窮脈溯源，說起原動力，還是由於極少數的革命黨所發起的。推到當時一般沒有智識的軍人，以為用極少數打敗極多數，是戰術中決不能成功的定案。因為不贊成這個道理，便不

贊成革命，所以從前的革命，因為那些軍人，都不贊成革命，所以從前的革命，真是有軍事知識的人，還是很少。辛亥革命之所以大功告成，是由於全國已經發生了革命之後，段祺瑞便結合一般軍人，聯名通電贊成共和，才能夠達到推翻滿清的目的。革命黨因為階級相從，容納他們的意見，收羅這一般軍人，以後才收軍事上的順利。所以辛亥革命之成功，實在沒有真正軍事學識的軍人（見革命軍的基礎在深高的學問）。於此可見 國父在用兵上是重實不重量的。就是說，如果我們的軍隊個個都有「爲革命主義去犧牲」的攻擊精神（武器爲次要條件），像這樣的革命軍，「以一當十」，自可殺敵數萬。這是有戰例爲證，並非誇大之談，觀於上述，便可瞭然。何況革命軍的對敵作戰，勝固戰，敗亦戰，從屢敗屢戰中，爭取最後的勝利。於此最要緊的，是全軍上下均要具有決死的高度攻擊精神。倘若當我一千人與一萬的敵人相遇，或一千人與一千的敵人相遇，便心寒胆散。甚至棄械逃遁，像這樣的軍隊，根本不配作戰，更談不上參加革命的戰爭。所以我們今後在練兵上，一定訓練每一個士兵都有「以一當十」的攻擊精神，那麼在作戰上就有把握了。其次我們從普通兵學上亦可以證明「非常戰術」的正確，像「孫子兵法」上說：「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或「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或「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或「以遠待近，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或「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能以衆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敵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所則敵之備

者多，敵之所備者多，則吾之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也，衆者使人備己也。……故敵雖衆，可使無鬥」。如果我們能夠運用這些原則，自可以達成「非常戰術」。再從現代戰術上看，現代戰術是以「攻擊之重點，以對敵之弱點或其最痛苦之方向指向之」爲制勝的要訣，所以當我的兵數比敵爲寡時，倘若能夠作適切的集中，則小力量亦可變爲大力量，形成重點，向敵人的弱點或痛苦的方向猛烈一擊，那也可以達成「非常戰術」。可見「非常戰術」，在古今兵學上亦有它的真理。

哥爾茲將軍說過：「關於戰略戰術，從事著作者，無論何人非其所逃原則中考慮本國特別事情，提供吾人以國民的戰略戰術，則不能謂之真有所貢獻於國家」。真的，中國今後的戰略戰術絕不能再採取什麼日式、德式、法式、俄式了，它一定要建立爲適合中國國情的中國化的東西。國文的戰略戰術就是中國化的戰略戰術的基本，我們今後應加以發揚，更具體地來建立中國革命的戰略戰術。

（註一）見蘇爾區著「現代戰爭論」（大時代版）。據李仙根、趙超先生等口述。

十一·縱橫戰論

首先我要說的，是國父對於戰爭時代的劃分。關於歷史上戰爭時代的劃分：有人分爲：（一）箭的戰爭時代，（二）劍的戰爭時代，（三）平面戰爭時代，（四）立體戰爭時代。至於現代的戰爭，也有人分爲煤力時期，油力時期，電力時期。這都是就戰爭上所用的工具或動力來劃分的。國父則重於政治方面，在民族主義上，把歷史上的戰爭劃分爲如下的四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不是用權，是用氣力。

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是用神權。

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是用君權。

第四個時期——是國內相爭，人民與君王相爭。在這個時代之中，可以說是善人鬥惡人爭，

公理同強權爭。

以上的劃分就中「人同獸爭」及「人同天爭」的兩個時期，僅是戰爭的起源，唯有第三第四個時期的戰爭，才算是真正的戰爭。而且國父在這第四個時期，有一個理想，就是認爲基於民

橫戰爭的成功及民主政治的實現，足以避免將來國內戰爭的發生，近代歐美民主國家，可爲例證。他在民權主義上說：「就中國歷史講，每換一個朝代，都有戰爭，比方秦始皇專制，人民都反對他，後來陳勝、吳廣起義，各省都響應，那本是民權的風潮。沒有一個不是爭皇帝的。中國歷史常是一治一亂，當亂的時候，總是爭皇帝。外國曾有因宗教而戰，自由而戰的，但中國幾千年來所戰爭的都是皇帝一個問題。我們革命黨爲避免將來戰爭起見，所以當初發起的時候，主張共和，不要皇帝，現在共和成立了，但是還有想做皇帝的，像南方的陳炯明是想做皇帝的，北方的曹錕也是想做皇帝的，廣西的陸榮廷是不是想做皇帝呢？此外還更有不知多少都是想做皇帝的，北方的，中國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兵權大的就爭皇帝，兵權小的就爭王爭侯，現在一般軍人已不敢大者王，小者侯，這也是歷史競爭的一個進步了」。

以下說到 國父關於過去戰爭及將來戰爭的論評：

一、論過
去的戰
爭：

戰史是兵學的泉源，也是將校的教師，歷代兵家對於戰史必有深刻的研究。孫武所著的兵法十三篇可以說是黃帝擊蚩尤，以及唐虞夏商周五代及春秋用兵的結論。克勞塞維慈所著的「戰爭論」，是研究腓特烈及拿破崙戰史的結晶。他如吳起、韓信、岳飛、戚繼光、漢尼拔、毛奇、興登堡等的戰勝攻取，亦莫不由於研究戰史的成就。又如拿破崙說：「欲成爲偉大的將帥，唯一的手段，應把握着兵術的祕訣！」

研究戰史」。華甸堡伯爵說：「戰史的智識決不是蒐集一切實例，以供我們必要時發見其足以模倣的適例，便算完了，乃是憑實習所獲得的精神訓練，使我們於不知不覺中容易認識正確的目的，且可改進我們以前那低劣的無意識的天職本能，使成爲有意識的力量」。普克爾將軍說：「軍隊若缺乏戰爭的經驗，則以戰史爲教育的基礎，更屬必要。……戰史雖不能代替實際的經驗，然足爲實戰的準備。在平時研究戰史，乃學習戰爭與決定兵術原則的真正手段」。戰史的重要如此。惟我們對於戰史所提示的各種原則，切不可食古不化，墨守成規，際因時因地因敵而制宜，尤宜從舊戰史上發現戰術的新原則，以爲出奇制勝之本。

國父對於古今中外的戰史，莫不有精博的研究。他在「戰學入門」的序文上批評繡木真、毛奇、拿破崙說：「世之善戰者，有得於天才者，有得於學問者，如繡木真之趨於遊牧而能掃盪敵，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此天才獨勝者也。如莫魯克（即毛奇——浴日註）之運籌帷幄，決勝先機，一戰而勝，再戰而摧，三戰而敗，此學問特長者也。至於拿破崙乘法國革命之運，統飢寒之殘卒，與奧戰於意大利之野，以少擊衆，連戰皆捷，轉危爲安，及後幾奄全歐，其用兵之妙，古今無匹，此才學兼長者也」。亦足見他對繡木、毛、拿等戰史的研究。此外，他對太平天國戰史，中國近代戰史，及外國民族革命或政治革命的戰史亦很有研究。尤以對太平天國的戰史爲最，這大概是因爲他基於推翻滿清的需要，正同洪秀全的一樣，關於這點，去年我接到一位老同

志由徽給我的信說：「總理生平最爛熟者爲太平軍戰史，對於進兵攻城得地之戰法及地理，往往如數家珍。其材料除得自私人紀錄，及官書外，外人所著關於太平朝事跡，幾應有盡有，嘗言軍中用兵與國家用兵之戰略不同，太平戰法大可採用，並批判其勝敗之由」（計一）。國父爲「太平天國戰史」一書所撰的序文說：「雖以羅曾劄記號稱學者，終不知春秋大義，日陷於以漢攻漢之策，太平天國遂底於亡，豈天去厭胡運歟？其當時戰略失宜，有以致之歟」？這是說太平天國的失敗，有關於戰略的錯誤。在民權主義上更深入地論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說：「從前太平天國便是前車之鑒，洪秀全當初在廣西起事，打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滿清天下大半歸他所有。但是太平天國何以終歸失敗呢？講起原因有好幾種，有人說他最大的原因，是不懂外交，因爲當時英國派了大使波丁渣到南京，想和洪秀全立約，承認太平天國，不承認大清皇帝。但波丁渣到了南京之後，只能見東王楊秀清，不見天王洪秀全，因爲要見洪秀全更要叩頭，所以波丁渣不肯去見，便到北京和滿清政府立約，後來派戈登帶兵去打蘇州，洪秀全便因此失敗。所以有人說他們的失敗，是由於不懂外交，這或者是他失敗的原因之一，也未可知。又有人說洪秀之全所以失敗，是由於他得了南京之後，不乘勢長驅直進去打北京，所以洪秀全不北伐，也是失敗原因之一。但是依我的觀察，洪秀全之所以失敗，還兩個原因都是很小的，最大的原因，是他們那一般人到了南京之後，就互爭皇帝，鬧起城來，自相殘殺。第一是楊秀清和洪秀全爭權，

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楊秀清也想做皇帝，楊秀清當初帶到南京的基本軍隊，有六七萬精兵，因為發生爭皇帝的內亂，韋昌輝便殺了楊秀清，消滅他的軍隊，韋昌輝把楊秀清殺了之後，也專橫起來，又和洪秀全爭權，後來大家把韋昌輝消滅。當時石達開聽見南京發生了內亂，便從江西趕進南京，想去排解，後來見事無可為，並且自己也被人懷疑，都說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軍隊帶到四川，不久也被清兵消滅。因為當時洪秀全、楊秀清爭做皇帝，所以太平天國的洪秀全、韋昌輝、石達開、楊秀清那四部份基本軍隊，都完全消滅，太平天國的勢力便由此大衰。推究太平天國勢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於楊秀清想做皇帝一念之錯。洪秀全當時革命，尙不知有民權主義，所以他一起義時，便封了五個王，後來到了南京，經楊秀清、韋昌輝內亂之後，便想不再封王了。後來李秀成、陳玉成屢立大功，有不得不封之勢，而洪秀全又恐封了王，他們或靠不住，於是同時又封了三四個王，使他們彼此號位相等，可以互相牽制，但是從此以後，李秀成、陳玉成對於各王，便不能調動，故洪秀全便因此失敗，所以那種失敗，完全是由於大妄想做皇帝。這就是說太平天國的失敗，主要的原因，不是軍事而是政治，不過這個政治原因就不屬於純戰史的範圍了。

其次關於中國近代對外的戰爭，例如論中法戰爭說：「鎮南關一戰，中國還獲勝仗，後來因被法國恐嚇，中國才和法國講和，情願把安南讓與法國，但是在講和的前幾天，中國的軍隊正在

鐘南圖謀山大野，法國幾乎全軍覆沒，後來中國還是求和，法國人便以為很奇怪。嘗有法國人對中國人說：中國人做事，真是不可思議，就各國的慣例，凡是戰勝之國，一定要表示戰勝的實績，一定要戰敗的割地賠償，你們中國戰勝之日，反要割地求和，送安南到法國，定種種苛虐條件，這真是歷史上戰勝求和的始例」（民族主義）。又論庚子之役說：「像庚子年發生義和團，他們的起意，是要掃除歐美勢力的，因為他們要掃除歐美的勢力，所以和八國聯軍打仗，當時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聯軍的機關槍和大砲，那種舉動，就是當時中國對於歐美的新文化之反動。對於他們的物質進步之抵抗，不相信歐美的文化是比中國進步，並且想表示中國的文化，還要好過歐美，甚至於歐美的洋槍大砲，那些精利武器，也不相信比較中國的大刀還要利害，所以發生義和團來反抗歐美。義和團的勇氣，起初是銳不可當的，在楊村一戰，是由於英國提督西摩，帶了三千聯軍，想從天津到北京，去救那些公使館，經過楊村，就被義和團圍住了。當時戰鬥的情形，義和團沒有洋槍大砲，只有大刀，所圍住的聯軍，有很精利的槍砲，在義和團一方面，可說是肉蛋相撞，西摩因為被他包圍了，使用機關槍去掃射義和團，氣和團雖然是被機關槍打死了很多人，血肉橫飛，但是還不退縮，還不退卻，總是前仆後繼，死死的把聯軍圍住，弄到西摩帶那三千聯軍，終不敢通過楊村，直趨北京，便要退回天津等候，另外請了大兵來幫助，終於夠到達北京，解各國公使館的圍。就那次戰爭的情形而論，西摩有幾句批評說：照當

嗜殺和國之勇氣，如果他們所用的武器是西式槍炮，那些聯軍，一定是全軍覆沒的，但是他們始終不相信外國的新式武器，總是用大刀肉體和騎軍相搏，雖然被聯軍打死了幾萬人，傷亡枕藉，還是前仆後繼，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民權主義)。

至於論英法的民權戰爭，美國的獨立戰爭，南北戰爭及俄國革命戰爭，詳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恕不贅述。惟論上次歐洲大戰，我可以舉些例子來。民族主義說：「前幾年的歐洲大戰，這次戰爭亦叫做世界的大戰爭。何以叫做世界的大戰爭呢？因為這次戰爭擴充影響到全世界，各國人民都捲入漩渦之中。這次大戰所以構成的原因，一是撞克遜民族和條頓民族互爭海上的霸權，因為德國近來強盛，海軍逐漸擴張，成世界上第二海權的強國，英國要自己的海軍獨霸全球，所以真打破第二海權的德國，英德兩國都想在海上爭霸權，所以便起戰爭。二是各國爭領土，東歐有一個弱國叫做土耳其即突厥，土耳其百年以來，世人都說他是近東病夫，因為內政不修明，皇帝很專制，變成了很衰弱的國家，歐洲各國都要把他瓜分，百餘年來，不能解決，歐洲各國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發生戰爭。故歐戰的原因，第一是白種人互爭雄長，第二是解決世界的問題。如果戰後是德國獲勝，世界上的海權便要歸德國佔領，英國的大領土便要完全喪失，變成羅馬一樣，弄成四分五裂而亡」。這是就歐戰發生的原因而論。關於此，在同主義又說：「像這次歐洲大戰，何有人說是『打太陽』的地位，因為歐洲列強多半近於衰滯，所以起戰爭的緣故，都

是由於互相爭奪溫和溫帶的土地，可以說是「爭太陽之光」。其次就歐戰的軍事方面說：其一，關於陣地方面說：「吾今欲請學者一觀，近日歐洲之戰場，當一如德軍第一次攻巴黎之失敗也，立即反攻爲守，爲需要所迫，數月之間，築就長壕，由北海之濱至於瑞士山麓，長一千五百餘里，有第一第二三線各重之防禦，每重之工程，有陰溝，有地窖，有甬道，有棧房，工程之繁固繁複，每線每里比較，當過於萬里長城之工程也。三線合計，長約不下五千餘里，而英法聯軍方面，所築長壕亦如之。……而歐洲東方之戰線，由波羅的海，橫亘歐洲大陸，而至於黑海，長約三倍於西方戰場，彼此各築長壕以抵禦，亦若西方」（孫文學說）。其二，關於使用兵器及陣地方面說：「當歐戰的時候，法蘭西本國以北的許多地方，都被德國軍隊侵入，人民的產業化爲烏有，房屋也打壞了，在那個地方兩軍相持三四年，不但是房屋沒有，就是一草一木都找不出來，成了不毛之地。這是甚麼原因呢？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打仗，是用子彈分勝負，每打一次仗，一日要用幾十萬或幾百萬子彈，歐美現在打仗，不用子彈分勝負，要用砲彈分勝負，每日所用的砲彈，總是以幾千萬計。我們現在的戰爭，在他們看起來，是拿破崙的戰爭，是幾百年以前的戰爭。他們現在的戰爭是甚麼情形呢？在戰線以內的人，不能在地上走，要在地上走，在戰線之內挖了許多隧道，要後方勤務的人，都走那些隧道，去接濟前方的補充。他們現在用砲，好似我們用槍一樣，我們打了幾仗，是說繳械，他們便不說繳械，要說繳砲，每次最多的時候，要繳五六

其確，要盡幾十萬糧圖檢」（見革命成功始得享國民幸福演講詞）。

二、農業 來的戰 爭。

圖父在實業計劃上劃分現代世界的戰爭有三種戰爭：（一）國際戰爭——各
國爲土地而爭，爲食物而爭，爲原料而爭。（二）商業戰爭——是資本家與資本
家之戰爭。（三）階級戰爭——即工人與資本家之戰爭。這種劃分真有見地。至
於世界將來戰爭的趨勢，圖父又有一種新觀察。

圖說「未來是不可知的」，「人類的目光不能透視將來」，但是人類總是用盡腦筋力與想像
力來打破這個閉閉壘，來尋找答案。先知先覺者對於將來的變化雖未能作詳盡的豫言，但檢討過
去，把握現在，總可以爲將來決定一個趨勢，政治如此，軍事亦如此。

圖父對於世界將來戰爭趨勢的觀察，不同於一般戰爭小說家的描寫，也不同於一般產稻家的
預言，更不同於日本法西斯兵學者武斷將來的戰爭，爲毀滅敵國全部的城市鄉村、老幼男女、山
川草木以及一切畜類的決戰戰爭，並依於無須着陸飛機的發明使用，又可以實行遠距離的決戰。
他是以科學爲根據，并以世界人類的覺醒爲前提，而指斷將來的戰爭是公理與強權的戰爭，在民
族主義上說：「就歐洲戰爭的歷史說，從前常發生國際戰爭，最後的歐戰，是德奧土布諸國盟國
，稱英法俄日美諸協約國，兩方戰爭，經過四年的大戰，始筋疲力盡，雙方停止，經過此次大戰
之後，世界上先知先覺的人，這將將來歐洲沒有爆點可以引起別種國際戰爭，所不能免的或者是

一場人種的戰爭，像黃人與白人戰爭之例，但自俄國新變發生之後，就我們人觀察以往的大勢，逆料將來的潮流，國際間大戰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種戰爭，不是起於不同種之間，是起於同種之間，白種與白種分開來戰，黃種與黃種分開來戰，此種戰爭是階級戰爭，是被壓迫者和橫暴者的戰爭，是公理和強權的戰爭，俄國早以以後，斯拉夫民族生了甚麼思想呢？他們主張強種扶弱，應當濟貧，是專為世界上伸張公道打不平的，這種思想宣傳到歐洲，各弱小民族都很歡迎，現在最歡迎的是土耳其，土耳其在歐戰之前，最為最弱，不能振作，歐洲人都叫做近東病夫，應該要消滅，到了歐戰，加入德國方面，被協約國打敗了，各國都想把他瓜分，土耳其幾乎不能自存，後來俄國出來打不平，助他趕走希臘，修改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到了現在，土耳其雖然不能成爲世界上的頂等強國，但是已經成了歐洲的二三等國，這是該甚麼力量呢？是全靠俄國人幫助的，由此推論出來，將來的趨勢，一定是無論那一個民族或那一個國家，只要被壓迫的或受曲的，必聯合一致，去搖撼強權，那些國者是受壓迫的呢？當歐戰前，英法國要打破獨意志的帝國主義，俄國也加入他們一方面，後來不知到犧牲了多少生命財產，中途還要回師，宣佈革命，這是甚麼原因呢？是因爲俄國人受壓迫太甚，所以要去革命，實行他們的社會主義，反抗強權。當時歐洲列強都反對這種主義，所以共商出兵去打他，幸而俄國有新拉夫族的精神，就終能打破列強，還令列強對於俄國，武力上不能反對，便不承認他是國家，以爲消極的抵制（現在英國已正式承

認俄國)，歐洲各國何以反對俄國的新主義呢？因為歐洲各國人是主張侵略，有強權，無公理，俄國的新主義，是主張以公理撲滅強權的，因為這種主張，和列強相反，所以列強至今還想消滅他，我國在沒有革命之前，也主張有強權無公理，是一個很頑固的國家，現在便反對這項主張，各國因俄國反對這項主張，便一齊出兵去打俄國，因為這個原故，所以說以後的戰爭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今日德國是歐洲受壓迫的國家，亞洲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強權的壓迫，受種種痛苦，他們同情相憐，將來一定聯合起來，去抵抗那些強權的國家，那些被壓迫的國家聯合，一定去和那些強權的國家，拚命一戰。推到全世界，將來白種人，主張公理的，黃種人主張公理的，一定是聯合起來，白種人主張強權的，和黃種人主張強權的，也一定聯合起來。有了這兩種聯合，便免不了了一場大戰，這便是世界將來大戰之趨勢」。這個將來大戰的本質，亦同前述「第四個時期」戰爭的本質，即「公理同強權爭」，這樣，才是革命的戰爭，「以戰止戰」的戰爭。中國現代對內的革命戰爭是「公理同強權爭」，對外的革命戰爭，像此次的對倭抗戰，也是「公理和強權爭」。世界的將來大戰，必有一場公理和強權的大戰，在這場大戰之前，也許要反復地經過無數次的混戰，而這場大戰，也許是世界最後一次大戰，在這次大戰中，將使于主張公理者的戰勝強權者，而永遠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石！

（註一）據馮自由先生於三十年七月由滬給我的信。

十二·結語

國父的戰爭理論，真是博大精深。我的研究，已如上述。惟關於「知難行易」的學說，我想在這裏，從軍事上給它一個闡明，這個學說是有普遍性與必然性的「凡知皆難，凡行皆易」的實學說。國父爲建立他這個學說，便著孫文學說一書，不憚其煩，連篇累牘，列舉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醫學、化學、進化等十大例證，使人人容易了解「行之非艱，知之惟艱」的道理，並打破過去「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謬說。跟着又從人羣的進化上作進一步的證明，就時的方面分爲：「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爲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爲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之後，爲知而後行之時期」。此三時期，以第三個時期爲歷史發展最難的時期，足證知爲難，行爲易。就人的方面分爲：「其一先知先覺者，爲創造發明。其二後先知先覺者，爲做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覺者，爲竭力樂成」，此三系人，在古今社會上都以第一系人爲數最少，亦足爲知難行易學說之佐證。

我們了解 國父上述「知難行易」的道理後，在軍事上我亦可以舉出十大例證來：發明兵器

較製造兵器難。發明射擊原理較射擊動作難。設計渡河難於實行渡河，設計要塞難於構築要塞。設計防空難於實行防空。定典範令難，而實行典範令爲易。定軍令難，而實行軍令爲易。定軍法難，而執行軍法爲易。定軍政的興革難，而實行軍政的興革爲易。再就作戰而說，策定戰略戰術爲難，而奉行戰略戰術爲易，至于射擊破壞衝鋒陷陣的動作更爲易。其次關於戰爭的進化，就時期說，亦可分爲「不知而行」，「行而後知」和「知而後行」的三個戰爭時期，近代的戰爭爲「知而後行」的最高表現。就軍人說，亦可以分爲「先知先覺」的統帥，「後知後覺」的將校，「不知不覺」的士兵。而殺敵取勝，就是由於此三級軍人的「相需爲用」，協同一致，發揮精神力與物質力所造成。於此我們更應明白的，像「孫子兵法」與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實爲千古不朽的兵學聖典。歷代名將的功業雖有優於孫克兩氏者，但理論上而能優於孫克兩氏者實無一人，更且證「知」的難能可貴，孫克兩氏爲先知先覺的兵學大師。又像孫臏的滅龐計，田單的火牛計，韓信的背水陣，孔明航空城計，李晟的雪夜入蔡州，拿破崙的越阿爾卑斯山，漢尼拔導演的糜精殲滅戰，與登堡指揮的坦能爾殲滅戰，這都是證明他們是先知先覺的名將，爲歷代軍人所罕見者。又，當先知先覺將帥所決定的戰略戰術，來殺敵取勝，都屬因限於後知後覺或不知不覺，往往不知其所以然，直至戰勝之後，仍有不知其所以致勝之道，正如孫子說：「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所以一個軍隊在先知先覺將帥的指揮

之下，全體部員只有服從命令，奉行命令，絕對不容懷疑猶豫于其間。

此外，國父知行的學說，尙有三個原則：一是「能知必能行」，一是「不知亦能行」，一是「有志竟成」，都爲我們革命軍人應當把握着的。先說「能知必能行」，我們知道，國父的所謂「知」，是眞知，是科學的知，國父說：「科學的知識，不服從迷信，對於一件事，須用觀察，和實驗的方法，過細去研究，研究歷次不錯，始認定爲知識」（見國民要以人格救國演講詞）。所以我們軍人的智識學問，不是徒在書本上死讀死記，及在課堂裏專心聽講，所可切於實用，須從實際觀察、實地演習（像德蘇陸軍是世界最注重演習的軍隊，故成爲世界頂強的軍隊，今後我們應注意及之），或在實戰中去理解它，去把握它，然後才不會再蹈趙括徒讀父書的覆轍。寫粵寇蔡說：「一切智識雖紙大半得自擴充事物的性能，而一切事物的效用必待經驗而後知，尤其是軍事智識的基礎在經驗，所以兵學是經驗的科學。例如火藥的效用，如離身試驗只憑想像與測算，實難得知其真相。所以自古以來，一切物質兵器的效果，必須反覆試驗。子彈藉火藥之力一秒間飛行于尺，固可用測算而知，然其受空氣與重力的阻礙命中目標實際的效果，亦由經驗而得知，測算的效果如此，精神的效果也是一樣」。又說：「所謂危險，所謂勞力，所謂情報，所謂障礙，都是戰爭特有的元素，從它們妨害戰爭動作的作用上而觀，可總稱爲障礙。要如何方能克服這種種障礙，一言以蔽之曰：「習慣」，惟有習慣能使身設忍耐大勞苦，惟有習慣能使精神

抵當大危險，惟有慣戰能使判斷不為眼前印象眩惑。例如吾人初入暗室，鹽孔放大，吸收所有的發光體，漸漸能辨別諸物和明處一線，慣戰的情形大槪是如此的。戰爭的習慣，也可以由平時適當的演習，得着類似實戰的經驗，這要在演習中使各種障礙的一部份出現於實際，使指揮官磨練其判斷力與用意的周到，可以得很大的利益」。這樣所得的軍事智識學問，才是真知，科學的知，自然可以達到「知之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的地步。所以我們革命軍人今後的求知，決不可讀死書，應從演習中去求知，絕不可怕戰，應從戰場中去求知。這樣的知，才是百戰百勝的「知」，才是建功立業的「知」。

雖然「能知必能行」，固屬上策，但「不知亦能行」（包含知不完全的意思），亦可奏效。譬如當對敵人情況不明的時候，如果下最大決心，實行冒險攻擊，亦可以衝壓敵人，並可以從攻擊的行動中去獲得更完備的情報，以爲我進一步行動的根據。假設我們因對敵情不大明瞭，必待取得更完備的情報然後動作，因會錯過「戰勝之本」的寶貴時間，反會給予敵人以獲得關於我們更完備的情報的機會，又會喪失敏捷攻擊及初步獲勝的利益。至關於「有志竟成」，這是教我們求知和實行都要立志的，誠以軍事學問的博大精深，戰爭的艱難險阻，必有待於我們軍人立下堅強不拔之志，拿出整個的精神力來幹，方可竟成其事。國父說：「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軍

命，維新與邦建國等事業是也」。依此而論，我國此次對倭抗戰，就是一「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的大事，又爲先知先覺的最高領袖領導全國同胞一致決志奮鬥到底，故一時雖因軍力懸殊，未克擊退敵人，但必能爭取最後勝利，將如 國父發動播遷瀋陽，中經十次失敗，終歸於成。

最後，國父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他以卓越的天才，遠大的眼光，高深的學問，豐富的經驗，精勤的努力，在立獨立功上是空前的，在立言上也是空前的——一面建立了中國現代的倫理、哲學、政治、經濟理論，同時又建立了中國現代的戰爭理論。不特說，他的戰爭理論是繼承中國固有兵法的精神，吸收世界各國兵學的菁華，並加以自己的獨創而成，又是適應中國現代的需要而建立的，他憑着他戰爭的道理，運用着他革命的戰法，既插遍了瀋陽，又完成了每一次討賊軍事的勝利，所以他的戰理戰法，不是「紙上談兵」，乃爲必勝必成的法寶，我們中華民族的每一個團體，每一個軍人今後不祇要繼承它，更要發揚它運用它來鞏固中國的國防，把中國從被壓迫被侵略的苦海中搶救出來，在世界上豎起「濟國扶傾」的大旗！

中華民國卅一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卅二年十二月再版

中山戰爭論



版權所
翻印必究

學校機關直接向本社購十册以上者一律九折，百册以上者八折，每册另加郵費國幣貳元。

每册定價國幣

經售處

編著者
發行者

李浴日

印刷者

世界兵學編譯社
衡陽剛直路第七十六號

- 桂林：文化供應社
- 桂林：武學書館
- 桂林：掃蕩報營業處
- 韶關：中國文化服務社
- 韶關：新建設出版社
- 韶關：商務印書館
- 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
- 重慶：生活圖書社
- 重慶：軍用圖書社
- 成都：黃埔出版社
- 成都：拔提書店
- 西安：中國文化服務社
- 西安：商務印書館
- 蘭州：中國文化服務社
- 蘭州：商務印書館
- 柳州：中國文化服務社
- 柳州：中國文化服務社
- 長沙：中國文化服務社
- 長沙：中國文化服務社

通訊處：桂林第三三一號信箱。或韶關第二九〇號信箱

中心圖書公司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書字第三九三號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書字第三九三號



定價
國幣

- 200 -

廣州北區圖書館
冊 0.50